

##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日星期四

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會議

### 出席者：

總督衛奕信爵士，K.C.M.G. (主席)

布政司霍德爵士議員，K.B.E., L.V.O., J.P.

財政司翟克誠議員，O.B.E., J.P.

律政司馬富善議員，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政務司廖本懷議員，C.B.E., J.P.

張鑑泉議員，O.B.E., J.P.

張人龍議員，O.B.E., J.P.

譚惠珠議員，C.B.E., J.P.

葉文慶議員，O.B.E., J.P.

陳英麟議員，J.P.

范徐麗泰議員，O.B.E., J.P.

鄭漢鈞議員，J.P.

鍾沛林議員

何世柱議員，M.B.E.,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李國寶議員，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彭震海議員，M.B.E.

潘志輝議員

潘宗光議員

司徒華議員

戴展華議員

譚王葛鳴議員

譚耀宗議員

劉皇發議員，M.B.E., J.P.

地政工務司班禮士議員，C.B.E., J.P.

教育統籌司布立之議員，O.B.E., J.P.

運輸司梁文建議員，J.P.

何承天議員，J.P.

保安司班乃信議員，J.P.

行政司曹廣榮議員，C.P.M., J.P.

衛生福利司周德熙議員，J.P.

夏佳理議員，J.P.

鮑磊議員，O.B.E.

鄭明訓議員

鄭德健議員，J.P.

張子江議員，J.P.

周美德議員

方黃吉雯議員，J.P.

林貝聿嘉議員，M.B.E., J.P.

林偉強議員，J.P.

劉健儀議員

劉華森議員，J.P.

梁智鴻議員

梁焯彤議員，J.P.

麥理覺議員，O.B.E., I.S.O., J.P.

薛浩然議員

蘇周艷屏議員，J.P.

田北俊議員，J.P.

杜葉錫恩議員，C.B.E.

黃匡源議員

**缺席者：**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潘永祥議員，M.B.E., J.P.

許賢發議員

謝志偉議員，O.B.E., J.P.

黃宏發議員

**列席者：**

立法局執行秘書羅錦生先生

## 其他議員提出的動議

### 致謝動議

#### 恢復辯論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九日提出的動議

劉皇發議員致辭：主席先生，閣下在一九八八至八九年度《施政報告》中，勾劃出政府應付香港現時和長遠需要的一系列施政方針，尤其所提到的多項重大基本建設工程，是令人感到振奮的。這樣對維持香港穩定繁榮和改善市民生活質素上，是有重大的意義。

正如閣下在《施政報告》所言，「為保持經濟增長和提供足夠的基本設施，我們必須繼續投資進行大型的基本工程計劃。」目前政府考慮興建或正在加以研究的大型基本工程計劃包括新機場、第八號和第九號貨櫃碼頭、連接新界西北部和港島的第三號幹線、連接新界西北部與市區的鐵路計劃等。這些投資巨大的工程倘若能順利付諸實行，將會推動香港經濟繼續蓬勃發展，增強港人及投資者的信心，對促進過渡期及一九九七年後香港的穩定繁榮起著很大的作用。雖然上述的大型基本工程計劃，從提出到現在已有一段頗長的時間，但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政府已承諾在不久的將來便會對這些計劃作出決定。記得在去年《施政報告》辯論時，我曾經提出，政府應盡早對興建新機場的問題作出決定，而今年度《施政報告》有關機場的評論，顯示政府對新機場的興建已採取更為明確的支持態度。

不過，香港除了迫切需要一個新機場外，第三號幹線及連接新界西北與市區的鐵路計劃也應給予優先考慮。因為屯門新市鎮的人口到一九九七年時將超越 53 萬人，元朗新市鎮及天水圍的發展，新界西北的人口很快便會達到 100 萬人，而屯門工業區及元朗工業邨也在迅速發展，葵涌貨運碼頭經新界西北至中國之貨運交通正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再加上未來新機場及港口的設施，在這情況下，新界西北地區是極之需要有一個完善的運輸網絡。

主席先生，關於這些大型基本工程，我完全同意政府是需要清楚了解所有情況後，才作出決定。但我認為政府亦需要有勇於承擔和果斷的精神，抓緊時機去做應該要做的事。任何不必要的阻延除了會令市民蒙受不便、生活質素下降外，還會窒礙社會的整體發展，導致重大的經濟損失。我希望政府當局應要吸取沙田新市鎮由於設計的錯誤而導致道路擠塞及北區由於城市發展規劃工程進行處理不善，導致嚴重水患的教訓，不應再重蹈覆轍，以免基本設施未能配合社會發展的情況趨於惡化。

閣下在《施政報告》裏提到新界鄉郊的居住環境並不理想，需要制訂全面的新發展策略去加以改善，我相信這個建議會受到新界鄉郊人士廣泛的歡迎。事實上，我在一九八五年初入立法局的時候，即已提出，鄉郊地區的基本設施長期以來都處於落後狀態，得不到應有的改善，這樣對於鄉郊的居民是非常不公平的。雖然政府曾一度加以關注改善，但進度仍感緩慢，若然還不加速進行的話，城鄉設施的差距將會愈拉愈遠。根據《施政報告》，新策略的主要內容，包括改善公共和私人發展的規劃，以及收緊對土地用途的管制，以確保改善效果得以長久保持。鄉議局將會全力支持當局的改善計劃，不過我希望當局在改善鄉郊設施的同時，亦要充份照顧土地業權人士的

利益，過往不少土地被劃入發展藍圖後，往往超過十多年都不進行發展，這樣無疑是將土地長期凍結，不單使業權人無法利用土地加以發展，亦浪費珍貴的土地資源。我認爲政府當局宜應盡速加以檢討改善，以免土地業權人士蒙受損失。

主席先生，我也想趁此機會，談談越南船民及難民的問題。政務總署較早時進行的一項全港民意調查顯示香港市民開始對越南船民及難民問題表示很大的關注。由於在解決這個棘手問題上進展緩慢，而港府在這方面的經濟負擔亦愈來愈沉重，市民很自然會擔心香港的資源運用和社會發展將因此而受到影響。由於當局事前的諮詢工作做得並不足夠，故此當政府宣佈在屯門區設置開放式難民營後，引起了區內不少市民對此項措施表示深切的憂慮和保留。有些人士更強烈反對，他們的反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屯門正如其他迅速發展的新市鎮一樣，區內設施的建設遠遠追不上人口的增加，居民因此在生活上要忍受諸多不便。當局在規劃屯門新市鎮的發展時並無將這一批額外的難民人口計算在內，因此開放難民營將會令當地的設施需求更形緊張。在實施該項政策時，政府有責任保證區內居民的生活質素不會因難民營的開放而下降，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加速改善區內需求殷切的措施，否則對屯門居民是非常不公平的。

屯門居民更加關注的是治安問題，越南難民是來自社會制度及生活方式與香港非常不同的地方，他們是否可以順利適應香港的社會環境和法制，是頗大的疑問。無疑大多數難民都是善良和守法的，但由於問題甚爲敏感，就算一小部份難民做出破壞法紀的事，都會對區內居民做成很大的震盪和困擾。

雖然當局已針對上述問題制訂一連串措施，但我希望有關的負責官員能由始至終抱持謹慎警覺的態度，嚴防出亂子，難民營的開放應循序漸進，並經常作出檢討。當局更應與屯門區議會及地方團體保持密切的聯繫，充份諮詢他們的意見。

從《施政報告》得知，政府對於越南難民問題的基本政策，仍然是尋找長遠的解決辦法，因此目前採取的開放措施，只屬於權宜之計，只能治標，不能治本。閣下在《施政報告》中第 129 段指出，政府會繼續促請收容國收容更多越南難民。我覺得這是尋求解決越南難民問題的有效辦法，不過，英國既然是香港的主權國，亦是收容國之一，我認爲英國應該有責任起帶頭作用，率先增加收容額；同時運用英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爲越南難民在外國找尋收容的地方。

主席先生，人道精神是人類崇高品格的表現，但我們在體現該精神時，是應該盡量以不損害本港居民的利益爲原則。

我謹此陳詞，支持動議。

何承天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早一陣子，我在報章上讀到一段轉載自杜勤(Tolkien)所著《Hobbit》的文章：

「他們發覺那位說書人已經漫遊進一個超越了他們的記憶、似是夢鄉的奇妙境界；他們已走進另一個時空，那裏的世界更為廣闊，而海水則一直流奔向西方的海岸」。

我卻肯定並無遺忘一個童年的印象，就是家父帶我到銅鑼灣海旁游泳的情景。在那裡，維多利亞港的海水不時拍擊著現時電車路軌所在的堤岸。我亦記得我們孩童數人結伴踏單車前往中區，沿途無須恐懼被車輛撞倒，或是要吸進汽車噴出的廢氣。

自此以後，香港的人口便持續增加，而經濟亦不斷增長。香港現已取得足以自豪的成就，但我們的生活質素又有甚麼轉變呢？

主席先生，我只打算論及《施政報告》中有關市民生活質素的各方面；為此恐怕要簡括地論述一系列廣泛的問題。

我會把本港的經濟問題留給本局的專家議員去論述。在這方面，我只想回應閣下在《施政報告》內其中一段所表達的感想：「健全和不斷增長的經濟，是我們在致力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方面不可或缺的基礎。」我們深切了解生活中的美好事物都不會是免費的，改善環境和生活質素更肯定要付出費用；因此本港社會便要準備付出代價。

### 房屋 — 我們的居住情況

在考慮生活質素的時候，首要關注的問題應該是我們居住的情況。在香港而言，更要特別關注這問題，因為龐大的公屋建設計劃雖然已為大約 45% 的人口提供住屋，但仍有很多人居住在極度擠迫或權宜的居所。

據估計由一九八五至二零零一年期間，需要興建超過 100 萬個樓宇單位以應付私人 and 公共房屋的需求；為此，當局便有訂立長遠房屋策略的需要。這個策略又需視乎私人發展商的建造數量和房屋委員會所建造而市民可負擔的公屋數目而定。

我要談及房屋委員會所面對的幾個主要問題：

#### 1. 勞工短缺：

一九八七至八八年度，建築業內的勞工短缺問題嚴重妨礙了公共房屋建造工程的進展。這情況現時尚無任何緩和的跡象，現時進行中的建築工程有超過 50% 趕不上原訂的時序。

亦是為了勞工極度短缺這問題，去年度公共房屋的建造成本增加了超過 35%；同時，即使要求本港最大規模的承造商把建造質素維持在合理水平亦愈來愈困難。

如果本港社會關注公屋建設計劃的進度，則肯定有理由考慮從外地輸入數目有限而又屬短期性質的建造業工人。

我知悉若干方面的人士所提出的論調是，勞工短缺問題並非確實存在，這個問題亦可以透過改善薪酬和提供更佳工作條件來解決。我必須指出，這樣做只能作為長遠解決方法。我在稍後會再談論這個問題。

## 2. 舊型屋邨：

在未來 13 年，本港舊型屋邨內將有超逾 500 座現時居住 50 萬人以上的公屋大廈須要重建，因為這些屋邨大廈不能提供我們現在可以接受的居住環境和市容康樂設施。如果建造新公屋的進度受到阻延，較舊型屋邨的及時重建計劃亦會受影響。

這些較舊型屋邨一日未獲重建，當局便須在它們的保養和維修方面負擔大量支出。據估計，房屋委員會在未來五年內將須動用 37 億 3 千萬元在保養維修工程上。這類工程除了須耗用數目不菲的公帑之外，同時亦使這些舊屋邨的居民受到諸多不便和滋擾。

我明白到受大型維修工程影響的屋邨居民會受到諸多不便和滋擾，並對他們寄以同情，但進行這些維修工程都是為了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故我不同意陳英麟議員的意見，認為應停止維修，而應進行重建。因為若要一一重建這些屋邨，而又不影響清拆計劃及輪候公共房屋的市民，政府每年的建造數字可能須要倍增，這當然非現有的人力物力及土地資源所能應付。

## 3. 土地供應：

雖然在統計數字上來說，本港供建造公共房屋的土地現時尚未出現全面短缺的情況，但問題卻在於如何在適當的地點和適當的時間，增闢已經過整理的、備有所需的運輸系統和基本建設的土地。

在長遠房屋策略的第二個發展期（即一九九零至一九九五年），可供公屋建設計劃使用而座落於適當地點的土地供應將愈來愈短缺，因為屆時當局必須在市區尋找土地興建新屋邨，以提供遷置居所給舊型屋邨居民，才可把這些屋邨重建。

到了第三個發展期（即一九九五至二零零一年），我們必須開發大量土地。由開發土地至完成建造工程所需的籌建時間估計是七年。因此，第三個發展期初步所需的若干土地增闢計劃現時差不多已應開始實施。

上述數點是房屋委員會須處理的幾個主要問題。

就公共屋邨的居民來說，他們最關心的切身問題當然是居住的環境。為此，有關當局在規劃公屋的設計和標準時，必須考慮到如何迎合長期的需要和居民日漸提高的期望。這表示要持續不斷檢討和改善公屋的設計和策劃，包括建造新型的標準大廈樓宇，這些樓宇應有更佳的規劃和較大的居住面積。此外，如果它們的設計模式是須動用較少建造工人的，將會受到歡迎。

## 運輸 — 我們的交通設施

無論是晴是雨，在巴士站經常見到串串人龍；公共交通工具內，搭客擠得像鐵罐裡的沙甸魚；馬路上的車輛幾乎首尾相接地爬行前進；人們卻不能截停空着的的士乘搭——這一切都是我們日常所見的景象。

每個人每天平均須耗用兩個小時的寶貴時間，往來於家居和工作地點或其他目的地之間。在很多地區，尤其是在隧道範圍內，嚴重交通擠塞是使交通工具乘客心情緊張和困擾的因由。市民不能在方便、經濟和適意的情況下往來，是影響他們生活質素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外，一個設計周詳的運輸系統正是本港經濟和工業的命脈；而無效率的交通措施會導致生產力的損失，因而社會亦須付出代價。

我們希望進行第二次整體運輸系統研究時，可對我們現有的運輸系統提供若干有用的答案。然而，基於本港的已建設地區有密度極高的樓宇和有限的路面，因此，例如擬議的第3號公路等主要道路建造計劃，雖然極為重要，卻只有助於乘客和貨物在兩大目的地之間的交通往來，而對主要市區範圍內的擠塞情況卻無多大的改善。事實上，建造一條快速公路可能更會加重該路出口的交通負擔，正如獅子山隧道便是經驗中的一個例子。

因此，政府再次考慮實施優先使用道路計劃，我們並不感到驚訝；而私家車使用人士顯然再須讓步。可是，若要限制私家車的活動範圍，而又未能提供方便舒適的公共交通工具作為代替，卻是不正確的做法。正如主席先生在《施政報告》中說過：「香港是一個充滿幹勁的資本主義社會，只要勤奮工作、有進取心，和取得一定的成就，都會得到報酬。」

香港有一個適當的公共交通系統網絡。然而，環顧本港現有的各式公共交通設施，我們又怎能順利說服私家車使用人改乘公共交通工具呢？地下鐵路似乎是方便市民來往的最佳交通工具；但它只限行走主要路線，而且，即使開辦時日尚淺，它在繁忙時間的運作量已經達到飽和點。無論如何，設計地下鐵路時，從沒有以爭取私家車使用人來乘搭為目標，因為兩者之間幾乎並無相通之處。駕車人士並不能在最接近的地下鐵路站找到設施來停泊車輛，然後使用地鐵前往市區。

在港島、九龍近郊和新界大部份沒有鐵路服務的地區，現時並無適意的公共交通工具可作代替。我使用「適意」一詞，因為我認為現有的巴士和公共小巴不是一項代替方式，它們不能吸引私家車使用人轉用公共交通工具。最後，我同意譚惠珠議員所說，我們應更有效運用水上運輸工具。

## 勞工 — 我們如何施工

除了睡眠時間以外，我們大部份時間都是在工作的地方渡過。對於那些在空氣調節辦公室工作的人，工作環境通常不會成為問題。另一方面，如果要吸引年青人從事製造業，尤其是投身建造業，則有需要提供較佳的工作環境。

我在談及房屋問題時曾提到勞工短缺的問題。我們現時所面對的問題是，勞工短缺已導致建築成本大幅度急劇上升。但即使建築成本高漲，生產量和工作質素卻同時下降；這即是說，我們付出更多，得回更少。



雖然勞工短缺是香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但如果建造業未能吸引年青人加入，則建造業勞工短缺的情況可能會成爲更嚴重和持久的問題。隨着教育程度日漸提高，本港年青人在就業方面亦有更多選擇，但建築地盤的工作環境着實不能吸引年青人。

我相信本港的建造業已到達一個轉捩點。隨着本港的經濟日益蓬勃和社會人士的期望日漸提高，有大量廉價勞工可供利用的日子已一去不返。建造業現時應該認真研究如何利用較少依賴勞工的建築方法去改善生產量和工作質素。只有利用較創新的建築方法，才能在建築地盤提供較佳的工作環境。

鑑於政府和房屋委員會所進行的工程性質和數量，它們可以在這方面發揮帶頭作用；而它們亦應該這樣做。爲確保混凝土結構能有較佳質素，房屋委員會現時差不多全部的合約均採用半機械化的建築方式。房委會爲標準大廈，即「和諧式大廈」構思的新設計，將進一步利用模塑構件建築方式的優點，標準構件可在地盤以外的地方製造。房委會亦應研究採用「清水牆壁」的建築方式，以便進一步改善地盤的工作環境。現時傳統的「濕法建牆」磚和灰砂漿建築方式，不單需要許多工人，同時亦是構成建築地盤的工作環境未能得到改善的一個主要障礙。

正如我說過，建造業勞工短缺的問題並無短期的解決辦法。長遠的解決辦法是走向依靠聘用熟練工人的方式，這表示非熟練工人會逐步受到淘汰，而由那些受過較佳訓練的工人取代。這些取代非熟練工人的人士將會爲數較少，但他們會有較高的入息，及在較安全和舒適的工作環境下工作。

### 城市規劃 — 我們的環境

多數人都會將生活質素和周圍的環境直接聯繫起來。潘宗光議員已談及各項有關環境的問題，我十分同意他的見解，故在此不再多說。

因此，我支持當局設立一個特別決策科，專門負責規劃工作和環境保護事宜。由於城市規劃對我們周圍的環境有直接影響，因此考慮環境方面的各項因素應是規劃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雖然有關該決策科的詳情仍未公布，但我相信它將更能集中資源力量，去規劃本港的城市設計和環境保護事宜。

現時，規劃工作分別在不同層次（即全港、次區域和地區層面）之間進行，並涉及不同的政府部門和單位。這種做法不單未能有效地調配人力資源，同時亦會令市民感到混亂。由一個專責部門集中力量去負起城市規劃的職責才是合乎邏輯的做法。

主席先生，我現正協助政府檢討城市規劃條例，該條例自一九三九年制定後實際上一直維持不變。在眾多問題中，當局好應重新審議城市設計委員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考慮將其職責提升至只負責考慮全港和次區域層面的規劃工作；而該委員會現時的部分職責則應交出，以便由數個法定的地區性規劃團體去負責地區層面的規劃工作。在一個新的城市規劃部門（鄭漢鈞議員亦予以支持）的支援下，這些規劃團體會確保公眾人士可參與在各個層面進行的規劃工作。

## 教育和文化 — 我們精神生活的質素

主席先生，最後我希望將教育和文化作為一個題目來談論。本局已於兩週前就教育問題進行廣泛辯論，因此我只想重申本局在上一會期內就青年政策進行辯論時我所提出的意見。

我們的教育制度趨向於過份着重學生的學業成績。這個制度着重的是學生學到多少知識，而非如何發展他的智能。學生如要在一連串不同程度的考試中取得合格，以便進入他們認為理想的學校，以及要在金字塔上攀爬以便獲得一席很多人夢寐以求的高等學府的學位，他便經常受到父母和老師的壓力，而且須將差不多全部課餘時間花在學習和功課上。

在文化活動方面，我們的教育制度並沒有什麼足以支持當局所作聲明之處：「政府的政策是盡量為市民提供參與文娛康樂活動的機會。」

一個社會不應只對其經濟成就引以為榮，同時亦應對其文化傳統和在藝術方面的成就感到自豪。令人奇怪的是，在那些據我們所知會不時缺乏基本物質享受的社會主義國家裡，藝術才會被視為人們的專長，但在香港，我們卻很少利用機會和作出努力去發掘有藝術天才的年輕人，從小加以訓練和培育。

我建議政府應考慮為表演藝術特別設立一間職業先修學校，以便不斷有曾受適當訓練的學生入讀香港演藝學院。香港演藝學院的成功有賴社會人士全力支持，而不應只是本港教育制度中一個孤立的項目。

主席先生，閣下在連續兩年所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均對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表示關注；我對此至感欣慰。我希望我就與我們生活質素有關的房屋、交通、工作環境、城市規劃、教育和文化等各方面所作的漫談不會將聽者帶到「奇妙的境界」。我亦深切希望隨着本港生活質素的改善，較少港人會有需要移居到他們認為是「海闊天空」的西方國家。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夏佳理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閣下的《施政報告》全面周詳，精簡扼要地指出本港必須專心致志及急需處理的重要事項，且讓我追隨本局其他議員向閣下致賀。本年度的《施政報告》，再次證實政府越來越樂於接受新的概念和處事方式。然而，我們必須監察這些政策的推行工作，以確保本港能繼續繁榮發展。一九八二至八七年，大概可說是香港最艱苦的五個年頭，但閣下的《施政報告》卻使我們明白一個顯淺的事實，就是即使本港處於逆境，也很快便會否極泰來。毫無疑問，我相信本局全體議員，特別是我們這群新任議員，均渴望能履行責任，協助當局達成這些目標。主席先生，說完了這些開場白之後，我會簡潔地就《施政報告》所提出的若干事項發表意見。

## 勞工短缺

關於勞工短缺問題，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一項原則，就是在經濟不景時，我們需要工人共濟時艱，而在經濟好景時，則應讓他們分享繁榮成果。然而，我們不應忘記，倘任由勞工短缺問題繼續惡化，便會有損本港的利益，使本港失去競爭力和吸引力。因此，我們必須盡力避免這種情況發生，因為一旦失去市場，便難以再挽回。儘管報章的報導並非如此，建築業確是飽受勞工嚴重短缺問題困擾的行業之一。我們只須翻閱財務委員會所提交的一些文件，便可知道這確是實情。勞工短缺問題所造成的影響，最令人憂心忡忡，而事實上亦是最難以衡量的，可以稱為連鎖反應：勞工短缺不但提高了生產成本，而且會引起兩種同樣嚴重的不良影響，即生產程序普遍受到阻延及質素下降。主席先生，雖然閣下的《施政報告》提出多項解決辦法，同時政府對大量輸入外地勞工的問題亦有所保留，但我深信以本港目前的情況來說，實有充分理由改變現行政策；倘當局不肯作出改變，或許我也會迫於無奈，以這項政策為理由，作為反對聘用外地律師來港執業的另一項論據了。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現在我想談談新的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回顧本港過去數十年來的發展，我們有時須在某些事件發生期間或事後制訂規則。本港現正捨棄這種處事方式，實屬可喜的現象。七十年代初期，證券交易所紛紛成立，故當局必須加以限制，同時為接受存款公司提供運作架構。經過多年來的努力，各證券交易所現已合併為香港聯合交易所，而接受存款公司的架構亦運作良好，可予接受。主席先生，誠如閣下所說：「香港屬於世界市場的一部分」，因此我們不能制訂只適用於本港的規則。在政府的全力推動下，新的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將告成立。然而，倘缺乏聯合交易所和期貨交易所的衷誠合作，成立該委員會亦無多大作用。新的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成立，表示會推行新的規則。近來已有不少市民談論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的其中三項建議：—

第一、該委員會有權要求接受調查者提供一些資料，而這些資料日後可能會成為指控他的證據。

第二、該委員會有權進入商業樓宇，查閱存放於該處的帳目紀錄，並可在必要時將之檢走。

第三、別無獨立於該委員會以外的小組，俾對該委員會所作決定感到不滿的人士，提出上訴。

倡議給予該委員會上述權力的人士，自有充分理由。但不少社會人士，包括專業團體在內，均認為該委員會並無必要擁有這些過於廣泛和籠統的權力。我不知道政府當局把草案提交本局審議之前，能否消除這些歧見。除非上述反對意見確實是毫無根據，否則，賦予該委員會過大的權力，基本上有欠穩妥，亦會引起人們的猜疑。再者，這種做法會否予人一種錯覺，以為本港的股市及期市過去全無監管，因而百孔千瘡？我們必須矯正股市及期市在去年所暴露的弱點，並採取措施加以改革，但應當適可而止。人們往往有矯枉過正的傾向，但我們必須加以抗拒，因為此舉會窒礙股市及期市的運作。隨着本港日漸邁向國際水準的目標，我們必須緊記，本港在過去取得卓越成就，完全是建基於一個運作良好和為人所接受的基礎架構之上，而非對其施加過分監管，本港日後的情況亦有賴於此。

## 基本設施的發展

主席先生，正如金融界必須具有妥為監管的股票及資本市場，才能順利進行業務；我們同樣需要高效率的基本設施，使進出香港以及本港內部的客貨運輸保持暢順，這是維繫經濟增長的要素。因此，我們需要一個新機場、額外的港口設施以及一個運輸網絡，是不容置疑的。這些全是重要的建設，所需費用數以百億計，但若要香港繼續發展和繁榮，我們便不應遲疑不決，必須勇於作出這些承擔。

就基本設施的發展而言，我們所欠缺的是時間。政府毋須詢問應否發展基本設施，真正要問的是：應在何時何地進行？關於時間方面，答案最清楚不過，就是在可行情況下盡快進行。主席先生，政府在邀請私人機構參與重要建設計劃方面，已取得不少專業知識。此方法極有成效及效率，從商業觀點而言亦有可為。此外，私人機構投資建設，顯示其真正對香港具有無比的信心，並非徒託空言，這亦是另一種無形的收益。有鑑於此，政府應盡早決定可用的選擇方案：由政府獨力發展，抑或交由私人機構全力進行，又或彼此合作？應否邀請公眾參與？如何管理及注資進行這些發展計劃？有關計劃如何運作？這種種問題和其他事項現在可予處理，亦應加以處理。這樣才可以節省時間，而興建新機場計劃，亦甚有機會在預算所需的 7 至 12 年時間內，以較接近七年的時間完成。

主席先生，關於運輸網絡方面，切要的是保持交通暢順，一如我不應對今日的辯論作無謂的阻延。因此，我現在便轉入下一個課題。

## 越南船民

我在立法局資歷尚淺，但已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在越南船民這個棘手的問題上，香港並未得到公平的看待。

一九七九年聯合國難民專員公署召開的會議議決，所有離開越南的人士都是難民。因此，如香港讓他們暫時棲身，收容國便會為他們提供永久居所。對於這項安排為何不能貫徹始終，我無意作出論斷，但事情顯然並未循這個既定的路向發展。在這個人人引為憾事的問題上，香港所承擔的義務，已超出其份內所應為，而承擔此義務的時間亦已過久。我只想指出：自從與越南政府展開對話後，解決問題已有了一個開端。儘管如此，各收容國仍會繼續視乎英國是否以身作則，才決定如何行事。現在，英國舉出完全不能令人接受的理由，表明不擬增加難民收容額，使我極端失望。我堅信，香港如要在安排難民移居收容國的工作上獲致成果，則在很大程度上有賴英國大幅提高其收容滯港難民的數額。

## 人才流失

主席先生，現在我想轉談我對人材流失問題的看法。在香港，我們以務實、勤奮和善於應變為榮。人們期望我們做的，我們能做，甚至做得更多。本港經歷了過去數年來的創傷，定必要付出代價。有年輕子女的父母定必關心子女在香港的前途，因為除一九九七問題外，以居住和工作來說，香港是個要求很高的地方。即使在年幼時，兒童已需要接受測試才可以進入幼兒班或幼稚園。倘我們真要設法鼓勵香港市民留在香港居住和工作，便得承認確有移民這回事，然後探研香港

人移居外國的理由。我們不應假裝並無移民此事。大體來說，我認爲人們移民有三大理由，就是經濟、政治或個人理由。有鑑於此，主席先生，我絕對贊同閣下的說法，旅遊或移居是人民的基本自由。的而且確，我們承認這些確是基本自由，因此，外國政府、各大財務機構或其他組織來港推銷移民計劃，我們既無禁止亦無加以勸阻。這開明態度是香港及其自由開放精神的一項重大保證。

我相信過去數年間移民的人許多都是經商移民或投資移民，故很懷疑這是否真的出於經濟理由。我一方面相信有些人是爲個人理由移民，例如爲子女教育、生活質素、以及與家人團聚，但亦相信大部份人移民是由於他們關心香港前途問題。這類人又可以分爲三種：第一種人深信香港沒有前途，我認爲這種人爲數甚少；第二種人採取觀望態度，這種人大抵較第一種人爲多；第三種人則純屬購買保險，希望取得一本外國護照，這種人相信爲數最多。曾有人多番討論，我們應做些甚麼來吸引他們返回香港，所提議的辦法包括多開辦國際學校，方便他們的子女繼續入學，提供吸引人的住房，等等。我們應和已移民的人多點聯絡。在這方面，貿易發展局既在世界各地遍設辦事處，或者可以研究此法是否可行。即使鼓勵他們回港的努力不太有成效，最低限度仍可和他們做點生意。

我很贊同這些意見，但必須強調我們萬不能忘記那些仍在香港居住謀生的絕大多數人士。他們亦有願望，不應因對香港具有信心而受到懲罰。香港有群才智出眾的青年人。主席先生，《施政報告》中提及的多項工程，現正施工以改善他們的生活。這包括擬設立的規劃和環境保護、文娛康樂科以至房屋計劃和屋宇管理。譚王葛鳴議員甚著重青少年的發展，我深表支持，並更關注香港青年人的發展。我們應繼續鼓勵本港的青年人多些參與，而在仍未做到這點的若干範疇，更應加倍努力鼓勵他們參與，因爲我深信，香港他日的成就與繁榮都全賴他們。我深信，倘若我們用使香港獲得現有成就的魄力和心思去處理這問題，便必定能夠成功，但亦須知道，短期內這成就不一定會顯而易見。本港市民對香港深深引以爲榮，對此我毫無疑問。所需者是建立強烈的歸屬感，這才是解決人材流失問題的長遠辦法。

### 社會福利服務

主席先生，我全心全意歡迎私營安老院自願註冊計劃和照顧老人的假日中心。這當然是朝正確方向邁進一步或兩步。但請問這是否已足夠？是否已盡快行事？據悉，現時所提供的服務略嫌不足。香港人的壽命普遍漸次增長，只有迅速處理這項問題，情況才會有所改善。我極力呼籲社會福利服務當局加速進行各項計劃，如有可能即鼓勵私營機構支持這饒有意義的工作。我們不要忘記，今日的老年人乃是昔日的青年人，而今日的青年人亦將會是他日的老年人。

### 基本法草案

主席先生，閣下認爲香港人和國際商貿界對日後頒佈的《基本法》同樣有着期望。我覺得此言甚有道理。因此我確信，我們應鼓勵港人在人大常委會公佈基本法（草案）進行第二次諮詢時繼續積極提供意見。這樣做的理由十分簡單：由於《基本法》會由一九九七年起爲香港特別行政區提供 50 年的政制架構，因此可說是自《聯合聲明》以來對香港人影響最爲深遠的一份重要文件。所以，港人若有意見，爲本身利益計，必須加以表達。

主席先生，在總結前我想支持李鵬飛議員所提有關退伍軍人現仍在港的約 30 名妻室或遺孀。倘若她們的請求不獲准，則可說是無情無義。我因此誠懇希望，香港政府會強調，即使英國政府亦不是說這些年長婦人不應獲發英國護照，而只是說倘她們希望取得英國護照，必須在英國居住三年或五年。我很懷疑，她們是否可以在英國住上這段時間，又為何要為此而離開其丈夫或家人。倘這是唯一障礙，則似乎我不得不提問：如此做法有何目的？因此我在此向簡艾德勳爵呼籲：請為這 30 位值得同情的老婦簽發 30 多份英國護照吧！

主席先生，我陳辭如上，樂於支持當前動議。

鮑磊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閣下對政府的未來工作計劃作出十分詳盡的檢討，我謹此致賀。其中一些項目更是「預告的決定」，計劃在下一年作出決定。我希望政府會果斷作出抉擇，以確保所提及的計劃在一九八九年及以後的日子從速實施。

今天我想集中論述三個主要項目。

### 旅遊業

首先，我想論述對旅遊業特別重要的幾個基本建設項目。

旅遊業將會在本年度再創紀錄，訪港遊客的消費額增幅可能會大大超過 30%，訪港的人數亦會有 23% 的增長。這增長已導致本港面臨一些短期壓力，尤其是人民入境的設施。以至機場整體情況和本港酒店房間的供應。但是，有關方面現正採取積極行動去應付繁忙的情況，尤以酒店業為然。酒店業已致力於龐大的擴展計劃，至一九九一年底可望有 14000 個酒店房間落成。

至於旅遊業所面對的主要基本建設問題，最首要的就是需要政府早日對興建新機場作出決定。我承認「在何處興建」及「如何進行」等問題，尚待解決。但是，對於「何時興建」，相信已無須再三考慮——主席先生，雖然閣下幾乎已就此事宣佈一個確實的決定，我仍然覺得有「懸而未決」的可能性存在。

讓我們排除萬難，現今就把這項計劃付諸實行，以便在一九八九年就新機場財政和地點問題作出決定後，新機場可以在七年內建成。顯而易見，這是一項鉅大的工程，特別是須要進行重大基本建設及發展。但是，我深信以香港素享盛譽的「辦得到」處事方式，及透過公營和私營部門的合作，我們可以達成這目標。

閣下曾提及如果建新機場的計劃得以成功實行，則會增強港人的信心。但是，這計劃要八年或以上才完成。我們所需要的，就是當局今天便要作出增強港人信心的果斷抉擇。香港人和國際間的眼光認為，當局在機場和其他問題上現正拖慢作出決定，讓我們消除這種想法，坐言起行，今天就果敢地作出決定。

我感到失望的，就是當局經過一年的時間進行機場計劃的技術性評估，現在才着手進行財政評估，而這些評估工作又須要多費九個月時間。這些評估工作為甚麼不可以同期執行呢？我猜疑與中國諮詢的問題，會是另一項阻延。假設作某種程度的諮詢確有需要，讓我們使中國當局對此事的認知程度趕上我們今天所達致的研究地步，並且不時通知中國方面有關此計劃的發展情況。無論當局的主要設想屬意於由機場當局進行或交由私營機構發展或公私一同發展，均宜及早設立有關組織及聘請行政總裁，以主其事，切勿延遲。

我非常歡迎當局對繼續發展啓德機場設施的承擔，這些工作對於保持本港作為旅遊目的地的聲譽，至為重要。我希望下一階段的機場改善工程，會立即着手進行。

於本年底開始啓用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將會是本港發展成為旅遊目的地的一個重要里程碑。為此，我促請政府放寬東歐遊客來港訪問。至今我們已見到在這方面有若干進展，但情況仍然不明朗。我希望在國際關係普遍日趨改善的情況下，我們在放寬東歐遊客入境方面能有更大的進展。

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目前在發展文娛康樂活動方面所採取的步驟，對於旅遊業亦至為重要。本港必須繼續提供新設施及主辦對本地人士及外國遊客一樣吸引的文康活動。保護文物古蹟對香港亦至為重要，因為香港的基本特色可藉此得以保留。主席先生，閣下提及的鄉區規劃亦屬重要，因為香港的鄉村地區可藉此得以開發，同時亦獲得保留。所有這些要素將會有助於旅遊業實現其鼓勵遊客在本港逗留多一天的目標。

香港旅遊協會及旅遊業人士將會致力支持這些本地發展項目，從而為香港的未來奠定紮實的基礎，當新機場啓用後，旅遊業將會得到進一步的推動。

### 勞工短缺

主席先生，我想講的第二個項目，就是勞工短缺問題。當局已指出通貨膨脹及勞工短缺是本港兩個主要的內部隱憂問題。

首先要說明的，就是私營機構接受以下想法：實質工資在長遠來說應提高，而在經濟好景時，勞動人口應可分享成果。但是，除非我們採取行動去減低勞工短缺問題的嚴重性，否則短期受益的人士，將會連同其他人等最後蒙受通貨膨脹急劇惡化、在國際上失去競爭力及連帶影響經濟不景所帶來的痛苦。

當局認為人手不足只在某些行業造成問題。請問以當局的見解，甚麼行業不受勞工短缺問題所影響呢？主席先生，情況就是本港每一個經濟環節：製造、零售、建築、酒店、公用事業、批發等行業，都存有人手不足問題。當局解答立法局議員最近的質詢時，實際亦提及這些情況。SRI 顧問公司亦已指出這是本港經濟所面對的主要問題，顧問公司在最近多個星期所會晤的 150 個組織中，幾乎全部都證實這人手不足情況。

本港目前的職位空缺超過 10 萬個，在社會各行業中，職員流動率已急劇上升。

政府敦促各行業提高生產力，這是正確的，但是各行業所能辦到者，亦有極限，尤以某些服務行業和建築業為然。在私營機構方面，並沒有人提議無限制地輸入勞工，阻礙提高生產力。我們所需要的，就是開放一道活門，以紓解一些壓力。

我看不到如何能夠藉着改善工資和工作環境使勞動人口顯著地增加。鼓勵更多婦女加入勞動行列可能有幫助——本港就業婦女的比率是 49%，美國的比率則是 56%。但是，由於兩地的社會習俗和風氣互不相同，差別可能不大。

倘若當局有任何總體經濟研究的資料（以長遠經濟推測為基礎而進行研究）顯示出在提高生產力和工資的情況下，經濟方面所受到的短期損害可以獲得彌補，而勞工短缺問題將會消失，則當局實應提供這些資料，以便參考。

受勞工短缺問題影響最深的環節是建築業。我們極有理由容許承建商輸入工人，為特定的工程工作。由於近期承投工程的標書價目比預算的金額超出甚多，而且自一九八七年六月以來投標價目指數已上升 35%，故此當局會充份了解建築行業的通貨膨脹情況。要完成現有的工程合約已成為建築業的大問題。如果目前的勞工短缺問題仍未獲解決，則在二〇〇一年建成 100 萬個住宅單位的龐大工程目標，將會延遲兩三年才能辦到。土地發展公司計劃的實行，亦會在九七年代初期遭遇困難。在承建新機場和其他多項主要基本建設方面，如果建築業無法增加勞工人數，我看不出建新機場和其他基本建設項目可以及時而又符合經濟效益的情況下完成。

我們須知道，上述問題不是香港所獨有。幾乎所有成功的經濟體系，包括鄰近的新加坡和澳門，都有僱用外地工人。

自一九八七年中以來，私營機構一直提出輸入外地勞工這項建議，但似乎無法令政府相信問題已達嚴重程度。主張輸入外地勞工的人士，現在應提出詳細及實際的建議。

這問題仍然是整個經濟體系的主要憂慮。社會人士普遍感到失望，尤以建築業為然，因為當局較早前的結論是無意改變政策。

我支持張鑑泉議員的建議，謹請政府立即設立一高層工作小組，成員包括私人機構代表，以就勞工供求事宜，研究本港經濟的長遠總體經濟預測，提出改善生產力的建議，確定是否可以增加勞動人口，同時研究短期輸入外地勞工的建議細節。這個小組應能於一九八九年農曆新年之前提交報告。

主席先生，最後，在評論移民問題方面，政府常常提及人口流動性的歷史背景，讓我們緊記，傳統上，人民的移居情況一直都是雙向流動，有人移入，亦有人移出香港。

### 中港關係

主席先生，我想講的第三個項目是有關中國方面。

對於中港之間已發展的廣泛聯繫，不論高層人員的接觸，其中包括主席先生定期北上訪問，以及透過工作層面的交流，我都極表歡迎。



立法局及當局以至整個社會，應維持對基本法草案的關注，此點至為重要。基於這問題的繁複性，除專業團體外，公眾人士對基本法草案的興趣，一直不見得熱烈，這情況大概不會令人覺得詫異。但是，我希望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及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將會繼續激發人們的興趣，而立法局亦須盡量予以支持。

一九九七年平穩過渡是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問題，亦成為閣下最近訪問北京時一項重要的商討事項，並似乎已能就此重要事項取得具體的進展，這是我喜見樂聞的。

主席先生，閣下對於香港在中國現代化方面所將會負起的積極任務，深具信心，我亦有同感。10年前，有人認為，隨着中國其他地區的開放和興旺，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會削弱香港的地位，雖然中國的經濟在近10年間有長足的進步，但是香港的地位顯得更形重要，而且其重要性現今已伸展到整個經濟環節，包括貿易、投資、金融服務、運輸、科技傳送及管理。

閣下曾提及本港與廣東省，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聯繫，日益密切。我最近花了四天時間去旅行，從澳門經由陸路一直返回香港，途經珠江三角洲東西兩面的市鎮和鄉村，這一帶地方代表中國改革的經濟動力源泉。這些地方所取得的進步，是我所見經濟增長最具爆炸性的地區之一。但我相信這只不過是在未來10年所出現的蓬勃經濟增長的開端而已。

在中國的龐大地域中，華南地區、台灣、香港和澳門等地形成一個經濟整體，香港正位於中心點，在維持這地區的發展上擔當重要的角色，欣欣向榮，這景象實在是令人鼓舞。

主席先生，本港社會，我意思是指整個社會——香港人、私營機構、政府當局等——我們必須具備自信心，好讓我們過渡未來10年，以至到下一個年代。讓我們把這年代看作是機會的來臨。

懷着這樣遠大的眼光及本着閣下已簡要說明的施政方針辦事，本港肯定會取得進步。我們不要怕作出決定性的抉擇。我們要勇往直前。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鄭明訓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閣下所發表的施政報告，思慮週詳、內容均衡，我與其他同事一樣，向閣下表示謝意。

對於獲委任為本局議員，我甚感榮幸。作為新任議員，我期待向各位官守及非官守議員學習，與他們交換意見，並希望藉此在這個重要的過渡時期，為本港的福祉作出若干有用的貢獻。

無論我們從事公職抑或在私人機構工作，大家都應該關心香港的最佳利益。然而，我們當前的任務應是甚麼？倘若我嘗試用這任務聲明，道出我們應該一同努力的目標，希望不會被認為是班門弄斧。至少就個人而言，我覺得這樣有助我集中注意當前要務。

我認爲我們的任務有以下兩方面：

- (1)使本港在亞太地區保持其作爲商業及金融中心的確實領導地位，並全面致力於推廣自由公平貿易；及
- (2)創造及發展具有質素的生活環境，使到居於斯的本港居民及選擇以香港爲家的國際人士，在工作及生活方面均獲平等機會，和諧共處。

根據這些目標，我想就若干事項發表意見。本港經濟的增長率雖然放緩，但與世界大多數國家比較，仍屬情況良好。一直以來的業績足以令本港自豪。對於政府全體人員的努力及貢獻，令本港取得驕人成就，我們亦應致予謝意。不過，由於全球的經濟前景並不明朗，我們實不容自滿。保護主義情緒仍然肆虐，而且並不單止局限於美國，在其他工業國家及經濟體系亦日漸滋長。到了一九九二年，歐洲共同市場將有 3.8 億消費者。儘管各官員多次提出保證，但有關方面仍有可能制定障礙措施，來保護該地區若干工業。即使自由貿易的支持者如美國候任總統布殊，仍須面對華盛頓由民主黨控制的參眾兩院。保護主義的貿易法案，尤其在紡織方面，很可能又再抬頭。因此，我們必須繼續一致努力，推廣香港的自由貿易形象，並消除任何可能被解釋爲不合理的措施，其中包括專業界的業務方式，以便能繼續提出有力證明，證實香港是一個開放市場，有別於其鄰近的市場及國家。許多經濟專家均預測美國的通貨膨脹在一九八九年將會加劇，可能造成進一步壓力令利率上升，從而減低美國的消費需求，影響香港對這個最大海外市場的出口。預料美元明年將會進一步疲弱。爲了保持本港產品價格的競爭力，當局不應更改港幣的聯繫匯率或容許港幣自由浮動。

在過去數年，香港作出不少努力，拓展歐洲及日本的出口市場，這方面的努力不但仍須繼續，而且尚須加強，本港必須在世界各地開拓更多市場，以便本港的出口平均分佈於全球各地，避免對個別市場的倚賴。香港貿易發展局與貿易署及工業署在促進貿易發展及外國投資方面一向緊密合作，但海外人士對它們擔任的工作仍有混淆。當局須進一步檢討此問題，以確保各項工作及資源運用能符合成本效益。除此之外，我建議籌組更多貿易考察團，讓更多方面的人士參與。我們需要來自貿易、製造業及服務行業的高層辦事人員參與。此舉將有助於提高爭取外國投資的成功率及增加貿易額。

毫無疑問，香港作爲亞太地區的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其地位日益重要；因此，對於政府承諾繼續發展充裕的基本設施以應付預期的增長及需求，我感到鼓舞。爲了保持本港的中心地位，我們必須興建新機場、增加港口吞吐量、改善道路網絡及在資訊科技發展方面努力趕上國際水平。

主席先生，閣下指出中港關係是影響香港經濟前景的主要因素之一，此點非常正確。閣下認爲香港必須繼續對中國，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發展發揮重要作用，我對此深表贊同。

勞工短缺是一個複雜問題。雖然政府就若干類熟練勞工所採取的政策已算靈活，但據我瞭解，若干行業，例如建造業及製衣業，勞工短缺情況非常嚴重。我認爲本港應考慮其他地方已見成效的例子，例如新加坡及關島所推行的計劃，研究可否借鏡，在本港推行。舉例來說，我獲悉任何外國投資者如決定在關島興建酒店，可從外地輸入建築工人以進行該項工程，但有關工人必須在

工程完竣後離境。我明白這種做法涉及其他問題。主席先生，我所主張的，是我們須對此事保持開明態度，我們絕不應讓勞工短缺問題對香港的蓬勃發展造成任何不利影響。

有關人力資源問題，我們不但需要透過本港的教育制度加強培育年青一代，亦須考慮為培育年青一代的人士提供訓練計劃。例如，我現正與香港大學的校方人士進行初步磋商，研究可否為非商業課程的教學人員提供研究員職位，以便他們在敝公司工作六至 12 個月，藉此加深瞭解商界人士對大學畢業生的期望。

有關我們的首項任務，我擬提出最後一點意見，科學與技術委員會應多着重於研究生物工藝學等新領域，而不是只懂步人後塵。隨着遷往中國境內的製造業工廠日益增加，香港可以有機會成為鄰近地區輸往北美及歐洲的多種產品的設計及品質控制中心。鑑於產品的責任承擔問題在美國及其他國家日形重要，當局應鼓勵在測試及檢查服務方面的科技發展。

現在談到第二項任務。閣下在施政報告中對改善環境及生活質素相當重視，令人甚感欣慰。我尚未有機會深入研究現時負責防止環境污染的組織結構。不過，我曾閱讀數篇文章，似乎全都顯示在監察污染問題的方法上，以及在執行管制方面，確實有待改善。如果我們要致力改善環境，便必須排除政治及財政方面繁瑣的公事程序。任何事物均有其代價，工業界人士必須率先願意付出應付的代價。我們不應再唯利是圖，而應多關心社會。我們現在談論的是態度方面的改變，因此我鼓勵政府採取勇敢而果斷的行動，在這方面作出改善，我們需要一個「虎虎有生氣」具真正威力的計劃。

在改善本港市民的生活質素方面，我希望談及另一個題目，這就是文娛、康樂及體育事項。我最近初次出席立法局財務委員會會議，對於兩個獲資助的文化團體可以毫不困難地便獲得以百萬元計的額外經費，以應付其收支不平衡的情況，我甚為詫異。無疑，這反映出負責這些文化活動的人士的管理。在商界，若不能按照預算量入為出，定遭革職。雖然在現階段，我不大熟悉本港文化活動的組織結構，但我必須質疑有關管理當局的可靠程度。

在體育方面，看來本港具有良好的體育設施，我相信本港青年人中不乏具備潛質可達致世界水準的人材。然而，許多體育活動的發展都因體育會彼此互爭長短而受阻。我們應該趁這時候，在這領域發掘若干新的領導力量，使本港能推行適當的發展及訓練，讓青年人有機會在國際賽事中充滿自信地與其他運動員競賽。

主席先生，為達成任務，我們必須鼓勵政府與私人機構之間緊密合作，亦須力求創新、勇於作出抉擇。

最重要者，我們必須以審慎態度及靈活手腕處理本港的前途。鼓吹任何意識形態上的改革冒進，將會甚為危險，因為此種做法不單止不負責任，而且亦嚴重損害本港市民的利益。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鄭德健議員致辭：主席先生，閣下的施政報告提出了一系列的工作方針，既詳盡又務實，充份顯示出政府維持本港經濟繁榮和改善港人生活質素的決心，對於這份報告，我深表歡迎。

## 教育

「教育是造就我們力爭上游的原動力，」亦能帶動社會繼續繁榮」。在《施政報告》中，喜見政府在盡量提供足夠學位的同時，更著重改善教育質素。

從《施政報告》，可見政府已有計劃地擴展專上教育院校的學額；亦開辦科技大學及加強工業學院與職業訓練局來培訓科技人才；更開辦公開學院，為成人延續教育定下確實的方案，是令人鼓舞的決定。

要改善教育質素，我認為可考慮給予資助學校行政上的自主權。目前本港教育的重擔，資助學校承擔一極大的比重——中學有 68%，小學有 84% 的學童在資助學校中接受教育。而資助學校的行政，如學生的管教、學校的設備及科目的開設等，均須嚴格遵照資助則例之規定及署長隨時頒佈有關資助學校之指示辦理，運作呆滯缺乏彈性，令每間學校不能發揮其特性。政府過份要求各校行動一致，忽略了每間學校的要求各有不同，使學校管理倍加困難。

其實，教育制度應建立基礎於教育功能的運作上，教育制度的修訂，亦應以達至良好教育功能為大前提。現代教育行政趨向民主，教育亦強調因材施教。地區不同就有不同的問題出現，必須靈活處理，方有成效。因此，在改善教育質素的大前提下，我認為須放寬及簡化「資助則例」，政府應給予校方在行政上有更大的自主權，以切合家長、學生及社會的需求，及使教師能發揮專業長才。這樣學校既可避免墨守成規，教育質素亦必可提高。

《施政報告》又提到提高購買學位的私校水準，最終是取消現行買位制度，代之以直接資助高水準私校的制度，以便提供一個強大的私校體制。此項建議，是改善教育質素一個重要的環節。目前私校得政府的資助不多，財政問題導至學校設備不足，未能聘請與官津校同等資歷的教師，而兩者又與教育質素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故當前急務，必須提高私校的教師質素和教學設施，才能發揮私校高度的教育功能。同時，我們亦須關注另一個問題，自津補學校可轉為私校的建議公佈後，部份津補中學教師因對前景不明而萌生不安情緒。因此，謹請政府盡早提出此計劃的具體實施方法，確保教職員薪酬、福利及職業等得到充份的保障。

## 房屋

公營房屋一直是本港一項重大建設，佔工務建設總開支約三分之一，而全港亦約有 40% 的人口是居於租住公屋之中，但市民對公屋的需求卻有增無減，所以對這項龐大的建設，我們必需謹慎規劃，小心處理。

我好高興政府已定下長遠房屋策略，將舊型公屋重建，我對此計劃極表贊同。這不單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亦有助地區重新發展，猶如新陳代謝作用。當一個舊區發展至極限，便有需要再重新建設和規劃，使地區建設配合社會發展。

事實上，早期的公屋因缺乏完善的計劃，基本設施簡陋，居住面積細小，環境衛生不佳，社會服務及康樂設施不足，與現時的生活水平不相符。

我曾在慈雲山將受重建影響的慈安及慈民邨作過一次調查，主要收集居民的意見。發出問卷 6422 份，收回率達 63%。調查結果顯示平均每個家庭居住六位成員，居住面積則平均 15 平方米，由此便可了解其擠迫情況；又接近四成居民希望能提早搬到較大和環境較好的屋邨居住，減低居住的擠迫情況。此外，資料又顯示接近四成居民表示，在經濟情況許可下，願購買居屋，主動改善現時的居住環境。

故我希望政府能加速進行公屋重建計劃，盡快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又希望政府增加興建居者有其屋和將自置居所貸款計劃中首期免息貸款額提高，吸引更多有較好經濟能力的公屋居民購買私人樓宇，紓緩公屋的需求量。

## 移民

談到移民問題，很遺憾，有些人士過份悲觀地誇大了這問題。其實，在民主社會裏，市民自由選擇移居別處，是很自然的。長期以來，移民是普遍存在：一些爲了尋求家人的團聚、一些爲了尋求生活質素的改善。近年來，爲了尋求某種形式的心理保障而移民增多了；一般人士便認爲移民造成了嚴重的人才外流。其實，據政府成立的工作小組估計：今年約有四萬多人移居外地，而這些移民中，又只有低於四分之一是專業人士，故我相信已移民的並非全是人才，而決定留港發展的人士亦非「次貨」，與謝志偉議員的看法相同。

不過，既然存在了移民事實，或多或少，人才流失是必然的。很高興政府積極地以實事求是的方法去處理這個問題。

要解決人才外流的困擾，《施政報告》提出了加強分析流失人才的專業資格，積極推展教育和培訓計劃來填補移民所造成的空缺。培訓人才是推動本港發展的原動力，這方法，我十分讚賞。

至於吸引人才回流的政策，可使人才迅速投入社會，不失爲一治標的方法。但是，這仍只是一個權宜之計，昨日多位資深議員已從不同的角度指出過於熱衷推動，或會適得其反。我想再指出一個可能出現的問題：個人回流香港，而家人留在外地，便須把個人在本港工作或投資所賺取的金錢，不斷地匯離本港，對本港經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因此，我認爲過份重視吸引移居海外人士的回流，不如積極設法使港人留港發展。我們應該用實際的行動來安定市民的信心和提高歸屬感，維持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安定，積極地加強本港的基本設施，具體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包括教育、治安、房屋、交通及環境等，相信這才是長遠的解決方法。

## 私人退休金計劃

根據統計處的資料顯示，本港老人人口會持續上升，去年 60 歲以上的老人有 67 多萬，估計到本世紀末老人人口將接近 97 萬的數字。隨着社會轉變及西方文化影響，照顧老人退休生活的責任大多由社會承擔。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到這龐大的老年人口對將來的社會保障計劃帶來極沉重的壓力，所以我們覺察到退休金制度的設立是必然和必需的。

一個完善的退休金制度是可以保障勞工退休後的生活，同時退休金計劃亦可以減少退休人士對社會保障的依賴，使政府的資源能有較平均的分配，退休金計劃又可以令勞工安心目前的工作，減少勞工的流動率。

但由於退休金計劃涉及龐大的資金，如果沒有完善的監管，一旦出現問題時，如投資不善、被人非法盜用或騙取資金等，不單勞工直接蒙受慘痛的損失，在退休時拿不到應得的退休金，就連資金市場亦因此筆龐大資金投資不善，波動市場造成連鎖性的影響，所以在贊同設立退休金制度時，亦要定立監管條例，以確保退休金計劃能完善推行。

雖然政府較早時已發出諮詢文件，收集有關監管私人退休金計劃的意見，但強調只着重監管的內容。然而，我卻認為政府應進一步研究強制私人機構參與退休金計劃，因為只有此計劃全面推行，日後才能減少政府在社會保障計劃的龐大負擔。

### 越南船民

《施政報告》對於處理越南船民，指出既須遵守人道原則，也要顧及本港社會人士的需要，政策原則是正確的。

但是，本質上，越南難民是國際性的問題，由香港來承擔是不公平的。英國既是收容國之一，又是本港宗主國，在承擔解決船民問題，是責無旁貸的。但是，近五年來，英國收容本港越南難民卻不足 1000 人，較諸美國或加拿大收容額低五倍。因此，港府應促使英國政府起帶頭作用，多收容滯港的難民，並盡力與越南政府達成遣返「非難民」的協議，加速解決本港越南船民的問題。

至於實施開放營政策，雖可使越南難民重新投入社會，增加他們移民外地的機會，亦可稍稍紓緩本港勞工短缺的壓力。但越南難民來自不同的社會及文化背景，亦因此會容易造成地區上的衝突與治安問題，並牽涉到資源的分配，當地的公共設施是否足夠的問題。因此，我謹請港府在任何地區設開放營之前，必須有足夠的公共設施與人力資源，確保本港社會人士之權益不致因此而被剝奪。

### 藥物濫用

警方最近接二連三偵破販毒案件，緝獲毒品數量龐大，對販毒活動打擊著實不少。對警方迅速而有效的行動，我們感到十分讚賞，但在破獲這些販毒案件的背後，我們不禁產生了疑問！我們一直擁有一支高效率的警隊，則近期的行動，是否顯示香港的販毒活動有增加的趨勢，香港又是否已成為國際販毒集團的毒品轉運站呢？

對於毒品的禍害，我更關心青少年吸毒的情況。

主席先生，閣下在報告書中根據藥物濫用資料中央檔案室的紀錄指出新吸毒人數再度下降，這是我們感到高興的消息。但很可惜同樣在中央檔案室的資料中我們發現自一九八五年至今的連續四年，21 歲以下新服食「丸仔」的青少年人數，維持在新服食「丸仔」總人數的 80% 以上而

不變，並同時顯示出吸毒者的年齡結構有向下降的轉變。而另一個令我們感到憂心的問題是中學生服食「丸仔」的情況，根據較早前禁毒常務委員會所作的一項調查顯示，有 1.1% 的中學生和 2.8% 的工業學院學生曾服食「丸仔」，情況十分嚴重。

雖然政府在毒品問題上已做了不少工作，但對降低青少年服食「丸仔」的人數並沒有改善，故我希望政府能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對青少年多做輔導及宣傳教育。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張子江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我十分欣賞《施政報告》的內容，更欣賞當局在處理本港所面對的各種問題時所採取的積極態度。主席先生，閣下在《施政報告》指出：「沒有一個社會是不受它們（意指問題）困擾的。重要的是：我們願意坦誠地面對各項問題，同時切實地加以處理。」我衷心希望並且相信在未來的日子，當局必會努力實現各項計劃，特別是那些針對解決越南難民問題的計劃。英國政府在道義上有責任收容更多在香港的越南難民，以作為模範，鼓勵其他國家仿效。至於在本港方面，我支持開放營政策，但我促請當局盡一切辦法減輕市民的憂慮，因為他們並非杞人憂天。

現在，我想談談一個相當重要的題目，就是本港的青年問題及加以處理的方法。

鑑於本港缺乏天然資源，人才就是本港最豐富的資源，特別以年青人為然。因此，我們必須盡最大努力，培育年青的一代，幫助他們作好準備，以應付日後新的挑戰。我們不應將這份責任完全交託給教師及社會工作者。誠然，我們需要處理很多其他工作，但培育青少年這項重要使命，卻是不容忽視的。

說到青少年問題，就不能不談談教育問題。不過，我不打算詳述教育問題，因為范徐麗泰議員昨天已在演辭中暢談她的意見，而我深表支持，特別是有關資助則例方面。故此，現在我只想談論三點。我認為這三點是與本港教育制度的基本問題息息相關。本港年青人的學業成績較諸其他國家的學生，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本港教育制度的最大障礙就是學生缺乏接受專上教育的機會，以及需要透過一種他們並未精通的語言來學習。我希望有關方面盡一切努力增加專上學位及重新檢討現行的語文政策。我深知目前一般社會人士都認為母語教學沒有甚麼好處和價值。但事實上，對本港大部份年青人來說，母語教學才是他們真正需要的教學方式。讓我們撫心自問，難道其他國家的學生亦應採用外語上課嗎？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均不會懷疑，在香港這樣的城市，英語確有重要的地位，但學習英語跟用英語去學習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相信人人皆明白其中的分別。本港從實施九年強迫教育開始，便採用了錯誤的語文政策。我們和學生家長似乎都相信，只要子女是在英文中學就讀，就會學有所成，但事實並非如此，除非學童精通該語言。政府一方面固然應該保留選擇自由，讓較優秀的學生選讀英文學校，同時設法令所有學生盡量多學英文，使他們的英語程度可以達到一定的水平，而在另一方面，當局亦應創造適當環境，令到選擇透過母語學習一般科目而英文科成績又達到規定標準的學生，在就業和升學方面都不會遇到不

應有的障礙。這樣，學生才算是真正享有選擇的權利。透過一種陌生而又不熟練的外語來學習是件苦事，可惜多年來這種現象一直存在。我認為這是本港強迫教育制度的最大弊端，必須予以重新檢討。

此外，我亦期望當局可以加速進行將半日制小學改為全日制的工作。從教育觀點而言，半日制小學並不可取，特別是對小學較高班的學生。

現在讓我轉談另一些問題。過去 20 多年來，我每日與青年人接觸，發覺他們的價值觀起了明顯的轉變。可惜並非變得更好，卻是變得更差。這應該歸咎於誰？問題極端複雜，不過，沒有人能說自己完全毋須負上責任。

一九六七年本港發生暴動，令全港市民驚惶失措。動亂平息後，人們便開始尋求補救辦法。在眾多的建議當中，補救青年問題的方法似乎成為焦點。當局千方百計，盡了一切辦法和努力，滿足青年人的需要。當時一般的想法是青年人是失落的一群，在四方八面的壓力下飽受折磨，因此需要社會人士關懷照顧。於是，青年中心陸續成立，週末聯歡會相繼舉辦，而傳播媒介亦大事渲染，報導同情青年人處境的訊息。但時移勢易，主席先生，我現在感到本港年青的一代是受到過份縱容和溺愛，以致情況已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在麥理浩爵士就任總督期間，香港的經濟發展空前蓬勃。香港市民的生活方式亦隨著改變，開始趨向實利主義。追求物質享樂或感官上的刺激，成為一時風尚。各類物質商品的湧現，使人變為貪得無厭，以致辛勤工作這種優良的美德，亦變成賺取金錢以換取更多物質和享樂的途徑。而這種慾望，就像一個無底深淵。若無法得到渴望的事物，有些人就會不擇手段，罪案因而增加。

賭博合法化、六合彩，及傳播媒介每日報導透過那種財經途徑轉瞬間可謀取暴利的消息，使本港市民漸漸形成投機的心態，希望付出最少勞力，在最短時間內謀取最大利益。本港的成年人顯然都抱有這種心態，而青年人亦同樣易受這種風氣影響。堅毅不屈、處事負責、正直誠懇等美德，已逐漸為投機取巧、急功近利、敷衍塞責及各種花巧手段所取代，令人不勝感嘆。一般人，特別是年青人，只要遇到略為困難的工作，甚至一般工作，便會埋怨受到壓力。即使在求學方面，學生亦抱着同樣心態，採用取巧的方法。他們應付考試時，不再是努力溫習功課，而是猜測試題及倚靠那些所謂「天書」。學生對知識的探求只流於表面化，大部份學生沒有閱讀的習慣，功課稍多便不願去做，高中和大學學生擔任兼職的情況非常普遍，但往往都缺乏正確的理由和目的。

傳播媒介亦無甚幫助。若周梁淑怡議員今天出席，我一定要請她包容。各種傳媒，尤其是電視，已成為本港青年的「文化」來源。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青年人每日平均花上四至五小時看電視。充滿魅力、高雅氣氛和虛榮心態的選美會在電視螢幕前陸續推出；使男女老幼均著迷的長篇劇集每天依時播放；送出獎金的節目吸引了大群渴望不勞而獲的觀眾；偶像和新偶像大賽使青年人感到勾然心動，趨之若鶩。主席先生，電視已迷惑了我們年青的一代，看電視已成為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電視明星、藝人及歌星都成為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偶像。此外，色情雜誌、連環圖書和錄影帶充斥市面，色情電影、電子遊戲機中心、桌球室、配以耀目燈光和響亮音樂的士高、含酒精的飲品、快餐店等等亦隨處可見，這一切都形成一種節奏快速的生活方式，只顧追求物質生活、肉體感官方面的享受和虛榮心的滿足。



主席先生，說到這裏，我悲嘆地問一句：「我們具有體育天賦的青年人去了那裏？」我們親眼看到學童及香港代表隊的運動成績日漸低落，無論是足球、籃球、排球抑或體操都出現這種現象。香港的足球隊以往一直在東南亞的比賽中稱雄，而球類比賽亦會引來大群觀眾。但現在入場觀賽的人寥寥可數，亦難見到有球員的技術可比得上已退休的一輩，如姚卓然、張子岱、胡國雄等。但香港今天是否真的缺乏這種人才？很多人、包括我在內都認為不是。以我所見，運動水準低落的原因是我們的青年人對於戶外康樂運動已失卻興趣及熱誠，取而代之，他們沉迷於電子遊戲、桌球、的士高舞蹈及流行音樂會等玩意，這些都是有跡可尋的。為使青年人得到較均衡的發展，我建議當局應設法將青年人帶回運動場及運動場館中。

主席先生，我希望我所描繪的景象不是過於灰暗；我只是試圖實際一點，說出現實情況。我亦並非漠視本港青年人所具有的種種值得讚賞的質素。我必須再次強調，本港的青年人都聰明機靈、具有很強的適應力和良好的潛質。我剛才描繪的，只是針對他們的價值觀和人生哲學。而面對當前的情況，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往往感到束手無策。

主席先生，我不敢說我有解決辦法，而事實上，要解決這些問題亦不容易。然而，我認為本港各方面的領導者，都有責任參與這項無可避免而又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無論如何艱辛，他們也要同心協力，盡一切辦法創造一個新的社會環境，好讓本港年青的一代能夠在有安全感、愉快和有意義的情況下成長，而同時又向他們灌輸各種美德，例如勤奮向上、自尊莊重、誠實有禮、正直和堅忍，使他們能有信心負起面對將來的責任。這種成長氣氛亦有助於將年青人的生活重點轉移，使他們不再耽於浮誇揮霍的生活，或沉溺於物質的享受和追求。

主席先生，我感到悲痛並非因為本港的青年人沒有能力學習和取得成就，而是由於他們過份熱衷於追求和維持這種生活方式，以致往往將事情的輕重顛倒。我籲請當局及各有關人士認真考慮，究竟我們成年人能做些什麼去改變社會的風氣、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以及如何以身作則，向本港的青年人顯示怎樣生活才有意義。同時，我們必須對本港青年的實際情況作出正確的評估，以便盡快訂定一套合理可行的青年政策。無論最後由誰來制訂這套政策，負責這項工作的人千萬不可只照顧青年人的需要，因為這些需要都是顯而易見的。有關的政策必須切實針對他們的缺點、不當之處、他們那看來是錯誤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們對自己、家庭和社會的責任。訂定政策時，應設法將青年人的潛質、能力和其他可取的質素導向正確的途徑，使能適當地發揮。香港的前途有賴我們的年青人，社會各界人士必須齊心協力邁向這個目標。這問題亟待解決，刻不容緩。就讓我們立即坐言起行，採取正確的行動吧。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下午四時二十八分

主席（譯文）：仍有甚多議員希望發言，本局會議至此暫停，略作小休。

下午四時五十四分

主席（譯文）：本局會議，現告恢復。

梁智鴻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閣下關懷本港市民的健康護理問題，亦了解醫學界人員的困難：知道他們一方面工作繁重，另一方面則須跟上醫學界的最新發展，醫學界特表謝意。

閣下在《施政報告》中，以六段的篇幅暢論醫療衛生服務，主要談及成立一個新的醫院制度，以及改善公營部門醫生的服務。無疑，這些言論已大大減輕有關方面的疑慮。可是，我們亦深知政府官僚架構的惰性，我們極為關注實施的時間。此外，我們亦感到可惜，香港醫務衛生制度尚有不少問題迄未獲得審慎考慮。

因此，我希望藉着這個機會，與當局分享一下醫學界對某些較嚴重問題的意見。在分享意見的當兒，我們內心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與當局分享意見和合作，為社會提供一個更好的健康護理制度。

香港在提供健康護理方面，具備優良的紀錄。我們的嬰兒夭折率，是全世界最低者之一。雖然我們的環境擠迫狹窄，隨時會感染到由外地傳入的多種疾病，但我們多年來都沒有發生時疫。現時，香港每 1000 人就有 4.5 張醫院病床，而據知當局會在未來 10 年內，增設 13000 張病床。在過去 10 年中，醫療衛生方面的撥款增加了六倍，截至一九八七年止，費用達 45 億元，雖然這個數字只佔週年財政預算約 10%。

對於普通人來說，他只須每日付出 26 元的象徵費用，便可獲得各式各樣的醫療照顧、外科手術和最新的檢查。如果證明他經濟上有困難，則連這項象徵式的收費也可豁免。當然，他要忍受一個非常擠迫、病人數目通常比預算人數高達兩倍之多的醫院環境。此外，他會感覺到欠缺對他個人的關心，因為他不能自行選擇醫生，而且如果他的病情較輕，不需要優先治療的話，他便要等待一段長時間，方能獲得治療。

在一個像香港似的自由企業社會，他可以自行支付醫藥費，在一所私立醫療機構中接受治療，享受種種公立醫院不提供的額外服務。這個制度是實際可行的，因為政府須為龐大的人口處理一項巨大的社會問題，目的是要以最廉價的方法，盡量為最多人提供最好的醫療服務。

因此，這個制度重量而不重質。這個制度由於為政府官僚主義所制肘，故並無靈活性。最近，香港醫學會就醫院管理局舉行了一個會議，約有 200 名醫生及臨時醫院管理局的成員參加。與會的 10 名講者中，大部份同意香港的醫院制度簡直是「一場糊塗」。隨着疾病類型的改變、醫療費用的急劇上升、病人因明瞭醫學進展而增加的需求、以及醫學界尋求更佳質素的服務，政府在發展不斷擴大的公營醫療服務缺乏遠見的缺點，開始顯示出來，而現時醫療制度的不足之處，也暴露無遺。此外，實際上我們也很難理解當局如何可以從一張成本超過 1,000 元的病床，每日只收取 26 元的費用，而為醫療服務提供足夠的收入。這項成本將來肯定會更加急劇上升。主席先生，簡而言之，香港的醫療制度已過時了。

無疑，醫療衛生制度已大大擴展，但它在擴展時，卻沒有一個可行的醫療衛生政策。前任醫務衛生署署長在離職時表示：「我相信我已應付了危機，為服務的擴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可是，諷刺的是，這種公立醫院制度的盲目發展，正導致目前的慘狀。

因此，當局亟需為各方面人士改革醫療服務。政府曾委出一個顧問團，研究引致現行醫院制度在組織上有所不足的問題；也許，這是政府明智之舉。其後，獨立組織，即醫院管理局的構思獲政府接納，以便在銓敘規例的限制外，提供一個更為靈活的架構。很可惜，這個醫療管理局的成立，被公眾及很多目前的員工視作一種政府推卸責任的方法。有些人將醫療管理局與很快會私營化的九廣鐵路公司比較，是不恰當的。我相信政府沒有這個用意。關於這方面，閣下在《施政報告》中，曾證實政府在保持公眾健康上所承擔的責任，絕不會減少，我感到很高興，而醫學界亦很感激。

正如教育和房屋一樣，醫療服務必須被視為不可或缺的服務。我認為醫院管理局類似房屋委員會，是「公司化」的機構，以達到更大的靈活性和更好的管理。

成立醫院管理局是一項龐大的工作。臨時醫院管理局必須在 18 個月內，為香港提出有關新的醫院服務制度的計劃。新制度必須令 40000 多名員工感到滿意，亦須找到所需的款項。我剛才已提及過，醫療成本是昂貴的，而在未來的日子裡更會上升。因此，除非政府願意無條件增加醫療服務的撥款，否則現時包括了一切開支的每日 26 元象徵式收費，便不再行得通了。

因此，政府必須以它會提供的資源，界定香港市民在醫療上的目標，換言之，必須就政府可以為市民負擔的服務類別和程度，劃出一條底線。政府必須定出社會哪個階層可獲得將來醫院管理局以大力資助的形式，提供全面的服務。此外，亦須探討增加資源的辦法。

可是，我們必須強調，政府有責任確保為貧困無依的人提供高水平的醫療照顧，而醫療服務的質素則絕不應降低。

只有在上述適當界定的政策下，臨時醫院管理局方可着手，擬定目標和優先次序，以便成立將來的醫院管理局。

現在，我想談談基本健康護理的問題。醫院服務只不過是整個健康護理制度組成的一部份。基本健康護理可能是更為重要的一環。大部份疾病均可以透過基本健康護理而輕易處理，只有在困難和特殊情況下才需要醫院服務。因此，照理一個適當管理而又有效率的基本健康護理制度可以減低市民對醫院服務的需求。可惜，現時由政府管理的基本健康護理制度——門診服務並不足夠。門診部充其量只是一個監察香港流行病的中心。我不得不說，實際上，門診部只是一個向病人派發藥物的中心，一個甄別需要醫院服務病人的地點，它不能提供病人所渴望得到的護理、信心和治療。

我絕無意醜化我在政府門診部工作的同事。事實上，他們要承擔太大的工作量，令他們除了匆忙地處理面前的工作外，別無其他選擇。他們很不開心，因為沒有工作滿足感，亦沒有刺激他們為將來事業努力的動力。另一方面，納稅人的金錢亦白白浪費，因為在政府門診部每一次診症中，政府須資助 68 元。

因此，當局在改革醫院服務的當兒，亦應採取一個更為實際的態度去處理基本健康護理問題。到底有什麼解決辦法呢？也許，主席先生的「智囊團」會考慮這一點，並把它連同其他議員直到目前為止所建議的事項，包括在建議設立的中央政策研究組的討論議程中。

其中一個解決辦法可能是：與其彌補現時制度的缺陷，倒不如全部取消基本健康護理服務，完全交予私人醫生辦理。透過一個入息調查的制度，政府可以決定誰是貧困的人，並當這個界定組別的人求醫時，負責以現時的資助額，根據比例支付私家醫生的費用。這樣的一個制度應該會令各方面得益。一方面，病人會感到更加滿意，因為他們可以自行選擇醫生，尋求醫學意見和診治。另一方面，這種辦法沒有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當然，當局必須先行制訂一個非常詳細的行政和實施計劃，方可防止可能發生的弊端。

現在我想談談牙醫的某些問題，因為牙醫亦屬於我的功能組別的成員。不顧及牙齒，全面的健康護理問題就絕不全面。很遺憾，政府對牙齒衛生護理和服務卻甚少注意。雖然本港有牙科學院，每年訓練出 60 名牙醫，而雖然我們具備了治療複雜牙科問題的技術知識和資源，但政府卻從來沒有採取過積極的措施，使公眾明白牙齒保健和預防勝於治療的重要性。雖然當局曾嘗試教育學童，使他們了解牙科保健的常識，但只是敷衍了事，因為只有小學生才可享受學童牙科保健計劃。

當局應該就適當牙齒護理和牙齒衛生，進行一個全港性的教育計劃，並須考慮把由受過訓練的牙醫所主理的學童牙科保健計劃，擴展至幼稚園、所有中學、甚至大學，以確保本港的未來主人翁有健康美觀的牙齒。

牙醫業的「牙痛問題」是人手過剩。根據最近由醫務發展諮詢委員會屬下牙科小組進行的分析，如果牙醫人數的增長率不變，到了二〇〇〇年便會有 400 多名過多的牙醫。現時，本港的牙醫來自香港大學菲臘親王牙醫學院、英國及其他英聯邦國家的牙科畢業生，以及世界各地考獲牙醫管理委員會牙醫執業試及格的牙科畢業生。

代表所有註冊牙醫的香港牙醫學會，以及代表香港大學牙科畢業生的香港大學牙科畢業同學會曾經進行過獨立調查，但得到的數據卻令人驚奇地相似，就是香港牙醫在照顧病人的時間，平均只佔他們工作時間 60%，我重覆，只佔他們工作時間 60%。現時很多人都在說合格牙醫找尋其他工作，如加入警隊，而有些合格牙醫甚至以駕駛的士為副業。當然，政府不是要把每個執業牙醫都變成百萬富翁，但政府卻有責任作出妥善的計劃，為本港的牙科畢業生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不要浪費納稅人的金錢。因為「製造」一名完全合乎資格的牙醫所需的費用，達 20 多萬元之鉅。過去兩年，申請就讀牙科學院的比率非常低，進一步證實了這個行業前景甚差。

問題到底在那裡，而我們怎樣才可以彌補這個缺陷？當局及牙科學院的策劃者，必須因為沒有充份研究香港牙科護理的實際需求而受到譴責。他們未有考慮到本港市民對牙科護理的需求，是可有可無的。此外，本港從未進行過有組織的全港性牙科衛生護理教育計劃，以引起公眾關注這類衛生護理的重要性。使這問題更為複雜的是，很多牙科工作都是由非法「牙醫」進行，他們的水準無法受到控制，因此往往會對病人造成傷害。有關這一點，我必須重覆本局議員葉文慶醫生昨天所提出的警告。葉議員呼籲當局深入探討傳統中醫在醫科及牙科方面水準的管制和頒佈。

在這情況下，我們必須非常急切地實行一些措施。當局必須設立優良和有效的措施，管制非法執業牙醫的人士。牙科學院需要面對現實，有效地減少取錄牙科學生的數目。學院的資源可以善用在發展畢業後的訓練上。而一個更有效、更具即時和長遠效益的辦法，就是政府可透過一個安

排妥善的牙科教育制度，令公眾明白適當牙科衛生的需要。當然，如先前所述，當局應特別考慮擴大學童牙科保健計劃。

所有這些辦法不單旨在為本港的牙醫提供足夠的工作，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提倡適當的牙科衛生，以追上這個社會致力提供的高水準醫療護理。

我希望談一下我醫學界同事的問題，即醫學界人手的問題。一如牙科人手過剩，當局亦應考慮將來醫生人數過多的可能性。因此，政府應該研究醫學界人手供應的問題。我們的兩所醫科學院不應再增加招收醫科學生的數目，而醫科學院的資源，則可改用於深造專科和分支專科的訓練。我們必須緊記，整體而言，本港並不缺乏醫生。換句話說，公立醫院醫生的短缺，是分配不當所致。牙醫已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我們再不可重蹈覆轍。

我想談談醫科學院，該院工作小組的最終報告今天發表了。為配合深造專科的訓練，香港有急切需要成立自己的組織（一所醫科學院），以制訂訓練課程和頒授本院的深造學位。成立這個組織的工作，已交由醫生深造和訓練工作小組負責。這項工作所費需時，但如我先前所說，小組的最終報告據悉會在今天發表。當局必須立即成立一個督導委員會，確保建議得以馬上實施，同時諮詢醫學界的意見，令醫科學院可以在沒有其他延誤的情況下得以成立。

我現在想談談醫生註冊條例。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需要，主要因一九九七年的來臨而起。有一點極為重要，就是這個行業的事情，應交由這個行業的人士處理。執業的水準不應受到政治的權宜之策所影響。

我相信當局對於所有日後在香港行醫的畢業生，應該施行一個標準和一次執照試。這樣的統一處理，會防止被人指責偏私。這是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在一九九七年還未到來之前，醫學界必須確立一個「香港制度」。

主席先生，我們將來的路應該怎樣走？富蘭克林曾經說過：「公眾健康就是公眾財富」。本港市民的健康實有賴我們所能提供的醫療衛生服務。因此，香港不能因在統計上衛生紀錄一向良好而自滿，我們必須向前看，計劃將來。

現時，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臨時醫院管理局之上——但這當然不是全面情況，因為公立醫院只不過是我們衛生護理制度的其中一面。

我曾在剛才的發言中，提及一些較為明顯的問題，並已建議解決的辦法。可是，我們還須處理更多事情。在提供整體衛生護理方面，我們仍須解決結合公營和私營醫務界的問題。此外，當衛生護理制度擴大時，便一定需要有醫學專業資格、曾接受適當訓練的衛生制度行政人員。很遺憾，本港現時正缺乏這種專業人材。因此，當局應該立即採取措施，激發醫學界人士以醫務管理為事業的興趣。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考慮財政資源問題。政府應盡量供應人力物力，在提供衛生護理上維持一個既定的目標。此外，當局亦應考慮從社會撥出資源的各種可能性。如要擴大醫療保險的範圍，就必須制訂足夠的條例管制保險業，以保障公眾的利益。

主席先生，最後，當局必須高瞻遠矚，加上醫學界與政府的合作，以確保我們的社會不但安定繁榮，而且是一個健康的社會！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詞，支持動議。

黃匡源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本局其他議員容許我不依次序發言，我謹此致謝。主席先生，當我初次聽到《施政報告》(h)節的內容時，發覺其中所載的政策與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經濟專責小組所提出而其後獲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研究的建議甚為接近，這使我有喜出望外之感。就經濟政策而言，我因此預料本港與基本法在銜接方面不會有多大問題。

然而，我擬就若干事項發表意見及提出一些問題。

《施政報告》第 38 段指出，政府在擴展或改善服務時，不會超越目前的 6% 基本增長率。但第 9 段卻說明，以最近三年計算，本港平均每年的實質增長率為 10%。我認為 10% 是較切合實際而應予應用的基準，因為此乃一移動平均數，不會如現成數字一般，有反映失實的弊端。

閣下在《施政報告》第 39 段說明，公營部門的增長不應過急，以免佔用私營機構逐步增長所需的資源，因而影響本港整體經濟。換言之，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之間不會在同一類商品或服務上互相競爭。我希望當局能制訂若干政策方針，說明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應如何及在何時互相競爭，或在什麼情況下私營機構可與專利的公用事業互相競爭。

此外，供應本港貨品而在本港設有分行或附屬公司的國營中資機構，每能壟斷該等貨品的供應市場。為此，我亦希望當局能訂定政策方針，使該等機構按公平的原則在本港經營業務。

閣下在《施政報告》第 40 段指出，為了配合本港的需要，當局用於基本設施的經費將會愈來愈大。此外，由於過去未有適當關注環境問題，在未來 10 年內，當局需要耗資約 100 億元，以改善本港的環境。除非我們知悉未來 10 年或甚至 20 年改善環境的長遠計劃詳情，否則，只提供這數字亦沒有多大意義。只有在獲悉所需資料後，我們才能估計這個數額是否足夠，以及如何籌措款項，以應所需。

從第 41 段可見，閣下對公務員人數每年增長 1.7% 有點憂慮，我認為這實非過慮。然而，除非我們知道，這個數字是否將全體公務員，連同那些已轉往獨立公共機構及公司任職而不再隸屬公務員編制的人員包括在內，以及這個增長幅度所需的開支是否已列入每年 6% 增長率的預算內，否則，這數字對我們沒有什麼意義。我知道政府正受到各方面，特別是衛生及福利服務方面的重大壓力，要求提供更多和更佳的服务。閣下曾指出，政府只會在絕對有需要時才會增加公務員的數目，而我深信，任何進一步增加公務員數目之舉，其所需的開支仍會在該 6% 增長率的範圍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衡量公務員的工作表現之前，我們必須採取公平的做法給他們使用最佳的文儀器材，這樣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取得最佳的效果。雖然當局遲遲才認識到必須充分

利用辦公室自動化和電腦等先進科技，可幸為時未晚，我對此表示歡迎。當局既然已作出這項決定，那麼，政府需要多久才能在各辦公室普遍採用文字處理機和圖文傳真機？

政府是採用現收現付制的會計制度。從整體的政府財政來看，這種會計方式或許是恰當的，但在反映個別單位的實際財政狀況方面，卻可以有很大的偏差。

商營企業是採用權責發生制的會計制度，即把應收而未收的帳項，及應付而未付的支出記入帳目內。

這種會計方式才可把收入與有關支出互相對照，亦反映了真確的財政狀況，使我們可按年或按單位作出比較，取得有意義的資料。顯而易見，並非所有政府部門的工作均可以獲利或虧損的尺度衡量，但我們可把更多政府部門所提供的服務以數字來衡量，務求把公帑更加用得其所。我知道核數署確有進行衡工量值的工作，但認為這方面的工作仍有不足。

此外，我亦想詢問政府當局，是否真正相信各部門會在每一財政年度內完全用罄該年度所獲得的撥款。由於職缺無人即時填補，而基本建設工程亦往往有所延誤，因此各部門經常無法如期用罄撥款。為此，我們應考慮利用剩餘的撥款，以擴大各項計劃的範圍，確保能更充分地善用公帑。我認為與其把這筆款項作為意外盈餘存放銀行內，倒不如把款項用作增設本港醫院極為急需的病床，或為弱能人士提供更多服務。

我想就本港現行稅制提出兩個問題。

首先，對於香港會計師公會在其提交的預算案意見書中，籲請當局把稅率回復至傳統的15%水平，我全力予以支持。我亦贊同該會提出把公司利得稅與個人入息稅之間的1.5%稅率差額撤銷的請求。由於當日本港的財政狀況欠佳，致有採取不同稅率的安排。然而，過去數年來，本港的財政每年均有盈餘，因此我們應回復實施以往單一的低稅率制度。

其次，我促請當局就雙重課稅問題從速與中國方面完成所需的洽商。香港是中國的主要投資者，因此冀望獲得最優惠的課稅待遇，亦未為過份。但是，我留意到，新加坡居民一年內在中國工作180天仍毋須課稅，而本港居民在內地工作超過90天便要課稅。即使本港未能取得最佳的協議，我們仍該為在內地工作的本港居民爭取較良好的課稅待遇。

最後，我建議智囊團從事下列三項工作。

第一、智囊團可否作出深入詳盡的研究，展望本港未來的經濟發展情況？換言之，我們需要甚麼研究和基本設施作支持，以促進本港經濟的發展？當局須採取何種管制措施？政府的收入來源為何，可徵收那些稅項及收益為何？因應這些問題，智囊團須衡量市民大眾在一生中可得到甚麼服務。他們應就政府為市民提供服務所需的經費開支作出真確平實的估計。我們必須知道本港日後會有怎樣的經濟情況。

第二、智囊團可否確保能取得一切有關資料及統計數字作為規劃之用？請恕我直言，我認為本港現時可供運用的統計數字，在很多方面均極其不足。智囊團必須應用最新的電腦科技，再三研

究我們所需的整套數據資料。我們不但需要最基本的數據（例如，各醫療緊急單位隨時可從資料庫得悉血型的資料，以輸入正確的血型給有需要的人），而且有關數據還可提供統計數字，以規劃本港在 10 年或 20 年後所需的各類醫療設施。我們必須有事實根據作為支持。

第三、智囊團可否謀求辦法，去除政府部門辦事的繁文縟節，從而使當局能迅速察覺到先進科技的用處，並盡快在政府部門內使用？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周美德議員致辭：主席先生，對於閣下在《施政報告》中的優越表現，我謹在這裏代表衛生界致謝。作為一個英明的領導人，好像主席先生的表現，其實是所有人民都期望的。作為衛生界的代表，我首先關心的自然是《施政報告》中述及醫療衛生服務的部份，但這七段文字並不能令關心香港醫療服務的人感到滿意。

報告重申醫管局的設立、政府的承擔、未來新落成床位的數目，而其中又特別強調了政府醫生的問題，要求臨時醫管局能迅速就醫生福利提供意見。這短短七段文字已數次出現以偏概全的情況。

政府自從接納成立醫管局的建議以來，不斷強調對未來醫療的承擔，但這種強調有效嗎？翻看一九八七年「關於醫院提供的醫療服務報告書」各界人士意見摘錄時，便發現無論贊成醫管局與否，都強烈要求政府切勿放棄對醫療服務的承擔，可見這是普遍市民的憂慮，而政府至今並未能以實質的行動顯示出她的承諾，尤其是在委任臨時醫管局的成員時，根本未能給與低下階層市民及有關僱員信心。試看 27 名成員有多少是來自基層的？有多少人對香港醫療服務的前線問題有深切的經驗及認識？抽離這些實際行動而不斷重覆要求市民相信政府對醫療服務，仍作出直接承擔，是毫無意義的！

更不幸的是，有些人更將員工爭取入臨時醫管局的要求視為一個純粹的利益之爭，這種言論簡直侮辱了前線醫療人士及剝奪了他們以切身經驗改善醫療服務的機會。

無論如何，一百句空泛的重申及不上一點兒的實際行動！

報告又突出了政府醫生的福利問題，我深切同情政府醫生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同時我是極力支持他們對改善的要求，真想不到馬克思用以描述十九世紀資本主義情形的字眼——剝削，竟會成為今天政府醫生對其僱主的指控。然而，報告將臨時醫管局的工作局限到單是上述問題，似乎忽略了整個臨時醫管局的工作方向。病人的福利實有賴整個醫療服務制度內不同部門的專業人士去照顧，他們包括醫生、護士、放射技師、醫學化驗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藥劑師、營養師、驗光師、臨床心理學家、義肢矯形師、語言治療師等。其實一個病人由診斷、治療以至康復整個過程中，都是依賴着這群人的專業服務，而這群人士構成一個協同作業的形式，而成為整個醫療服務，衛生服務的運作。我們不應忽略其他醫療服務改善的建議，及從實際工作體驗上受到的不滿。所有專業存在的問題都必須予以重視，否則整個醫療服務便出現不平衡，甚至由此而被拖垮。



在一九八九年初落成的屯門醫院的確緩和了醫院的擠迫情況，但每千人 4.46 張病床這比例，還遠遠落後於一九七四年白皮書所提出的每千人 5.5 張病床這指標。更重要的，政府並無述及新落成醫院是否有足夠醫療人手，例如醫生、護士及其他醫療職系人員。我們絕不願見到屆時新醫院因人手短缺問題而要空置病床，或不合理地增加醫療人員的壓力。據悉現時的政府醫生短缺人數已達 600 人，而一向被忽視的護理人員短缺情況亦相當嚴重。一九八八年前半年的護士流失率已相等於一九八五至八六年的全年流失率；而見習護士學生入學人數亦有明顯減少現象。以我所知，葵涌醫院新一班的精神科學生護士流失率竟達三成。在現職護士離職及年青人卻步的情形下，新建成醫院數以千計的護理人員空缺能否得到滿足實屬疑問。

人手問題、床位問題只不過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整個現象背後的問題還多的是。表面上看，香港的醫療服務好像相當理想，嬰兒死亡率低、個別疾病已在香港絕跡，然而情況果真如此簡單嗎？相信在座沒有多少人有排隊輪候門診的經驗吧？相信各位未嘗過排期半年看專科吧？相信大家沒有機會睡在公立醫院大房的帆布床吧？甚至可能衣履不全呢！

不幸的是，《醫療報告書》將香港的醫療問題簡單地還原成醫院管理問題，這只是不熟悉香港情況的人的建議。我不排除醫院需有較佳的管理，但為香港的醫療服務作一全身檢查實有必要。自一九七四年發表白皮書至今，香港醫療服務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偶爾啃兩片止痛片便算了，這樣下去，醫務衛生處(Medical and Health Department)果真要改稱醫務病痛處(Medical and Illness Department)，其本身已百病纏身。

我感到政府的醫療政策十分片面，在閣下的《施政報告》中，對醫療政策似乎將注意力大比重地集中在醫療服務。但要減輕門診及醫院用量，我們當前急務是重視及擴展衛生服務，例如中央健康教育及職業健康教育。我們必需透過教育加強老、中、青對疾病預防及健康醫療常識。一個更健康的社會人口不但可提高社會生產，更相應地減輕病發率、減低醫院用量，長遠來說才更符合整體社會經濟利益。

所以一個全面性的醫療服務檢討在現時是必須的。政府是否需要增加醫療撥款？是否需要發展基層醫療服務(primary health care service)，例如門診服務、衛生教育、衛生服務等，以代替現時的過於醫院導向的策略？本港護士的訓練制度是否需要全面檢討呢？我們明白在整個治療至康復的過程中，護士所擔當的角色極為重要，提供病人的輔導、護理診斷、病情觀察、治療及護理等等。這些專業服務的水平若有任何偏差，是不能追隨世界醫護科技的發展。一切都可以影響醫生及醫療職系人員相互性的治療服務。輕者會影響病者住院期延長，重者，可能導致病者失去生命。當然醫療費用會相應增加。這個又是否會危害社會大眾的利益呢？先進的國家我們可以不再參考了，我們就只試看東南亞國家，如菲律賓、台灣、中國，都將護士訓練納入為大學學院的訓練課程，醫療護理的知識，怎樣去治病，其實全球都是一樣。難道，因為香港是一個地區，人的生命就不值得重視麼？所以，我希望政府要檢討護士的訓練，是否需要脫離落後的學徒式訓練？10 年前，我已向政府提出過護士人手短缺的問題，及其真正原因，但時至今日，短缺仍然存在。中國人有一句話是這樣的：「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我們純粹降低護士學生的入職年齡，或者延長護士工作的時間，這一切不切實際，降低質素去改善人手，是只會損害大眾的利益。在衛生界中，職系問題太多。試就藥劑師一職看看，根據香港藥劑師學會最近的一次調查顯示，本港現大約有 500 名註冊藥劑師，但在一九八六至八

八年間，大約有 100 多名藥劑師離職移民。藥劑師、藥物製造、紀錄、監察、管理毒藥等的法律與推行，是保障市民大眾，非常重要。試看，現在危害青少年的軟性藥物的泛濫情況，其實是否與藥劑師的人手短缺問題有一個重大關係呢？爲了緩和未來藥劑師的供求脫節，我們是否有需要設立本地藥劑師的課程？這種種及更多的問題，有待一次全面檢討提供答案。我們絕不能只局部檢討醫院服務，這樣的分割式檢討只帶來整個醫療制度崩潰的危機。剪髮是要即時全頭修剪，怎能今天剪左邊，兩年後再修右邊呢？主席先生，我誠懇建議政府應在現在一同檢討衛生服務，另一方面，亦希望政府能成立一個特別工作小組，檢討及改善護理衛生界所存在的問題。

由醫院管理局顯示出來的政府部門逐步私營化及非公務員化的趨勢是值得注意的。在一片市場化、自由經濟的聲音下，私營化、非公務員化變得沒有甚麼討論餘地，然而情況果真如此簡單嗎？我們有否充份考慮個別市場的特質呢？醫療市場、教育市場的買賣雙方是甚麼人呢？要求市場機制作最終操縱者是否可行呢？需要建立甚麼條件才可以全面市場化呢？以上種種問題亟待深入討論。另一方面，伴隨着某些政府部門私營化而來的非公務員化所帶來的影響亦不容忽視。無可否認，未來香港的繁榮安定，極倚賴良好的公務員系統。現階段的非公務員化正正爲已經對香港前途感到徬徨的公務員加上他們對自身職業的憂慮，這對公務員信心的維繫，以致所有香港人對一九九七信心的維繫，絕非好事。

管理局帶來另一個憲制上的影響，就是原先的政府部門脫離行政機關後怎樣仍受政府影響？更重要的，怎樣才受市民監察？具體表現在政治制度上，管理局怎樣向立法局負責？從臨時醫管局的委任成員看來，期望未來的醫管局有所謂普羅市民的參與是有點奢望，又或者果然有普羅市民的代表，他們怎樣產生呢？怎樣代表市民呢？會否成爲被吸納的所謂代表以加強政策的認識性而實際上脫離市民的監察呢？管理局的問責性又如何？立法機關可否質詢這些非政府部門而又影響着幾百萬市民的機構呢？又或質詢管理局成員之一的政府部門首長時會否出現當年質詢核電合營公司的官員董事的情況呢？將管理局與立法局作某程度的掛鈎看來是必須的。

《施政報告》在政制問題上完全沒有觸及未來香港的民主化，是令人失望的。正如上面所說，管理局本身便有可能危及立法局對行政機關的監察，而只有政制進一步民主化，才能配合到聯合聲明所規定的「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及「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才能真正建立一個爲市民監察的立法機關及行政機關，落實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施政報告》在香港民主的發展上未有片言隻語，是否顯示了港府在這問題上背離了市民的意願，放棄協助香港建立一個符合中港利益的民主化社會這目標？

另一個備受關注的題目是在政府架構中設立一個中央政策研究組。不少社會人士對智囊團的設立期望甚高及大表贊成。然而，當仔細研究西方各國的智囊組織後，便應知道現時香港政府所提議的智囊團基本上與美國的「對外關係協會」、「布魯金斯學會」或日本的「經濟團體聯合會」有本質上的不同，期望它們能發揮類似的作用是不合理及不必要的。

較爲與現時政府新設的智囊團相似的組織是英國希斯內閣在一九七〇年設立的中央政策審議組(Central Policy Review Staff)。這個組織在一九八三年大選後由戴卓爾夫人取消，對這組織作深入探討相信對香港設置類似組織有一定的經驗啓示。

希斯首相設立 CPRS 時所提出的論據，與現時政府所提出的相差無幾，都是爲了處理一些跨部門的棘手的問題，希望有政府及外界人士能全職研究，提供一些較整體性的考慮。CPRS 並

強調它是一個中立的文官組織(Staff)，為整個內閣提供服務及直接向其負責。這個組織由知名學者領導，而他並可一起開內閣會議及經常地與首相面談。當初提出成立，這組織時，認為它不單可倚靠外界專家獨立整體考慮較長遠的策略性及跨部門問題，更重要的是其獨立性，將有別於部門首長的跨部門會議，因為這些會議往往變成各部門的妥協場所，未必能最有效地處理跨部門問題。

這組織運作至一九七四年後，其作用已開始減退，尤其是當時威爾遜首相在首相府另設向其提供個人服務的政策組(Policy Unit)，而 CPRS 所研究的問題並不是太政治性，正如其頭頭所言，政治問題應徵詢政治顧問的意見，CPRS 所研究的課題包括能源政策、造船業，電腦工業，核子反應爐、人口、種族關係等。直至後期，由於個別首相對長遠策略性問題興趣不大及英國的經濟危機逼使這組織以解決短期政策問題為主。

這個組織的衰亡相信對現時香港有一定的啓示。Rothschild(這小組的第一位領導人)曾說：「我並不以為政府會因我們的工作而運作更好。我以為我獲得最高的讚許是一位內閣部長曾對我說：『你們令我們能經常地思索』。」由於這組織充滿神秘感，初期便有國會議員表示不滿，要求 CPRS 須受特別委員會偵查。另一個引起討論的問題是 Rothschild 在一次公開演說之後，引起首相不滿，結果這組織的政治中立性及保守國家秘密的能力便引人注目。而七十年代末，CPRS 的報告往往引起很大的爭議，特別是政府屢次否決其建議，帶來的是這組織的聲譽大降。這可能與其他決策組織，如政策組(Policy Unit)及其他內閣成員產生一定矛盾有關。

就其研究能力而言，賀維爵士一九八五年的一段說話相信甚有參考價值：「CPRS 的領導人能出席內閣會議，這是一件重要的事。而他亦經常出席及發出另一種聲音，這實際上亦不壞。但當然，如果你想發出不同意見，你必須知道你正在說甚麼，而你亦需準備足夠資料，起碼不能差於部門首長作出建議時所準備的，而你亦需時間及人手，可惜我相信 CPRS 並沒有。結果，文件來得相當空泛，通常只是智囊們最後一分鐘衝刺的結果，而他們所不熟悉的問題正正是部門首長及外間顧問長時間工作的課題。」

總括而言，在香港設立中央政策研究組，首先必先去除其神秘性。而由於他有非政府人員擔任工作，他的政治中立性及守秘性亦須受關注。它與其他政府部門，特別是決策科的官員的關係如何？這仍有待探討。另一方面，必須賦予這組織足夠的人手和時間作出研究。要知道 CPRS 已有 16 名成員而仍感不足，其建議的質素備受批評。我亦相信如將研究課題集中在長遠策略性問題而非短期政治問題，這對研究組壓力可一定程度地減輕。我們要謹記切勿對研究組寄以太大期望，否則它便更舉步為艱。

最後，我想講及人權問題。主席先生，近日人權問題又成爲一個討論的焦點。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發言人近日在日內瓦一個記者會上批評英國對本港五百多萬居民重視不夠，並指出英國政府過早認為與香港有關事務是中國的事情，這批評正回應了政府有關官員所認為的香港人權法律，是等待《基本法》定案後才作出定論。假如香港政府事事都以爲是中國事情而不去着眼，不須改革，香港便變得死氣沉沉，信心難復，尤其以香港的人權一向都並未受到充份的保障，政府又無意改變這落後而不合理的局面，實令人痛惜，仍以一些落後而過時的法律去剝削港人的人權，不

但令港人對港府的形象，更會令外國對英國這九年的有效管治抱有懷疑，也直接打擊香港的聲譽。所以，希望政府能重視人權問題及盡速負起人權問題的責任。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方黃吉雯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有關閣下所發表的一九八八至八九年度《施政報告》，我想就以下兩個範圍加以論述：

### 公務員制度

第一項是公務員制度。閣下在《施政報告》中指出，當局最近曾對政府的高層管理組織作出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政府的基本組織仍屬健全，所得的結論是毋須進行重大改組。我今午想提出若干項《施政報告》沒有論述的事項，就是檢討公務員薪酬及福利的方法，以及公務員的考績及晉升程序，我深信這是一項重要的問題。

據我了解，一般而言，公務員的晉升制度普遍傾向於倚賴年資，而員工以往曾否犯錯也是一項舉足輕重的考慮因素。倘若上述因素所佔的比重頗大，通常只會削弱員工的自發性及減弱其悉力以赴的責任心。以這類因素為主的晉升制度只會鼓勵員工採取平庸之道，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平庸之道，舉世皆不歡迎。香港是一個講求效率及要求極高的地方，當然不可以接受這種情況。以本港獨特的環境來說，我們期望公務員有高水準的工作表現。倘若我們期望高，就必須選賢任能，給予的報酬自然會更多。所謂報酬多並不一定是以金錢來衡量，就業者通常均會在其工作上多方面獲得滿足感和成就感。以我自己來說，這方面的報酬與金錢實在同樣重要。

我認為政府應集中注意力，以確保本港的公務員行列能繼續聘用忠於職守及才華卓越的青年男女。為求達到這個目標，公務員制度必須具備下列條件：

- 一個適當的薪級表，使受僱者可達致舒適的生活水平；
- 一套公平而有效的考績方法；
- 一套能使員工的貢獻獲得賞識的程序；
- 一個按成就獎勵的制度；
- 一個令受僱者視公務員身份為事業有成及足以自豪的基礎；及
- 一套令人滿意的退休福利制度，以消除員工對日後生活的憂慮。

在未來的日子，香港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公務員架構，以執行管治上各項的工作。我們所需要的公務員必須盡忠職守，以公務員身份為榮，願將其才華及意見貢獻於改進本港政府在運作上的各方面事務，而當局亦應鼓勵他們這樣做，以及使他們覺得在退休後的晚年生活有所保障。即使在平日，要保持如此健全的公務員行列也頗為困難，況且我們還要經歷這九年的過渡期，因此我們必須在這方面多用心思，多加行動。除非員工的工作表現得到賞識，而其所付出的努力獲得獎勵，否則決難挽留他們繼續工作。

我籲請政府注視公務員的薪酬、附帶福利、房屋安排及退休福利等問題，但我更極力要求當局研究在選拔人員擔當更重大職務時所採用的制度。此外，對於具有辦事能力、熱心工作及富責任感的員工，我籲請政府為他們提供額外的訓練，作為其職業前途發展計劃的一部份。而事實上，他們這些表現已顯示給予他們額外的獎勵乃屬合宜，因此當局實應作挑選，並加以栽培，使他們獲得迅速晉升的機會。成功的先例往往會鼓勵後進，製造更多成功的例子，我深信假如迅速晉升之門一開，成功的故事不但令有關員工感到鼓舞，同時亦會鼓勵構成公務員行列骨幹及工作表現普通的員工，激發其工作的動力。

### 中國的影響

我想談及的另一個範圍是中國對本港的影響。香港與中國的關係非常獨特，更遑論香港在一九九七年會成為中國的一部份。彼此都是對方的最大貿易夥伴。香港十分依賴中國供應日常必需品，例如食水及基本食糧，而中國的總外匯收入，約有 40% 從香港獲得。

中國是香港的最大投資者，然而，根據估計，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七年期間，中國獲得外來投資約達 85 億美元，其中約有三分之二是從香港獲得。至於鄰近本港的廣東省，則估計約 80% 的外來投資是來自香港。主席先生，閣下在《施政報告》中提及，估計廣東省約 150 萬名至 200 萬名工人所從事的工作，是直接或間接依賴香港的工商業。

以上僅為已獲公開的統計數字，但目前種種跡象顯示，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將更形密切。然而，兩地情況非常懸殊。中國地大物博，人口超過 10 億，天然資源富饒，而香港則是彈丸之地，面積僅約 1000 平方千米，但人口卻多達 570 萬，但並無天然資源可供利用。不過，中國所缺乏的是港人在行政、管理、市場及財經方面所擅長的才能，而且香港與海外已建立聯繫及本港具備龐大的基本建設，這些使本港興旺繁榮的要素，在內地仍未有。

香港繼續繁榮興盛，其關鍵在於香港如何配合中國所實施的開放政策，發揮相輔相成之效。香港不能單單維持目前的技術及基本建設，而是應不斷向前邁進。在這方面，政府須擔當重要的角色，高瞻遠矚，設立及鼓勵推行有成效的教育制度，並確保隨時有適當的基本建設、鼓勵貿易及工業變革創新。在中國實行開放政策初期，香港尚可依賴基層科技，充任中國與外界接觸的橋樑，因為英語運用技能及與西方國家的商業聯繫，均極為重要。然而，隨著中國逐漸發展，本港亦須不斷進展，提高技術及服務水平，才可具備應有實力，能夠參與決定本港的命運。

主席先生，歷年以來，香港均有英明能幹的管治人才，使香港治理有方。然而，本港將來會面對更重大的挑戰，故在未來日子裏，我們所需要的領導階層必須能激發進取心，管理當局必須能

周詳籌劃及具創意。我欣聞政府有意設立「智囊團」，我認爲此舉非常重要，有助於激發新意，協助領導階層。我深信領導階層在實行此項措施時，定會徵集最能提供新意念及實事求是的人才，加入工作。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下午六時〇二分

主席（譯文）：現在已是六時，根據會議常規第 8 條第(2)段的規定，立法局現在應該休會。

律政司（譯文）：主席先生，如果閣下同意，我謹動議暫停執行會議常規第 8 條第(2)段的規定，以便本局今天的事務可於今天結束。

*此項動議經向本局提出，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林貝聿嘉議員致辭：主席先生，閣下的第二年《施政報告》，包羅萬有，深入探討政府在各方面的政策，詳盡而坦誠地向我們闡釋了幾十項不同政策中所面對的問題，但會切實地加以處理。這份報告不單能令港人看到我們的政府是有決心維持香港穩定繁榮及改善市民生活質素，更進一步承諾政府會繼續順應民情作出回應，同時並指出要成功地推行各項政策，需要政府和本局多方努力。

這種實事求是的積極態度，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有的表現，我深感榮幸能參與立法局的工作，並希望在閣下領導下，同心協力，造福市民。

《施政報告》中許多大的要點和創新的建議，例如組織中央「智囊團」幫助解決一些棘手問題，開設新的環境規劃及文娛康樂決策科，加速基本設施的發展等，這些開明的政策實在值得讚揚。而這些政策，在昨日和今日發言的同僚中，已有許多人提及，因此我想集中談論幾點和普通人日常生活有關的政策。

### 1. 環境保護

去年閣下的《施政報告》，亦曾提及本港環境的污染問題，今年更以內文六頁來詳細指出問題的嚴重性。香港是一個人口密度極高的地方，而環境污染會直接影響到每一個港人的健康。公眾人士對日益惡化的生活環境，極表關注。我們只要走到街上、海邊、郊野地方都可以看到及感受到空氣的污染、噪音、垃圾、污水、禽畜廢物等，令我們這個東方之珠蒙上很大的污點。

香港土地有限而人口則不斷增加。許多舊日四層高的樓宇，現在已重建成高樓大廈。當日設計的排水系統，在今日的情況下，當然是不敷應用。因此在許多舊日的住宅區內便發生許多渠管淤塞、污水滿溢、臭氣薰天的情況。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維修工程，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因為經常四處掘地，而帶給附近居民及行人諸多不便。這一點主席先生亦已覺察，《施政報告》帶給我們一個好消息，就是政府明年會成立一渠務署，專責統籌及處理這些問題，我和香港市民都

深感鼓舞。不過，這是一宗艱巨的工作，我希望將來進行時，能各方面配合，掘起的路面希望能盡快鋪設新管，填回原狀，盡量減少擾民。儘管如此，我知道這些工程一定會帶給附近居民許多不便，因此我提議政府在進行這些工程前，必須策劃週詳，確定完工日期，盡早讓附近受影響的居民知道，等他們心理有準備，希望可以減少市民投訴。同時當新市鎮計劃時應參考目前取得的教訓，預留日後因人口增加而需擴展的渠務設施。

## 2. 家庭服務

今年是社會福利署成立卅週年紀念，古語有云「三十而立」，我謹在此祝賀該署過去的成就。社會福利署對「有需要」服務的人士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最近幾年，它們對提供及資助老人服務更不遺餘力。

近年來，香港一些家庭面對的壓力越來越大。就上月為例，便有幾宗家庭慘劇發生。我對《施政報告》沒有提及擴充家庭服務一項，深以為憾。根據一九八六年人口統計資料顯示香港共有 36541 單親家庭，而離婚數字更由一九七四年的 839 宗增加至一九八七年的 5753 宗，增幅達六倍有多。至於虐妻及虐兒案則每年均超過 1000 宗，需要接受精神治療的人數亦有遞增，一九八七年單是在政府醫院及診所接受醫療的精神科病人便接近 9000 人。數字顯示近 10 年由中國抵港的新移民約有 50 萬。聯合醫院最近的一項調查研究指出，每 10 名患精神病者中，有兩至三名是來自中國的新移民。

從以上驚人的統計數字顯示，香港有許多家庭亟需家庭輔導服務，來幫助解決一些困擾的問題，例如一般人對價值觀的改變；因「一九九七年」移民而引致夫婦分開兩地所產生的後遺症——「太空人」；新市鎮的家庭來自四面八方，生活習慣不同，溝通亦不易；內地來港之新移民亦不能一下子適應香港的緊張生活，這些都是引致家庭危機的導火線。

主席先生，我因此建議政府及志願機構都應加強家庭輔導服務，增加家庭社工人手及外展隊，減低目前一個社工對 70 至 90 個案之比例，鼓勵多些志願機構在家庭輔導服務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 3. 教育

閣下在《施政報告》中指出教育是造就我們力爭上游的原動力，而力爭上游正是本港社會的特色。而這種原動力更應由小學開始培養，打好一個基礎。因此政府除了要提供足夠學位外，我們更關注的是教育質素的提高。自五十年代初期起，本港因校舍不足，而實施上下午班制。長久以來，教育界人士及家長都渴望能恢復全日制，使學生減少課後在外游蕩嬉戲的機會，從而減低誤交損友的危險；老師會有多些時間教導、接觸、輔導和瞭解學生；校方有更多空餘時間為學生安排課外活動；上課時間更充裕；家長會更安心投入工作；冬天學生不用摸黑起床返校或萬家燈火才回家吃飯等。

我非常高興知道政府準備逐步取消上下午班制。就此我深切期望政府能積極切實定出一個期限，將所有上下午班制的小學變為全日制，希望這個眾人願望能早日得以實現。

#### 4. 賓館

設在民居的賓館不單會引致火警、結構問題及環境衛生的污染，還會構成因突來的需要，引致設施變成不足而嚴重影響大廈內居民的日常生活，例如電梯使用過量、水電負荷過重、防盜治安無保障等。我因此提議賓館只能開設於商業大廈或商住兩用大廈的商業部份，而且必須與民居隔離。發牌前應徵詢大廈內居民的意見，如有反對，政府應詳細考慮居民的意見，然後尋求雙方皆滿意的解決方法。

#### 5. 越南難民

主席先生，在我結束談論閣下的《施政報告》前，我必須提及一點，就是困擾著每一個香港人的越南難民問題。我非常支持昨日幾位同僚所講，英國作為一個宗主國，應起帶頭作用，今後每年收容的人數一定要倍數增加，而不是像過去五年只共收容不足 1000 人。

根據資料顯示，由一九七五年起，香港作為第一收容港，已收容了 133000 人，其中約 118000 人已移居外國，但去英國的只有 13000 人，即佔總數的 9%，比起美國、加拿大及澳洲實在少很多。因此我希望香港政府能促請英國政府承擔這道義上的責任，在今後幾年大量增加收容額，一方面可以給其他國家一個好榜樣，另一方面也解決了港人的沉重負擔。

最後，我對閣下提出的施政方針，包括短期、中期、長期、甚至跨越一九九七年直達廿一世紀，表示歡迎和欣慰。主席先生，閣下曾向我們保證，政府會率先領導改善港人的生活質素，如真能做到，我深信港人亦會毫不猶豫的支持這個政府。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林偉強議員致辭：主席先生，在合乎社會整體利益的問題上，我們必須設法使各種不同的意見繼續成為推動具建設性改變的力量。而政府方面，亦必繼續順應民情，作出回應，此係本港近年來的良好政治風氣表現，值得大家引以為慰。

關於《施政報告》中的鄉區規劃方面，政府現在已經確切明瞭到需要制訂一套全面發展策略。全面發展策略的基本準則，就是社會資源要作公平分配，政府對鄉區規劃所需資源的運用，在全面發展策略的規劃下，對每一個地區都應該統籌兼顧。多年來，政府透過政務總署的鄉村工程計劃，以及由拓展署負責，並由土木工程署和路政署協助的新市鎮邊緣地區改善計劃，對離島各區就似乎失去公平的準則。

全面發展策略，當然會超出鄉村工程計劃和新市鎮邊緣地區改善計劃的範圍，因此，我希望在制訂全面發展策略的時候，能有地方人士參與，並且有機會參與監察的工作。

鄉村式公屋對於改善棚屋居民的居住環境十分重要，而第二代鄉村式公屋比早期興建的長洲長貴邨和大澳龍田邨，設計較為新穎而實用，雖然政府仍計劃在未來數年內於大澳、長洲和坪洲興



建鄉村式公屋，但是我認為新界其他鄉郊地區，亦應推廣同樣建設。在全面發展策略，應將此問題列入考慮。

談到全港發展策略研究，應包括都會區發展、新市鎮發展和鄉村發展三方面。過去忽略了鄉村發展的研究，因此也忽略了鼓勵廠商將就業機會分散，間接導致公共交通問題不易解決。

離島和西貢鄉區現在仍然是人口低密度地區，施政需要採取權變措施，例如有關當局最近在離島區提供興建體育館，係對人口規劃標準政策的一項突破，我希望一切公共設施，都能以上述興建計劃而定，適應當地環境的需要。

關於交通運輸策略方面，政府已把有關由馬鞍山新市鎮興建輕便鐵路連接沙田的可行性研究計劃，列入第二次整體運輸研究，又考慮將該線輕鐵延伸至東九龍地區。整體運輸政策綠皮書，將於明年四月發表。我站在全面發展策略的角度，來研究整體運輸的政策，覺得輕鐵運輸系統亦應有由屯門延伸至荃灣的需要，實在也應該列入第二次整體運輸計劃來研究。

關於《施政報告》中的興建新機場方面，本年五月，政府委託美國柏森氏公司香港分公司(RMPENCON)負責修訂赤鱸角機場計劃，就最新的科技進展，重新評核跑道及空域的操作條件、氣象情況、機場設備和設計等，並重訂各項成本預算和建築工程計劃。修訂計劃工作，為期六個月，相信已經完成。

新機場計劃需要道路和運輸系統的配合，同時亦可吸引發展商在機場附近興建工廠大廈和住宅樓宇。愈早宣佈新機場的計劃和決定，對吸引投資和維繫信心愈有好處。

關於《施政報告》中的港口設施方面，如果選擇赤鱸角為興建新機場地點，則在西部海港建立深水貨櫃港口最為理想。只要在港口另建一條新幹線公路，就可以將新界西北部的道路和運輸系統接駁起來，南通荃灣葵青及九龍，北上深圳。

城市規劃與土地利用都是政府對社會的干預，應宜關注各方面的權益。就過去出現的問題來說，有了藍圖的地區，但無規定發展的期限，因此土地的使用權受限制。未有藍圖的地區，土地使用權也受限制，不能自由發展。全面發展策略的制訂，應該有一個合理合法的指引，先就土地使用權問題，清除存在已久的障礙。

主席先生，閣下在本年度《施政報告》中指出本港不能大量輸入外地勞工，我十分贊同。不過，近年來勞工短缺已成為香港的隱憂，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正如目前不少工程因為勞工短缺而受阻延，所以我認為有限量的部份輸入勞工，對於促進本港繁榮定有幫助。

至於在將軍澳興建第三個工業邨計劃，對香港未來的科技發展必有裨益。這計劃既可提高中型及高度科技生產水準，又可使工業在新界有均衡的發展。

最後，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可能採納議員就《施政報告》提出的意見，悉力以赴，切實推行各項建議，以達致維持香港穩定繁榮和改善市民生活質素的共同目標。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詞，支持動議。

劉健儀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閣下在《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將會作出堅決的承擔，負起推行長期改善設施的責任，保持香港繁榮興旺及作為國際商業中心的地位。此外，各項長遠的基本建設發展計劃、全面及具遠見的防止環境污染計劃、促進科技的各項建議以及提供更多高等教育機會的長遠計劃，凡此種種，均足以證明政府是針對本港的實際需要，作出積極及有建設性的反應。無可置疑，這些政策方針是當局經過深思熟慮及周詳的設計後才制訂出來，目的是要造福市民。這些政策顯示政府對本港前途的信心，希望亦能向本港市民激發同樣的信念。我對這些政策方針深表歡迎，並確信它們定為市民大眾所贊同。

主席先生，請容許我藉此機會就《施政報告》內多項範圍加以評論。

有關環境污染問題，我欣悉政府已順應環境問題急待改善的需要，採取明智的環境保護政策，準備在未來 10 年間動用龐大款項，推行全面改善本港環境的計劃。根據目前的安排，與環境保護事項有關的規劃及措施的執行，分別由多個政府部門處理，以往是由衛生福利司擔任統籌，現改由地政工務司負責。儘管環境保護署在執行環境保護工作上及提出政策建議方面均扮演主導的角色，但畢竟政策的實際制訂還須由有關的司級人員處理，可惜他總是分身不暇，有許多其他事務需要優先處理。各項環境保護工作的背後，缺乏了一股直接由中央激發的動力，因此，在施行任何改善環境的整體計劃時，必然會受到影響。現在政府打算成立一個專門負責規劃及環境保護事宜的新決策科，再加上現時地政工務司部份職責的調配，今後在制訂及推行環境保護政策及計劃方面定會更為有利，而協調各部門有關環境保護的職責也會取得更佳的效果。政府將環境保護事宜提升，交由決策科處理，足見當局對污染問題的重視以及政府悉力防止環境污染的決心。我認為將規劃事宜及環境保護工作合併歸由一決策科管轄肯定是正確的做法，因為當局倘能在各範圍及規劃的各階段審慎研究環境污染的影響，相信日後定可避免很多環境污染的問題。

主席先生，香港已飽受痛苦的教訓，認識到倘若未能及早採取適當的保護環境措施，日後必定要付出高昂的代價。以往我們過於倚賴法例的管制。執行法例的管制當然重要，但就以水質污染而言，單以立法管制並不足夠。水污染管制條例自一九八〇年實施以來，甚至市民認為最珍貴的數個泳灘亦須封閉。香港陷於現時的困境，究其原因，是由於政府以往處理污染問題的進展過於緩慢，待醒覺到要認真對付這問題時，已無法有足夠的事前規劃。鑑於本港將動用龐大款項施工進行全港的污水排放基本建設計劃，我籲請政府緊記兩項重要因素，首先是要及早規劃，其次是實行時須靈活處理。香港是一個凡事講求效率及發展迅速的社會，在設計任何計劃——尤其是跨越未來 10 年的計劃——均應具備遠見及富靈活性，使能適應本港社會經常轉變及日益增加的需要。由於當局不斷在新界地區發展新市鎮，因而導致大量人口遷移及新工業邨落成，故此，高瞻遠矚及可靈活處理的計劃更形重要。倘若政府耗用巨資推行一個為期 10 年的計劃，到完成階段始發覺各項設施已不合時宜或未能配合屆時本港的要求，這當然不是我願意目睹的事。

關於空氣污染及噪音方面，我必須再強調，政府不應只倚靠法例的管制措施。香港由一九八三年起已實施空氣污染管制條例，我承認自該法例實行以來，空氣污染管制方面已有若干程度的改進，但我們仍經常聽到所排放的污濁空氣影響鄰居的投訴，而市民被噴出的有毒或厭惡性氣體侵襲的事件亦時有所聞，這些事例均顯示目前的管制措施可能不適當或未足夠。至於噪音管制條例則是在本年中始通過，若於此時衡量其在管制噪音方面的效果，實在言之過早。總而言之，不論

處理任何污染問題，包括水質、空氣或聲浪，我總相信預防勝於治療。市民對污染問題的醒覺非常重要，當局必須加強這方面的宣傳。在採取防止污染措施前，則應進行廣泛的諮詢，並採用適當步驟，取得市民的理解、接受及合作，以配合有關措施的推行。此外，我亦籲請政府進行研究，尋求符合經濟效益的方法及技術，使個別經營者能從污染源頭減低、消除或控制污染的問題。當局應採取措施將這些方法及技術向工廠及工業經營機構介紹，並鼓勵、勸喻及協助他們採用。訂立法例授權發出消滅或消除釋出污染通知書當然是合宜之舉，但假如能夠使收到通知書的人士獲得指引、意見或教導，得悉如何有效地遵守該通知書的規定，獲得較長久防止污染效果的機會也會大為提高。我確信沒有人真想蓄意對鄰居造成滋擾，倘若獲得適當的指引、意見及協助，則會發覺無論是大、小工廠及工業經營機構大都樂意甚至自費主動採取補救措施，消除污染的源頭。

主席先生，雖然我也明白很難在一篇《施政報告》內臚列所有政府政策，在芸芸政策中，只能提出較重要的部分加以論述。然而，《施政報告》似乎只着重那些滿足香港物質需要的措施，對一些較為無形的需要，卻沒有適當的照顧。提高港人生活質素固然十分重要，但改善港人本身涵養亦同樣重要，特別是在此邁向一九九七年的重要過渡期間尤見其需要。香港的繁榮極有賴發展本地的人力資源，政府致力改善教育政策，以抵銷人才外流所引起的影響，此舉甚是正確。當局計劃提供更多高等教育、工業教育及工業訓練機會，全部均值得嘉許。不過，卻未有提及如何教育、引導及栽培港人，準備面對一九九七年的來臨。顯然，倘若香港要在一九九七年後實施高度自治，本港便須悉力使港人作好準備，以承擔責任，迎接挑戰。為使港人能適應九七年後的社會及政治局勢，及能在這不足九年的時間內學會有效地參與自治政府的運作，我們現今便須採取措施，以便作好準備。我認為香港政府有道義上的責任使這項工作得以完成。因此，綜觀《施政報告》完全忽略公民教育一環，我大感失望。鑑於港人一直以來避談政治，以及市民對公共事務的關注普遍薄弱，故此，向他們灌輸公民教育的需要實在刻不容緩。現時的情況絕非理想，當港人必須自行管治時，甚至可能會造成可怕的後果。據我所知，當局已着手在學校內推行公民教育，可惜進度似乎頗為緩慢。同時，我亦知道公民教育委員會已於一九八六年成立，由博學多才的本局同僚謝志偉議員擔任主席。該會自成立以來，實際一直致力在學校以外推行公民教育，不過，可能礙於經費和其他問題所限，至今該會似乎仍未有顯著的成績。據我所知，在一九八八年至八九年度，該會所得的經費預算不足 190 萬元，但此數已較去年增加 47%。經費雖少，但該會已作出最大的努力，成績亦算不俗，誠屬可喜可賀。然而，令人費解的是為何該會只能獲配撥這麼小量的經費。政府既然能耗資 100 億元來興建本港的污水排放基本設施，亦必定有能力負擔更多的經費，來發展香港公民教育的基礎。此外，我認為將如此艱鉅的任務，完全交由該委員會獨力承擔，也絕非公平。畢竟，政府有責任為市民的福祉作準備，倘若委員會只負責研究和如何能最有效地向市民推廣公民教育及向當局提供意見，然後由政府負責將建議付諸實行，豈非更為理想？我衷心希望政府能主動鼓勵推廣公民教育，而非假手於他人，同時也深切期望政府盡量將此事列為較優先處理項目。一九九七年即將來臨，當局必須加速及擴展此方面的工作。

另外，與教育息息相關的青年問題，似乎亦未有在《施政報告》內詳細論述，只在青少年罪犯改過自新的段落稍為提及。協助罪犯改過自新只是補救方法，希望當局能施行充份的防範措施，使這方面的需要減至最低程度。由譚王葛鳴同僚領導的中央青年事務委員會所編撰的一份青年政策報告書，其諮詢階段剛好結束。我贊同報告書內所載有關本港青年問題及需要的研究結果。由於目前正鼓勵更多婦女投身工作，藉此減少勞工短缺的壓力，因此，很多在職父母均發覺無暇照料子女，近年本港離婚率劇增，導致出現許多破碎家庭，遂使本港的青年問題日益惡化。愈來愈

多青少年成爲時下社會轉變的犧牲者，他們並無適當的信念或歸屬感。許多青年人甚至與不良份子爲伍，或服食毒品，以求獲得解脫。即使他們至今尚未成爲社會上的問題人物，但這問題可能演變成爲禍根，日後帶來種種社會問題。故此，即使我在此強調制訂整體青年政策的重要性及指出此事乃當務之急，仍覺未能充份表達其重要程度。再者，我認爲政府有責任將今日的青年培育成爲他日富責任感的市民。政府應協助及引導這些年輕人面對社會的變遷和挑戰，承擔責任。香港已獲保證在一九九七年後有一個高度自治的政府，因此，實應協助及引導這些年輕人在將來高度自治的政府中積極地肩負責任。我謹促請政府審慎考慮在該報告諮詢期中所蒐集的一切意見，然後採取積極措施，從速制訂一套全面的青年政策。

最後，我想簡略談及有關擬議的中央政策研究組或「智囊團」。預期該組將負責研究複雜的政策事項、評估各項可供選擇的政策方案，從而就艱鉅的問題尋求實際解決辦法。驟然聽來，其工作十分簡單，但在我看來，這是一份絕不容易而且繁重的使命。該組的成員必須包括各方面的專家。但如何及從何處徵集這些睿智人才，及依據何種挑選準則等事宜，則現仍是一個巨大的問題。這些睿智人士，不僅是專家，亦須樂於付出時間、貢獻其智慧及爲促進本港利益而秉公忘私。而且，除了要熟悉有關香港情況外，亦須通曉政府的架構及運作情況。希望政府在延攬適當人才時有好的運氣。雖然前路重重困難，但此建議極具創意，故我深表歡迎，因爲香港這個充滿動力及先進的社會，政府在制訂政策時亟之需要將視野擴闊，以加強制訂中央政策的效率。正如周美德同僚指出，擬議的中央政策研究組，與一九七〇至八三年英國的中央政策檢討組甚爲相似，但該組顯然並不大受歡迎，因此終於在一九八三年解散。有鑑於此，我謹促請政府研究引致該組解散的因素，及其未受歡迎的原因，以確保本港的中央政策研究組不致重蹈覆轍。倘若能吸取其他地區相似組織的經驗以資借鏡，當有助於改善本港機構的運作。此外，重要的是，我認爲應清楚界定及指明此組的角色和職責，以確保政府架構內的職責不會重覆。估計當局會不時邀請該組來衡量各決策科政策與中央政府的主要目標的相互關係，因此當意見分歧時，可能會導致決策科司級官員與該組成員產生衝突，因此必須謹慎防範，以免發生此種情況。同時，鑑於該組所提供的意見將舉足輕重，故在考慮該組的成員組合及其資歷時，必須小心謹慎，確保該組能夠發揮當局原先欲其達到的功效。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下午六時三十七分

主席（譯文）：仍有九位本局議員希望發言，本局會議至此暫停，再作小休。由於我另有公事，故在小休後由布政司擔任主席，監察會議過程。（眾笑）

下午七時十一分

布政司在主席離開後擔任會議主席。

劉華森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政府承諾改善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孫的生活質素，閣下所提出的長期發展計劃使我們對此有信心，亦使海外投資者有信心在香港作較長期的投資。這些計劃對香港作爲國際城市的持續發展至爲重要。

在策劃將來的發展時，我們應採較進取的態度。倘只是應付當前的需要，則在面臨以後數十年的挑戰時便會顯得不足。我們必須按一定的規模和進度來擬訂計劃，使香港成為中國在邁向四化中的珍貴資產。

既然本港對現有資源的需求與日俱增，我們如何和從那裡取得這些人力物力以實施這項萬丈雄心的計劃？

### 人力資源

首先看看現時人力資源的情況。以管理和專業階層來說，即使沒有移民潮，由於工商業連續多年作兩位數字增長，我們已需要更多有經驗的人才。長遠來說，我十分贊同政府的政策，將資源用於增加每年入讀大專院校的學生人數。我謹再籲請政府採取教育統籌委員會的建議，保留現行的五二三制，集中擴展學位課程的數量和使之多元化。不然的話，我們不但會因學制受干擾而蒙受時間損失，更會在這最需要擴展之時，反為縮減高等教育的學額。

但這政策需要一段時間才會取得成果。須待若干年學生才告大學畢業，然後取得工作經驗，擔當任務更重大的職位。

要解決此問題，愚見以為，吸引不同種族國籍的海外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士來港，實不只頭腦開明這麼簡單。這樣可以立即填補移民所遺空缺。加入新血亦是新創意和寶貴經驗之源，可使香港更有效地發揮作為國際城市和新科技交流點的功能。這亦會加速本港作為華南海岸先進工商重鎮及金融中心的發展。

主席先生，我們應創造環境和機會，讓不同種族國籍的海外人士來港，為本港所提供的事業前景而在此工作。我歡迎香港最近准許外國律師來港與本地律師合夥執業。政府在此事上表現開放的態度，我謹此致賀。主席先生，本地化應有一個限度，須知過猶不及。閉關政策會使我們失去許多願意在此重要時刻與我們攜手合作的才能卓越之士。我認為，香港的大門應常開，好讓律師、會計師、工程師及醫生都能進來，亦不論他們是在那裡取得資歷。他們會是香港日後發展的力量之源。香港會因人才湧進獲益，他們的貢獻是難以估計的。這個「外來人才」字眼，恐怕不大適合，亦應包括擁有外國公民身份而對香港有信心的管理及專業人士，以及在外國學成而願意返港建立事業的學生。

在另一方面的人力市場，香港亦是供應不足。香港需要更多的技術員、工匠和一般的勞工。主席先生，我贊同閣下的說法，在經濟不景時，我們需要工人共渡時艱，而在好景時則應讓他們分享繁榮成果。但只有當供求相應，其彈性一如往常的經濟循環期時，這說法才是公平，才可成立。只是增加工資並不能解決我們的難題。倘我們不增加勞工供應，勢必引致工人成本增高，而生產力不會相應提高，因為工人會耽於自滿。

最近房屋委員會統計數字顯示，過去一年的投標價提高約 30% 至 35%，而其中 25% 是由於工人成本增加。此種價格提升並沒有帶來改善的產品。反之，產品質素已見下降。如果我們不是已追不上預定的期限，就應如以往一樣拒絕接收。

勞動力供應緊張已迫使廠商遷廠內地。最近統計數字顯示，香港廠商僱用大陸工人 150 至 200 萬，超出製造業在香港所僱工人總數。我認爲，遷廠內地以減低工人成本絕對合乎商業原則，亦使他們在世界市場上維持競爭能力。我們不是要勸阻這種變動。無論如何，香港仍是他們研究、管理和拓展市場的基地，我們要努力維持這情況。我們希望在未來的歲月中，需要大量資本和尖端科技的工業會在香港發展，而需要大量勞力的工業則會轉往中國設廠。

但亦有些工業是不能遷廠內地的，例如那些需要工人有高度技術的工業。此外，建築業需要工人在本港的地盤開工，而製衣業則有配額限制。我們需要爲這些工業謀求解決辦法。倘若我們從世界各地輸入勞工，則似乎會引起鄰近地區的妒忌，因爲他們尚有多餘的勞動力。我提議在下述情況下研究如何可僱用來自中國的勞工：

- (a) 不會加重本港社會經濟設施，例如房屋、醫療和其他服務的承擔；和
- (b) 透過中國的勞工服務所，在受管制的情況下輸入勞工，並由該等代理充份合作，執行工人約滿即返回內地的規定。

在落馬洲的中港公路竣工而文錦渡路改善工程完成後，香港廠商便可安排每日將工人從深圳運載來香港做工，下班後又送回深圳。工人所有補假和假期都會在其本國渡過，不會成爲本港社會設施上的一項負擔。

因此我籲請成立一工作小組，擬訂計劃的細則，以便按日輸入中國勞工。此工作小組的成員除公務員外，還應包括真正需要工人的廠商。

在未來的日子，用於這些龐大計劃上的開支會遠較前時所費爲多。政府應檢討訂定開支的態度，大前提是物盡其用，用得其所。所有控制撥款人員都應留意這項重大原則。

爲此，我們應再檢討本港的財政和會計制度，這兩者都有政府規例可循。

在這些規例中，許多都是源自古老的殖民地規例，不再適用於今日在香港。現在應是爲配合這重要原則而檢討各項程序和制度的時候了。只有藉著庫務署和各控制撥款人員努力合作，政府體制才能發揮更大的財政效率。

### 財政資源

現在試看我們發展計劃的財政資源。

過去十年來，本港的經濟開放政策和低稅制吸引了相當多的外商在本港投資。

要爲本港的龐大計劃集資，我們首先要邀請私營機構參與。在這方面，海底隧道和貨櫃碼頭都是異常成功的例子。

我們應從各計劃中選出所有有商業價值的工程計劃，供私營機構參與，這不獨可免動用公帑，並且可藉保留若干帶有利息的權益股而爲庫房開創新的經常性收入來源。

以第二機場為例，客運和貨運是有獲利潛力的業務。政府大可在分享利潤的條件下，將這些業務轉為私營，只保留航空交通管制、海關和出入境管制等方面的權力。

其次我們應考慮在已完成的政府工程中，為那些有商業價值及正在成功經營的企業、如地下鐵路、九廣鐵路等，安排將之私營化，所得收益可用於無收益的工程項目如道路、污水處理等。

公共開支既是與本港生產總值和推算增長相配合，當我們把所有可由私營機構辦理的項目均轉為私營後，便應考慮藉發行公債來籌措資金，以供其他基本開支用途。

許多人經常辯說進行公債籌措是將上一代所承擔的債務的還款責任加諸後人身上。不過無論怎樣，我們現在策劃興建的各項基本設施，可供子孫享用。由他們分擔部份費用是公平合理的。

多年來，香港已樹立優良的借貸信用，而這是我們尚未探索的資源之一。

今日，香港是世界金融市場的主要焦點。我們必須發展強大的資金市場，內設證券市場和借貸市場。

政府在盡心盡力改革本港證券業，我謹在此致賀。香港聯合交易所經歷全面重組，我們現在期望本港有健全的證券市場。

和證券市場相比，本港借貸市場仍在襁褓階段。雖然銀行界和發行者已異常努力，從事債券和其他商業票據交易的第二資金市場仍然未見活躍。

市場專業人士將市場無力歸咎於

- (a) 政府並無發行各類債券來為此第二市場的債務證券訂定基準價格，以致發行者不多。流通量亦少；和
- (b) 個人買賣時須預扣稅項。

藉著發行各類政府債券，我們可以籌集資金，一方面作基本建設用途。另一方面則激勵本港借貸市場的活動。

最後，我籲請政府力圖維持現行既低而又簡單的稅率，認真考慮利用私營機構參與和政府債券來為本港大型基本建設計劃籌措資金。

主席先生，我陳辭如上，謹支持當前動議。

梁煒彤議員致辭：主席先生，總督於十月十二日宣讀的《施政報告》可以說十分實事求是，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重。《報告》一再強調政府會主動尋求辦法解決本港面對的各項問題，尤其是經濟和民生問題。報告書又特別指出當局會以目前本港能力為基礎，準備大量匯集人力、財力

和技術資源來大力發展基本建設，創造更有利條件去面對未來，以求繼續增長經濟，增加全民財富，改善生活和環境素質。香港居民當然希望政府趕快實現如此具挑戰性承諾。

主席先生，今天我主要會就基本建設方面發表一些見解。欣聞總督明白而且確定了未來基本建設發展計劃對本港將來的發展極為重要而且又必需；這些計劃主要包括繼續擴展啓德國際機場和興建新的國際機場，進一步擴展目前的和建造新一代的海港基本設施，發展相應的道路網絡和基本運輸設施等等。由於《施政報告》相當清楚地論述了這些問題和計劃，我不準備再作重覆了。我只想指出這些發展計劃不少是期待已久的，只可惜由於種種原因例如財政、技術和政治理由而一直處於研究階段而已。如今似乎有了比較明確的發展時間表了。我深表高興，由衷歡迎。

《施政報告》告訴我們明年年底前政府會就新國際機場的興建作出決定，今年年底會決定第八和第九號貨櫃碼頭建造的地點，明年年底前會決定下一代港口設施的提供方式，明年年初會就連接新界西北部和市區的新鐵路計劃作出決定，今年年底會決定紅磡灣九廣鐵路貨場擴建計劃。此外，《報告》又指出當局會就連接新界西北部和香港島的第三號道路幹線進行詳細工程研究，也會就地下鐵路伸展至將軍澳問題與地下鐵路公司展開商討。剛才用了這麼多時間重覆報告書內的計劃是因為所提及的計劃都是必需的，我希望政府能夠依照時間表作出決定。如果能夠提前進行就更好了。這麼多計劃大致上會同時於九十年代進行，額外牽制本港大量人力、財力和技術資源，無可避免地對社會其他發展構成壓力。政府必須小心謹慎，巧作安排。

主席先生，《施政報告》的《政府財政管理》一節提到「如果由政府以外的機構提供服務，明顯地更能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則，以及在管理上更加靈活變通，那麼政府便會繼續把握機會，透過這些機構提供服務。」這裏所指的機構究竟是私營機構還是法定機構，還是包括兩者則難以斷定。無論如何，當局近年來已經漸漸增加利用私營機構投資基本建設工程了。《報告》指出東區海底隧道和大老山隧道皆由私營公司投資、營造，他日負責管理。我覺得利用政府以外的機構進行基本建設只要值得就應該繼續考慮。這樣當局一方面能夠減輕基本建設對公帑的依賴和避免官僚架構模式的因循，另一方面又可以為私人資金提供投資機會和依靠政府以外機構運作上的靈活變通，兩全其美。

主席先生，未來的新國際機場建築費用肯定驚人，耗資會數以百億元計。政府因此應該考慮與私營發展機構合作興建。這樣的公私合營建造新機場為了靈活而又可行，需要某一個特殊形式規定雙方的合作。我認為當局可以考慮成立一間類似地下鐵路公司和土地發展公司的法定機構全權進行策劃、興建和日後管理新機場。

這間法定機構管理局主席和成員應該由總督委任，包括非任職於政府人士和公務員。將來法定機構的發展基金盡可能由私營部門提供。他日用來成立這間法定機構的有關法例必須一方面賦予機構相當權力，令其可以獨立地有效靈活運作，另一方面又使到政府能夠對該機構保持有效的控制，保障計劃如期完成，該機構以後的運作必須符合整體社會利益。類似的法定機構模式亦可以用於其他相當份量的基本建設發展計劃，例如新一代的海港基本設施。

主席先生，我應該轉向談談房屋問題了。就房屋方面，身為房屋委員會委員的我很高興總督重申了政府希望於進入下一世紀時能夠為全港居民提供適當居所。當局因而因應環境制定了長遠房屋策略；房屋委員會也為了配合策略的實施而稍作改組了。



主席先生，目前還有好些公共房屋政策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由於時間關係，我現在只能夠提出其中一二。我認為最顯著的就是公屋住戶擁有私人住宅物業後仍然繼續擁有租用出租公屋單位權利。眾所週知，本港的出租公屋向來受到社會大量資助，租金低廉得很。政府興建出租公屋的目的應該是把公屋單位以居民能夠負擔的租金租給那些真正有房屋需要而又不能夠自己解決居住問題的低下收入家庭，並非租給那些自置了住宅物業，尤其是把出租公屋單位當作麻雀房、儲物室用的有經濟能力的家庭。現在的公屋政策竟然容許這些家庭繼續霸佔出租公屋，令真正急需房屋資助的貧苦大眾入住公屋權利被間接剝奪。社會上這些資源因此不適當地浪費了。

居者有其屋政策和自置居所貸款計劃方面同樣地很不公平、很不合理。擁有私人住宅物業的公屋住戶竟然也可以購買顧客受到限制而且價錢大幅度低於市價的居屋單位或者成為自置居所貸款計劃受惠者。房委會居屋政策和自置居所貸款計劃的目的應該是協助沒有住宅物業的中下收入家庭自置居所，並非協助擁有住宅物業家庭。現在的政策竟然容許這些家庭破壞房委會的真正目標。雖然房委會和房屋署會解釋，只要那些擁有私人住宅物業公屋住戶購買了居屋或者取得自置居所貸款後就會交回出租公屋單位，不過公平原則就會從此消失了，更何況他們還霸佔了別的合乎資格家庭的機會。不但如此，目前的政策還有一大害處。因為政策容許那些擁有住宅物業公屋住戶購買居屋，所以他們就算本來想交回空置了的出租公屋單位也會改變初衷，保留資格等待購買廉價的居屋。

如果以上所說的不公平，不合理現象能夠公平合理地解決，就會立刻有不少出租公屋單位騰空出來給真正有需要的家庭了。我堅決認為擁有住宅物業的家庭不應該享受任何形式社會給予的房屋資助。出租公屋、居屋和自置居所貸款只能夠服務真正有房屋需要的家庭。

主席先生，就房屋方面，我想特別指出政府必須繼續承擔直接責任為所有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適當居所。作為負責解決全港居住問題的法定機構，房委會不適宜再進一步更加獨立；房委會的運作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支援，另一方面應該適當地受行政局、立法局和公眾直接監察的。

主席先生，最後我還想簡單地談談另外一些比較全面的發展問題。去年的總督《施政報告》曾經指出新市鎮計劃是香港發展策略中重要的一環。然而，不知道為什麼今年的《施政報告》再也不提新市鎮了。我希望政府繼續重視新市鎮的發展，正視新市鎮居民仍然面對的問題例如就業、就學機會不理想，公共交通服務欠妥善，醫療服務、幼兒服務、社區設施不足夠。我們必須繼續努力解決這些問題。

主席先生，由於香港過去十五年太過集中於新界大事發展新市鎮，為超過二百萬人口提供了比較好的居住環境，所以不少舊市區地區和鄉村地區反而得不到合理的發展，環境素質甚為低劣。很高興《施政報告》終於明確地顧及這個問題了。政府現在正密切為都會區域和鄉村區域制定發展策略，希望改進環境素質。我覺得這樣的做法是正確而且必需的。此外，成立不久的土地發展公司會為舊市區重建翻新，改善惡劣的環境。身為土地發展公司成員，我熱切希望重建計劃不只在於增加土地使用比率和經濟效益，而且也能夠真正為舊市區帶來實質的環境改善，建造休憩場所和社區設施。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麥理覺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我要道歉的是由於患了傷風，以致影響了我美妙的蘇格蘭口音。（眾笑）主席先生，閣下在本年十月十二日於立法局發表的《施政報告》中，陳述香港在經濟及社會發展方面有長足的增長和進展，成績斐然。爲此，現謹向閣下和香港政府道賀。閣下所提及的種種計劃，不論是經已完成或正着手進行，以及爲未來籌劃的項目，若從總體經濟的層面來看，定會令世界各地和各國政府欽羨不已。這些驕人的成就肯定不是一個跛腳鴨政府，反而是一個有衝勁、反應快的政府所能達致。

《施政報告》帶給立法局及香港市民的訊息看來清楚明確：香港是一個朝氣蓬勃、成功興旺和日益進步的城市。它提供了極好例子，可向世界說明，政府若能訂立正確的制度，加上豐富的經驗、堅強的意志，以及人民的支持，可以獲得如何的成就。有了這一切，政府便可盡量增進社會的實際利益，並力求保持在過去多年來，導致本港經濟繁榮的組織及制度。

香港政府肩負這些重大責任，正如世界各地所有政府一樣，必須竭盡所能，落實執行這些職責。我相信大部份香港人都會同意，在過往，尤以近年爲然，香港政府充滿信心，決意面對種種難題，並與多個組織（包括立法局）共同努力，尋求解決辦法。香港的成功是管治階層與廣大市民衷誠合作的成果。

主席先生已在《施政報告》中清楚指出，有了計劃周詳的建設和發展計劃，本港會繼續獲得驕人的進展，而這些計劃，即使與比香港面積大很多倍的先進地區的發展相比，亦毫不遜色。香港有很多成就足以令我們自豪，我相信香港市民確是以香港爲榮。

可是，若要取得進展，便必須進行改革，而改革可能會對正常生活有所影響。過去三、四十年間，香港的進展一日千里，我們對改革及其所帶來的影響亦已習以爲常。

基本設施的發展已被公認爲未來社會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即使可據理提出申訴及要忍受諸多不便，大部份市民都會認爲，大型建設工程及隨之而來的影響，是應在日常生活予以接受的事實。然而在各種喧鬧、擾攘及重建之中，越來越多市民感到有需要設法保護我們的環境，在很多情況下，其實是重新確立我們所處環境的質素標準。多年來（其實是數十年來），有許多其他事項比環境保護更受當局重視，獲得優先處理。由於經濟進展必須依靠基本設施，因此，即使洞悉這些設施會對環境產生不良影響的人士提出反對，不論他們提出甚麼論據，亦會遭否決。這些影響不單只是即時和直接，例如打樁機和氣錘不斷發出震耳欲聾的噪音，但更重要的，是對我們生活質素較長遠的影響，例如我們不能暢泳於沿岸的清潔綠波，更不能食用在這些海域捕捉的貝殼類及甲殼類動物。在香港的發展初期，工商業的利益至爲重要，今時今日，工商業仍是本港經濟的命脈，但在照顧其需要的同時，亦要兼顧全港市民及下一代的需要。在這方面，世界每個工業國家無一倖免，都要面對這個問題。進步的國家在人民支持的環境保護專家的強大壓力下，採取多項具體的長遠計劃，以制訂及維持環境保護標準，使能在現在及將來，保持空氣清新、水質及地面清潔。

我們現在亦朝着同樣的目標進發；主席先生已概述政府爲糾正過往的失策，以及避免日後再犯嚴重的錯誤而採取的多項環境保護措施。現時才採取行動實爲時甚晚，所造成的損害已是十分嚴

重，為糾正錯誤而付出的代價將會很高。我認為立法局各位議員，不論個人背景及聯繫如何，均須以熱心及堅決的態度，就這項最重要的工作向政府提供意見及給予支持。

很抱歉，我把話題從政策扯到建設方面，但從《施政報告》中獲悉政府將會在青衣興建一所處理有毒化學廢物的中心，我感到十分驚訝。近年報章曾多次報導青衣居民反對政府將污染工業設置在毗連該區屋邨的地方，這些污染工業包括化工廠、大型發電站及其他可能構成危險的工業。就我記憶所及，現時擬興建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地點，在七十年代原來是設計作興建牛欄之用，但該處卻從未供作這用途，因此我懷疑選擇該地點來興建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可能是基於方便理由，而非以環境安全及保護為出發點。主席先生，我將會密切注視這事的發展，今日則不宜多作評論。

令我感到詫異的另一事項，是獲悉那些經處理但不宜排入吐露港的污水，卻可抽往啓德渠排放，這個計劃更被閣下譽為「具有新意」及有助改善啓德渠的情況，真是莫名其妙了。

我對這項重要問題的最後一項意見，是建議有關環境保護的政策應從教育及勸導這兩方面雙管齊下。勸導應以法例作為後盾，對造成環境污染的人士，不論是郊遊人士或船長，一概採取檢控行動。

剛才我已提及，我認為政府在維持經濟進展方面，成績斐然。香港經濟得以不斷增長，是因政府積極維持本港根據關稅和貿易總協定所享有的權利，以及透過「最惠國」進入市場的權利，盡力使香港產品打入國際市場。除此以外，是有賴政府盡力推廣本港的工商業，以及在政府委員會制度下運作的多個效率極高的組織努力不懈所致；這項政府委員會制度以深入程度及層面廣闊而言，世上其他制度均難以媲美。透過這項制度，私營機構中經驗豐富的人士可就各式各樣的重要問題，直接向政府提供意見，往往獲得令人觸目的成果。雖然我認為這項諮詢制度運作良好，但仍須要求政府採取某些改善方法，最低限度就工商業而言，有此需要。

這就是政府應採取更民主的原則，委任工業發展委員會及貿易諮詢委員會的委員，以便工商界的主要團體有代表參與，並可審閱提交該兩個委員會審議的文件。

我在一九七五年離開政府前，當時的工商署將貿易及工業諮詢委員會的所有文件，以只供內部傳閱方式，送交香港工業總會及香港總商會，並透過由該兩個組織當時的行政總裁取得評論。這項制度運作良好，因為香港工業總會及香港總商會的屬下委員有機會參閱這些文件，因而集思廣益，以他們豐富的經驗，協助政府解決當前問題。

當我離開工商署加入香港總商會後，這項服務便告中止。在以後的 13 年，我一直促請政府恢復為香港工業總會及香港總商會提供有關文件，並授權主要的工商組織委派代表加入工業發展委員會及貿易諮詢委員會，可惜我在這方面的建議不獲接納。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在另一個不同的組織——勞工顧問委員會，我的提議卻取得成效。該委員會的運作方式，完全是依照我一直以來所主張的制度，我希望當局能認真考慮這項建議，我亦十分樂意加以闡釋。

主席先生，現在我想轉談工商界極為關注，亦對本港經濟繼續增長有重大影響的另一項重要問題，就是現時的勞工短缺情況。

事實上，根據統計處發表的資料顯示，多年來本港若干類別的工人均出現人手不足情況。由於勞工短缺，僱主不得不以設置新式設備、加強自動化、採用電腦系統、為員工提供更佳訓練及生產高檔貨品等方式，提高廠房及工人的生產力。這些方法十分恰當，不過，世界各國對香港產品的需求一直極為殷切，近年來，本港製造商將初步的生產工序轉往中國處理，得以略為紓緩緊張的勞工短缺情況，對很多工業而言，幫助很大，但對成衣製造業卻不然，由於該業的出口配額受原產地的嚴格規定所限制，一切產品必須在香港製造。

此外，還有其他主要的工業不能遷往中國或其他地方施工，包括勞工短缺問題極為嚴重的建築業，很多大型及急需的興建計劃已因此而受到延誤。至於旅遊或酒店業，業內各類員工人手不足的情況亦十分嚴重。

主席先生，閣下在《施政報告》中指出，政府認為不宜放寬輸入合約勞工的現行政策，不過我卻認為，為本港經濟的最佳利益着想，現在，甚至將來，都有充份理由修訂這項政策；最少可以首先為欠缺工人達數千名的建造業輸入合約勞工。對教育程度較高及有很多工作可供選擇的本港工人來說，建造業的職位缺乏吸引力。雖然工會反對輸入外地勞工，但我認為實施試驗計劃應不會嚴重損害本港勞資雙方極為良好的關係；事實上，工會亦可透過勞方代表在勞工顧問委員會的討論，參與安排輸入勞工事宜。

如輸入建造業工人的試驗計劃奏效，其他受勞工短缺問題嚴重影響的行業亦可仿效，實行類似的計劃。

談過合約工人的入境問題，我亦想就政府發給來港公幹的東歐人士入境簽證的政策，提出一些建議，請政府重新考慮。很明顯，由於這是涉及中國的敏感問題，政府多年來對東歐商人採取極為嚴格的入境管制。毫無疑問，這項措施大大削弱本港與東歐國家通商的機會，因為根據國際慣例，貿易及開放市場都是以互惠原則來進行。據我所知，本港去年輸往東歐集團（包括蘇聯）的出口產品不足 1%；很多東歐商人，例如皮革業及補償貿易專家，曾被拒入境，即使獲得簽證，亦須遵守極為嚴格的入境規定，目的在於使他們打消來港的念頭。

我亦明白保安理由是決定性因素，但既然中國現正改善與蘇聯的關係和貿易情況，以及鑑於一九九七年日益接近，為擴展香港與東歐的貿易聯繫，現在豈非重新檢討對東歐商人的簽證方針的適當良機？

近年來，本港經濟有長足的進展，特別由於服務性行業迅速增長，導致該業對商業樓宇的需求大幅增加。雖然本港已施行大規模的興建計劃，但顯然仍未能為服務性行業提供足夠的商業單位，這對租金的變動情況影響很大。本港商業樓宇的租金，現正逐步攀升至一九八〇至八一年間的驚人昂貴水平。私人機構亦已加緊興建更多商業大廈，以應付需求，不過，若要達到供求平衡，可能還要等待數年；暫時而言，本港不斷擴展的商界在這方面須蒙受許多不便。此外，由於很多製造商轉往中國設廠，製造業在本港生產總值方面的增長率亦相應降低。有鑑於此，及由於市場對商業單位需求甚殷，我建議政府應放寬工業大廈的租約條款，以便更多工業大廈單位可改作商業用途，而非硬性規定只准進行與大廈內的工業經營有關的商業服務。我相信類似的措施應有助緩和目前商業單位求過於供的情況。事實上，我知道在過去一、兩年間，政府曾採取強硬行動，

不准在工業大廈內進行商業活動。對商業機構而言，這等於百上加斤。我所建議的是實行相反的政策，相信這會對香港更有裨益。

主席先生，閣下在《施政報告》中提到「智囊團」的構思，並稱之為「中央政策研究組」。雖然這個概念很好，不過我相信透過範圍廣泛而又互有連繫的各個現行委員會及議會，主席先生已可就政府須處理的各種事項，取得許多專業人士的意見。我認為當局可以設立一個所謂「智囊團」，負責考慮特別的問題，但遇有這種情況時，應將「智囊團」的成員組成一個委員會，並在獲取其意見後予以解散。成立一個由睿智人士組成的永久性委員會可能帶來不少問題，包括成員人選、可審議的事項，以及該會與其他經已成立的高層議會及委員會（包括本局）的關係。因此我促請政府審慎考慮「智囊團」將來應如何運作，以及如何與我認為看來效能良好的諮詢制度互相配合。

主席先生，我相信政府現在應當考慮在財政及管理方面，更積極參與支持本港體育活動發展的制度，特別是對有潛質奪標的本港年青運動員加以培訓。我認為香港未能盡展潛質，尚未發展成爲一個重視體育的社會，亦從未在亞洲和世界體壇上大放異彩，究其原因，有部份是由於政府不願積極參與體育事務所致。

我認為我們不乏各類體育健兒，同時本港現正不斷增添所需設施，應可培訓將來能令香港自豪的運動員。不過，各體育組織之間似乎缺乏政策方向及有效的協調，這很可能正是阻礙香港體育發展的絆腳石。雖然當局近年來在訓練及增添設施方面所費不菲，但本港運動員在國際賽事中的表現，可說甚差。我認為我們在體育方面應可獲得更好的成績，這樣將會提高市民的士氣及增強他們對未來的信心。擁戴勝利者的心理人人皆有，香港人亦不例外，以我們現時蓬勃的經濟情況，竟無法培訓出可在亞洲區的賽事中奪標的體育健將，更遑論國際性體育比賽，實在令人歎息。與其他小國極爲重視國家體育成就的態度比較，香港可謂相形見绌。主席先生，猶記當年我與姚卓然、莫振華，以至何應芬等名將切磋球技的時代，本港的體育成績一向不差哩。

不過，有一個相當重要的例外情況，就是本港傷殘運動員能夠繼續維持一直以來令人難以置信的出色表現，爲其他運動員樹立良好榜樣。可能有人會問，本港的傷殘運動員是否比體格健全的運動員更致力於其體育事業，抑或是因負責傷殘運動員的培訓、遴選及比賽的人士，毋須顧慮互相競爭的體育團體之間的意見衝突，因而可以專心致志進行本身的工作。他們對其運動員及香港實在貢獻良多。

康樂體育局於一九八七年所得的撥款爲 1000 萬元，但該局須透過至少 48 個團體，分三個類別支出款項，協助逾 50 類體育運動的發展。當局似乎對該局太過苛求了。

我從鍾賢善先生於本年初發表的《香港體育事務發展前瞻顧問研究報告書》中獲得不少寶貴意見，認爲值得在這裏覆述一次他的結論：

「香港在經濟方面表現出色，理應也可以在體育方面取得同樣輝煌成就。況且香港既具備這方面的發展潛質、辦事人才和熱心人士，又擁有世界很多城市所欣羨的設施，還可以從政府和私人機構獲得所需撥款，因此，相信在群策群力下，可以改善欠妥的地方，堵塞總綱計劃的漏洞。

不過，儘管如此，問題依然是——香港是否有決心在體育事務上，取得像在商業上的輝煌成就？」

主席先生，我希望本局能鼓勵政府撥出更多經費、給予更佳指導、進行更緊密的協調及作出更大的承擔，以協助本港體育機構及男女運動員在體育的畛域上向前邁進。此外，用於體育方面的公帑可引導本港年青人將精力用於健康的活動上，並遠離三合會的不良影響。

本局其他議員已就香港政制的未來發展作出詳盡討論，因此我只會作簡明扼要的評述。一國兩制的構思雖然是匠心獨運，但風險極大。要推行成功，實有賴本港經濟的不斷擴展、外國財團不斷參與本港的經濟活動、本港居民與外來投資者對本港基本設施及商業的投資保持強勁增長。在推行一國兩制計劃的時候，香港市民及其他地方的人士必須懷有高度信心，相信這項試驗必會成功；如信心稍有不足，便會對投資及商業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因此我們必須迅速建立一項政府內部制度以便創造一個能令商人及投資者保持高度信心的環境。我們實不容犯錯，因為再沒有時間可予糾正。

我個人認為最能符合香港利益的方案，是建立一個在政治及行政方面均高度自治的政制，在決策方面不受中國干預和介入，甚至不會受到不必要的影響。對一個主權國，尤其是制度與本港相去甚遠的國家而言，這項要求似乎過份苛刻，但正因如此才有此需要。要成功管治一個資本主義的地方，中國既無經驗，在思想上亦缺乏所需的信念。中國為了本身的利益着想，應容許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實行自治。換言之，我們應群策群力，找出成功的秘訣。我相信憑着我們的誠意，並確保本港市民明白自治與本身的利益有極大關係，必能達致成功。我不同意只有精英制度才能成功推行一國兩制的構思，亦不同意實行民主制度會危害香港的某些利益，事實剛好相反。我們必須尋找一種能為中國所容忍及接納的最民主政制。

主席先生，我們現時所經歷，是前所未有的重要時刻。我所代表的商界組別一向全心全意支持香港政府，並對經濟及社會發展作出極大貢獻。我加入本局的目的是協助政府進行艱巨的工作，而非以不合理及不公平的批評及怨言，攻擊政府。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薛浩然議員致辭：主席先生，中國有句俗語說：夜長夢多。根據議事程序表，我說的是第 30 個夢。這不是個惡夢，時間由兩分鐘至一小時。香港人也有個夢，希望由現在到一九九七年能有一個平穩的過渡，且希望在這個過渡期中能夠繁榮。此夢想能否實現？總督在十月十二日發表的《施政報告》，使我們有理由相信：通過這個《施政報告》，我們獲悉我們是有條件和信心的；如其中的規劃能做到，我們對香港的前途應可充滿信心。在我評論有關的《施政報告》時，我想用總督在這《施政報告》中第 184 段中的結論作為我這個辯論開始。報告說，「有問題要解決，並不要緊，因為每一社會都有問題存在。重要的是我們能坦誠地對過去問題切實地加以處理。」我同意總督實事求是的態度。我本人有機會參與屯門區議會及在油尖、旺角區工作，使我對地方行政能有深切的了解，故我要在地區層面方面看看《施政報告》有何影響。在地方行政的分劃上，南九龍是指油、尖、及旺角，東起由九廣鐵路到西面油麻地填海區，及由界限街以南開始以迄整個九龍半島。南九龍區擁有居住人口 30 多萬，而根據最近人口統計顯示，在未來 10 年內人

口將會輕微下降 10% 左右，雖然如此，其流動人口數倍於其居住人口，尤其是旺角區的人口密度更達到世界之冠。自從七十年代開始，爲了緩和市區人口的壓力，政府大量發展新市鎮；到今日，新市鎮的基本建設皆先後完成，新市鎮的居民一般來說皆有較大的活動空間，和可享用該區的社區會堂、圖書館、大型和多方面的休憩場所。居住在舊區居民在這方面，如油、尖、旺區的設施便相形見絀；因此，前年政府發表了都會計劃和土地發展公司的成立，在南九龍區從事商業活動的居民感到十分高興，因爲政府重新確認在發展新市鎮建設的前提下，重新改造舊區的香港未來整體規劃的重要性，而南九龍區居民希望這都會計劃能早日實施，及土地發展公司能早日將南九龍區的一些舊區的重建盡快列入其工作日程。南九龍不但是香港旅遊和商業區，亦是香港夜遊人士的重要活動地區，區內除了食肆林立，大小賓館、公寓、別墅，以及由此而生的色情招牌問題，在數目上亦爲全港之冠。此外，它亦是唯一無公屋或居屋的地區，是全港擁有最多私人樓宇的地區，故多層大廈的管理及維修亦備受居民的關注。隨着這些私人樓宇和附屬私家街道的管理權和公契發生糾紛，這地區的環境改善工作進展很慢，成效不大，故對最近成立的私人大廈管理委員會，居民十分歡迎，亦希望有關多層大廈管理法案的修訂能早日解決，因爲多層大廈亟需管理，實在已到刻不容緩的階段。由於油、尖及旺角擁有龐大的流動人口和商業區，對大部分從事個體經濟活動的小販具有很大吸引力和誘惑性，各區的小販都向南九龍區進軍。街頭擺賣問題受到南九龍區區議會極度關注，因其引起了行人安全、交通阻塞、市容衛生等問題。南九龍除了尖東海傍一帶是新填地區外，基本上是個老區，以前安放的污水渠和地下水排放系統都不能應付日益發展的商業和飲食業，故排污系統的重新處理和安排亦是此區亟需處理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由於最近重慶大廈和美麗都大廈兩場火災暴露了多層大廈內賓館和公寓的安全問題，因爲一旦發生火警，不獨引起住客安全和財物的損失，同時對整幢大廈的其他業主和住戶都構成嚴重威脅。因此，對有關不符合安全標準的賓館、旅社和公寓進行立例管制，原則上雖然符合公眾利益，但我建議政府在立例管制或制訂發牌準則時，應該先行徵詢有關行業的意見和聽取區議會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例如給予這行業經營者一個合理的限期和設立一個上訴制度；假如他們不獲發牌時，仍然有機會將他們的意見表達。

主席先生，越南難民問題是局內各議員和社會人士關心的問題。在這裏，我想告訴大家在旺角區域有籠屋的存在，目前估計有 30 間，住了千多人，他們的居住環境絕不會比越南難民好。另外，在旺角區內，有 1900 幢大廈，42000 個居住單位，人煙非常稠密，在旺角有 146 公頃的土地，但提供的活動空間和休憩場所祇得 5.2 多公頃，少於 3%，而根據香港的發展大綱規劃，是遠遠落後的。

雖然，最近藍鴻震先生曾提及油麻地區填海計劃，但我相信這個填海區計劃若要實施，將會是六、七年至十年間的事。有關油麻地、旺角區方面的休憩場所，居民是不可以等這麼久的，我們希望政府在短期內有些成效做出來。在回到越南難民問題和船民政策，我非常欣賞范徐麗泰議員和許賢發議員就越南難民問題所做的工作，但我十分不明白的是，越南難民本是個國際問題，而國際間有義務協助香港解決這個問題。自從六月中旬實行甄別政策後，有些船民來到香港便喪失了難民資格，當他們不是難民時，其他國家如英國、美國、瑞典，將不會對這些船民負起國際的義務，換句話說，越南難民本是國際問題，但我們爲何自動自覺將這問題轉化爲香港和越南政府間的問題呢？將越南難民問題變爲非法入境者問題呢？當然，我們考慮到開放營問題，有些人說越南難民在禁閉營內非常擠塞，當然我很同情他們，但我們實施甄別政策後，我們同樣囚禁起一些人，如果我們是如此有人道的話，那麼將船民關起來而不是給他們四處走動的，則又是甚麼人



道呢？所以我希望政府可向社會解釋，為甚麼我們由一個國際問題轉化為一個地區問題，而將此問題通過一個開放營的政策，更加將社會人士的看法由這問題帶到另一個屯門區的問題，如此一來，在國際上本來要負責任的政府，便可以很自在的慢慢淡出此問題了。

現在我想談談有關政制發展。主席先生，在總督《施政報告》第4段中提出：隨着社會的發展，市民的教育程度日高，生活日益富裕，自然冀求在公共事務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及在制訂影響他們自己生活政策的過程有更大的發言權。主席先生，我相信閣下所勾劃出來的宏圖大計，將會逐步的實現。隨着市民生活質素的不斷改善和上升，我相信他們對政制改革等問題以及社會上層結構等問題，越來越有興趣知道，而我們不應該忽視這方面的。

有關政制發展方面，我們知道由一九九一年開始，區議會將會和立法局的關係割斷，區議會將不會再有代表列席立法局，出席立法局的會議，究竟在未來三年內，或者在更長的歲月，政府希望區議會做些甚麼呢？而區議會是否亦要檢討一下在地方行政的諮詢架構內可以為社會做些甚麼呢？我們不問區議會可以做到些甚麼的情況下，我想政府給予我們清楚的界定。在很多問題上，尤其是在越南難民開放營政策方面，我們看到一個危險的趨勢，就是很多時候政府在施行它的政策時，由於沒有充份諮詢到有關區議會或地方，而令到有些政策執行，受到市民很大的阻力，亦令市民及有關區議會的成員對地方行政失了信心。他們認為政府很多時候是先行宣佈做了然後才來徵詢，我希望這種做法在日後會有所改善。

主席先生，我亦想談談的是我太遲參加立法局，趕不及上屆由鄧蓮如女士作首席議員的那一屆立法局。我知道鄧蓮如議員是對共識政治提及了很多，我亦十分相信此事，認為共識政治對香港整體社會是好的。但我有一前提是，所謂共識政治，或立法局內，或香港其他政治場所，我們所謂共識，究竟是講求求同存異，抑或求同排異呢？若我們講求求同存異的話，我不獨舉手贊成，我亦會五體投地，但我擔心一個趨勢，就是在很多場合中，我們看到有些人所講求的是求同排異，當他們認為順耳的說話，他們會聽，當他們認為不合他們意見的話，他們便不聽；他們亦有一個很有效的機器，就是通過舉手決定，如果有些意見他們認為不順耳的話，他們有一個很有效的武器就是人多欺人少，但我覺得此種在民主社會內，尤其是我們在香港之所以能有今天，就是因為我們可以容忍有不同的意見存在，而不是因為我們可以打擊到不同的意見而生存。主席先生，我希望在今後的立法局的層面上，或在全港的層面上，全體的居民和有關人士是本着求同存異和同舟共濟的精神去討論問題，檢討問題。

最後，主席先生，正如我答應過跟着我發言的那幾位同事，我是不會超過一個小時的。我們知道在香港未來的發展，由現在起到一九九七年，須面對很多困難，我們知道發展的道路是很曲折的，但我相信，我亦有理由相信各位同事會與我同一看法，便是我們的前途是光明的，雖然我們會面對困難，但不要緊，因為正如主席先生所說（請容許我再一次引一段閣下的結論），「我們有問題要解決是不不要緊的，因為沒有一個社會不受問題所困擾，重要的是我們要坦誠的面對各項的問題，同時，切實地加以處理。」還有一點是我們要有求同存異的政治共識（這是我自己說的），希望能在閣下的引導之下，以及全港市民及議員的通力合作下，我們能夠平安地過渡到一九九七年。

最後，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蘇周艷屏議員致辭：主席先生，港府發表的一九八八年《施政報告》中，有選擇性地針對幾個公眾關注的問題，譬如人才外流、輸入勞工、籌劃未來的重大建設，作出討論和展望，而態度是開誠布公的，顯示政府願意面對問題，這確實是公眾所樂於見到的。但另一方面，報告書內提及的一些重要規劃，例如政府行政高層的一些結構改動，則只停留在提綱式的階段，未有列明具體計劃，我期望政府會盡快廓清有關的具體內容，以減輕公眾的疑惑，特別是因為這些問題之所以容易引起公眾的敏感反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首先，人才外流的問題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已經再不單止是心理上的困擾，而是對香港經濟發展一項實質的損耗。報告書內估計一九八八年的移民人數會到達 45000 人，其中超過 10000 多人是教育程度較高、經驗較佳的中層管理人才和專業人士。日前「香港人事管理學會」的一次調查中，指出本港收入高於 14,000 元的專業人士，已有 6.5% 移民離港，確實是又一有力佐證。

政府企圖疏導人才外流所造成的壓力，這種方向是值得讚賞的，但可惜報告所列方案非但沒有針對問題的根本，而且可能帶來後遺症。

目前移民離港的專業人士，多數集中於幾個行業，故此即使未來的專上學院畢業生的人數普遍增加，我們亦沒有理由期望個別系別的畢業生能在數字上填補這些空缺，況且經驗和專業質素亦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培養出來的。

同時，政府試圖提供某種優惠或者方便，吸引已經離港的人才回流，恐怕只是治標不治本的策略而已。一來，政府太着重於爭取移民回流，可能會對決定留港的人才造成不公平的競爭，甚至會在人力市場上造成回流人才身價上升的假象，間接鼓勵人才外流又回流。

目前，我們必須在這個移民熱潮中保持鎮定，避免作出過激的反應。事實上，早些時候，澳洲及加拿大政府的個別官員已經分別指出，面對近年收容的香港移民人數激增，他們的政府將會相應緊縮配額。這樣看來，移民是一個雙邊及相對的問題，是有一定的調節機能控制的。

因此，我們針對人才外流製訂對策的時候，應該首先考慮那些願意，或因形勢使然，選擇留在香港貢獻出力量的香港人。這些對策應該以挽留及培養對香港有信心和有歸屬感的人才為目標。政府作為本地最大的僱主，理應負起帶頭作用——就是循着發展人力資源的方向，積極培訓中層人員。

但我們亦非常清楚，如果根本問題沒有改善，任何培訓計劃只會繼續將本來沒有移民條件的人士改變成為有移民條件的人才。

這個就是「信心」的問題。

狹義來說，不少專業人士擔心改變中的政治形勢會影響他們在專業上的發展。近日醫護人員、社工人員的流失量大增，以至美國律師申請在港執業而引起的爭論，已經在不同程度上流露出這種隱憂。

廣義來說，我們必須承認，人才外流與港人對前途問題的焦慮是兩面互相反照的鏡子。所以，我相信香港人最大的期望是中英港政府能對政制開放及民主化的進程，作出最大程度的承擔，政策實行上維持高度的威信和一貫性，減少社會上某種集體的不安，這才是具有政治智慧的承諾。

在發展人力資源的政策上，政府籌劃設立科技中心，是非常值得讚許的。根據報告所描述，這個是有別於以往單單針對個別行業的科技研究組織，是以一致地提高生產力及促進高科技型生產為目標的。對於面臨轉型期的香港工業來說，政府的確負起了比以前更積極及進取的輔導作用。

爲了促進工業向技術密集轉型，亦因爲現在我們仍未確知每個受勞工短缺問題影響的行業，究竟實際需要的，只是增加工人數量，抑或應該提高工人質素，我認爲現時不改變輸入「非技術性」勞工的既定政策是合理的。

但很奇怪的是，在政府就「一九九七年世界博覽會」發表的可行性報告中，亦有提及建造業的勞工供應正處於非常緊張的狀態，而另一方面根據《施政報告》指出，本港的幾項超級大型的建設，則必須在明年作出決定。所以，有關方面對於其中的勞工供應上如何配合，是否也有值得憂慮的地方呢？

再繼續談到香港的經濟發展，報告雖然提及「向外擴張」，但可惜未有實質的中期目標和發展規劃。面對愈來愈多的香港廠商將勞工密集工業轉移大陸，亦愈來愈多外資通過香港流入大陸，各種在商貿、科技及法律上的聯繫是前所未有的緊密和頻繁的，因此政府爲了穩定地發展香港與這個最大貿易夥伴的關係，亦爲了保障雙方的利益，是必須在短期內確立各種行政上的共識範圍，例如保障勞工的條例、資金的流轉等等不能拖延的問題。

最後，我認爲報告內一個對政府行政架構影響深遠的決定，就是設立兩個新的決策科和成立「中央政策研究組」。我相信公眾基本上是歡迎政府顯示對文化事業質素及生活質素的關注，及作出改善的努力。

但另一方面，我認爲必須廓清其職權及功能的一個新構想，自然是已經引起了不少討論的「中央政策研究組」了。在此之前，公眾只能憑想像，或者理論來評估這個小組的優劣，則並非是有效的辯論。所以，我請政府提供有關資料，讓公眾評議。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詞，支持動議。

田北俊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施政報告》透露了很多令人鼓舞的訊息，包括在教育、衛生及社會服務方面受人歡迎的新發展。我很高興得悉當局現正考慮興建新機場，明年年底之前便會作出決定。我也很高興得悉當局正努力不懈撲滅罪行、阻遏藥物濫用。我們必須防止毒販利用香港，把他們的不義之財在販毒行業中興波作浪。

我們亦須了解處理越南船民問題的政府部門的重擔。儘管受人批評，但整體上這些部門和志願機構，成績均屬驕人。加強公務員體制的新計劃非常及時。我堅信一個滿懷信心而與工商業鼎力合作的公務員體制，是我們社會得以健康運作的重要先決條件。

讀完《施政報告》的 186 段後，沒有人會對香港生氣勃勃和興旺繁榮一事感到懷疑。本港的情況已如實地描繪出來——「沒有隱藏任何缺點」。可是，我只會談論一部份問題。

《施政報告》已正確地找出一個極之嚴重的問題。有人溫和地形容為「勞工短缺」。但它不單是短缺問題，像食水短缺問題，而是我們根本上就沒有一個使我們能夠開關工人供應的龍頭。

主席先生，閣下的《施政報告》列出各項早已採取的措施，例如放寬婦女超時工作的限制。另外一項措施是研究各種方法，吸引更多人進入勞工市場。第三項措施則是擴展生產力促進局的諮詢和顧問服務。

迄今為止，我們並未解決問題。雖然這些措施是有價值的，但單憑他們解決問題是不足夠的。我們必須採取更積極的行動。

一般來說，勞工供應情況非常緊張。在建造業方面，簡直嚴重短缺。大部份經濟學家都認為勞工短缺會加劇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又令勞工供應反常。

沒有工人，我們便不能生產；沒有工人，我們便不能給酒店配備人員；沒有工人，我們便不能分配貨物；沒有工人，我們便不能興建新機場。

私營機構已盡力而為，但勞工短缺卻是個嚴重的問題。

製造業的職位空缺上升了 62%，分銷及飲食業的職位空缺上升了 122%，而金融地產業的空缺則上升了 108%。

實際上，失業率已下降至零。閣下表示廣東省約有 200 萬人為我們工作。政府統計數字顯示本港的製造業約有 85 萬名工人。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斷定，在中國為香港工作的工人，比香港本身的工人超出兩倍多。

我現在想討論一下製衣業的勞工短缺問題，和這個工業在本港所擔當的角色。

首先，我們考慮一下製衣業的本質。我們正與亞洲區的鄰國競爭。我們不是在市場的最低的一端，而是在市場的頂端。雖然香港的工人有技能，但工資卻毫不便宜。現時的勞工短缺情況早已把工資水平推高至不能忍受的程度，令香港製衣業不再有競爭力。

因此，當局說何不自動化？答案是我們早已高度自動化了。但請進一步考慮一下這行工業的本質。這行工業有賴起貨迅速，很多時製造的貨量較少。如果我們有 60 至 90 日的期限，便不能依靠呆板的自動化生產線了。自動化有很多限制。時裝和設計變化頻密，幾乎每月改變一次。完全自動化不夠靈活，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

製衣業面對的另一困難，是所謂「產地來源」的規則，根據多種纖維協定，香港獲發配額。多種纖維協定祇認定地區，目的是要界定產地來源規則。多種纖維協定關乎地理而並非公民身份。它不考慮工人的國籍，因此，製衣商不能像塑膠產品或電器的製造商似的搬進深圳。

由於有這些限制，香港的成衣真正是在香港製造的。可是，假若外地勞工前來香港，則不會違反多種纖維協定的規則。

我可以舉新加坡、澳門以及其他地區為例。這些地區實際上均輸入勞工，而卻沒有違反多種纖維協定的規則。

我評論的第三點，是關乎香港製衣業將來的任務。作為一種工業，我們植根於香港，我們不可以搬遷到其他地方。但請考慮一下我們的情況吧。在過去三年來，我們已失去了 5 萬名工人。現時製衣業只聘用 25 萬名工人。

日本出口製衣業在六十年代曾叱吒一時，現時實已式微。由於工資上升、通貨膨脹及勞工短缺，日本的製造業已從成衣轉移至電子、汽車製造及其他重工業。

現在，我們可能會問，如果經濟出現一段輕微的衰退，會發生什麼事？當衰退來臨時，服務行業如金融、船務、旅遊業等可能遭受影響。在經濟衰退期間，被辭退的失業工人，很可能會在製造業求職。

可是，香港與日本不同，本港所有其他工業如電子、玩具、塑膠業等，已永久遷往廣東。製衣業因嚴重勞工短缺而急劇衰落，顯示它是一種夕陽工業。當經濟衰退時，我們很難從服務行業重新吸納勞工，因為我們已不能生存了。改變現時不容許輸入勞工的政策的時候經已來臨，因為製衣業是香港的基石，將來亦可能一樣。製衣業可以減輕經濟不景的影響，同時又可以在有需要時支撐經濟。

我想強調一點，就是我們在製衣業所面對的，不是勞工短缺，而是勞工饑荒。

主席先生，我現在轉個話題，我想對當局設立中央政策研究組一事致賀。畢竟這個概念已有超過 35 年的歷史，在美國更有成立悠久、備受尊崇的智囊團例如布瓊斯機構、蘭特公司等。中央政策研究組的任務應該非常專門。每一天都會有一些新概念萌芽，而這些新概念均需以富有想像力的方法全面研究。香港必須如世界各地一樣，設立一個優秀的智囊中心。

當然，這樣的一個中心應該以盡可能獨立的精神運作，更應根據所需選定的研究範圍進行探討。但智囊團並非委員會。它負責政策研究、設計及分析，而非僅是一個負責加強政府政策管理事宜的單位。我個人認為智囊團的任務應被視為帶有強烈的研究氣味，不受外界壓力所影響。

最重要的一點是智囊團必須非常小心，避免與個別壓力團體或社會事務拉上關係。如果失去中立地位，智囊團便會失敗；失去中立地位，別人便不會信任。中央政策研究組成立後其中一項首要任務，應該是研究輸入勞工的問題。

主席先生，閣下在《施政報告》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談論環境問題，給我很深刻的印象。可是，我希望糾正一個錯誤的觀念。工業家不時被形容為對環境污染漠不關心。這是有點不符事實的。

污染並非工商業企業的目的，在某些情況下，它可能只是運作的副產品。香港很多工廠都是小型企業，我們應該更深入了解他們的問題。

立法局應該明白，企業家並非污染控制科技的專家。對於一般小工業家而言，這是一項高度專門、所費不貲的科技。

根據這些情況，我認為單以重罰款懲罰企業家，是錯誤的措施。這樣的罰款不應被視為一項經營開支。罰款不應當作租金或保險金，而實際的污染物質卻未能清除。

這樣的一項成本，只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這肯定不是消除污染的明智辦法。很不幸，中國俗語「有心無力」在這裡很合用。

我相信有另外一種方法，就是教育，而非懲罰。讓我們在清潔環境時，幫助工業，而不是懲罰工業。

我建議環境保護署和生產力促進局，應該一起負責處理污染控制的問題。環境保護署應透過轄下的督察，辨認出問題之所在。然後，生產力促進局則應向當局建議減低污染的適當辦法和最新技術。

現在，我們應該呼籲工業家支付安裝所需設施的費用，而非繳付罰款。罰款應該是懲罰不合作污染者的最後一着。環境保護署、生產力促進局及工業家之間，必須保持良好的工作關係。這樣，我們便可以通力合作，達到一個更美好的環境。在根除污染物質方面，我們不要戰爭，我們要合作。

主席先生，很多議員已就《施政報告》各方面發表意見，而我所談及的只是若干公共事務。

可是，我迫不得已要再次談談所謂「人才外流」的問題。我是迫不得已的，因為對某些人而言，他們對於談論這個問題，是樂此不疲的。

昨日，有人曾就所謂「人才外流」的嚴肅問題雄辯滔滔，可惜某些論點難以令人信服。有人認為香港最優秀的人才因立法局慢於採用直接選舉而離開香港。

以我個人而言，這個論點的奇怪邏輯，實跡近荒謬。假設立法局成員從明天開始完全以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選出，我們也沒有理由相信人才外流會因此而停止。我們當然亦無理由相信離開香港的人才，會改變初衷，湧回香港。

一日移民配額容易得到，市民一日都會繼續移民。立法局組成的方法，並非市民對香港的信心的因素。對香港的信心，是由多項因素，如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促成的。

人才外流問題的癥結在於收容國方面。某些國家從我們的人力財力得到鉅大利益。當然香港有「人才外流」的問題。但請讓我提醒本局，香港亦有一個金錢外流的問題。有些國家視香港為可以搾汁的橘子或擠奶的母牛。

八十年代初期之前，大部份收容國給予香港人的移民配額是很少的。後來，這些國家醒覺起來，發現除了我們專業人士的才能外，還可以賺取現金。

這些配額擴大了，以收容更多要移民的人。某些類別容許以投資的基礎移民。香港寶貴的人才正不斷被抽去，大量資金也同時被抽去。這些策略實與攔途截劫無異。

當然，我完全同意我們不應干涉市民自由進出的權利。

但我對於某些收容國所用的手法，卻感到遺憾。可惜，我們是束手無策的。《聯合聲明》對於那些合乎資格的人自由出入香港，有明確的規定，而《施政報告》亦有提及這一點。我們不能要求收容國減少它們的配額，但難道我們不可要求它們公平一點？

如果這些國家需要更多人，我們非常歡迎它們收留香港成千上萬的越南難民。但我懷疑是否會有很多國家收容。

本港的出口增長了 23%，而轉口則增長了 35%。以世界標準而言，香港經濟非常蓬勃。我們的工、商、製造業均蒸蒸日上。

我認為我們現在有良好理由相信英國將權力移交中國可順利進行，混亂情況會減至最少。《基本法》將於不足兩年內公佈，而中英聯絡小組的工作亦進展良好。我深知將來的憲法制度問題既困難又複雜，而這些問題大多與本局的本質有關。

主席先生，我衷心同意閣下的觀點，謹此引述所言：「不論是從社會，抑或從政府的立場來看，我們的目光是遠大的，不以一九九七年為限，而是遠遠伸展至下一世紀。」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詞，支持動議。

杜葉錫恩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對於閣下在《施政報告》中談及的許多事項，我甚感興趣，不過，我今天只集中論述其中數項問題。

我已在本年十月二十六日的動議辯論中，對教育事項發表意見，因此我現在只就當日發表的意見作一總結，就是整個教育制度須徹底檢討，使人人均有機會接受教育，而且機會均等。

我支持同僚張子江議員有關母語教育的意見，而我則認為母語教育是一項基本人權。

我今天談論的主要事項與我所代表的市政局組別有關。政府建議成立新的決策科，專責處理文娛康樂及體育事宜，增加對文娛康樂活動的支援，新的決策科將會與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緊密合作。

政府在一九七一年發表白皮書，建議讓市政局財政獨立，但將其職責範圍局限於公眾衛生、康樂事務、市容事務及一些文化活動。自從市政局於一九七三年開始財政獨立以來，即致力使香港脫離文化沙漠，成為具有真正文化生活的大城市之一，這點市政局居功至偉。事實上，市政局主動提議由該局撥款資助香港管弦樂團，使團員可專注於其藝術工作，不致瀕臨經濟困境。

不過，最近某些方面的發展卻令人頗感擔憂。首先，新的決策科在成立後，會否侵佔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的職責範圍。例如，我們恐怕其中一種情況會發生，就是如果演藝發展局在新的決策科協調下，在促進藝術方面發展，則可能會削弱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所從事的工作。

其次，就是有關康體事務問題。鍾賢善先生在其最近發表名為《香港體育事務發展前瞻顧問研究報告書》中提出的若干建議，很可能導致兩個市政局與擬議的政府法定團體之間出現惡性競爭。而這情況亦可能導致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的職責遭受削減，而這類競爭確實應該避免。

我希望藉此指出一點，就是市政局致力為數以百萬計的市民提供體育活動，對於其他議員談及的有志成為具國際水準的運動員，市政局所能提供的服務則是有限。市政局樂意為體育人材提供所需設施，使其達致更高水準，但這方面的工作不能與我們對普羅大眾須盡的責任有所衝突。

另一個惹人關注的問題，是關於私人機構贊助的問題。大家都知道，雖然私人機構可提供贊助，但這方面的資源也不是無限量的。倘若多個團體（包括建議成立的新團體）均向相同的來源尋求經費，便會演變為互相競爭的情況，對於為市民大眾提供服務來說，並無益處。

最後，我想就這問題，對法定委任團體的增加，提出一般性的忠告。政府一方面宣稱要促進民主，但另一方面卻增加法定委任團體，此舉看來可能會削弱這兩個由民選議員擔任大部份議席的市政局的權力，對於這個趨勢我們應該提高警覺。除非政府在提出有關文娛康樂體育新建議的時候，在每階段都徵詢兩個市政局的意見，否則，我恐怕政府與兩個市政局之間可能出現不必要的對峙局面。誠然，雙方必須通力合作。

我們在市政局的其中一項職責，是透過會見市民制度，與市民大眾接觸。在我處理的個案中，最令人感嘆的是老人的個案，這些老人已沒有工作能力、往往遭人厭惡、疾病纏身和感覺被人遺棄。主席先生，我很高興聽到閣下在《施政報告》中，說政府的宗旨是需要工人在經濟不景時共渡困難，而在經濟好景時則讓他們分享繁榮成果。我現在所提及的人士，在五十及六十年代，嚐盡艱苦，對於現在這一代的繁榮貢獻良多。只有那些當年在港生活的人，才會體會當時的歲月何等艱苦。然而，如今這些人年紀老邁，卻孤苦無依、面對種種困難。即使公共援助金額近日已有遞增，但數目仍微不足道，而其發放方式頗為刻薄。不過老人最殷切的需要反而是住屋，因為根據現行制度，每間公共屋邨單位，必須由二至三名老人共用，但有時老人之間很難分享居所，供單身人士入住的公屋單位實在為數甚少。而最惡劣者莫過於為需要護理安老照顧的人士所提供的服務。當局雖屢次對老弱人士的服務作出承諾，然而亦屢次背棄諾言。這類人士為數不多，我難以相信香港竟沒有能力照顧那些無法照顧自己的人。

在談論如何對那些曾為建設本港經濟盡心盡力的人士表示關懷之時，我想藉此一提，隨著星期日是和平紀念日的來臨，對於那些曾一度為戰俘的老人我們亦應表示謝意，以免在悼念二次世界大戰的死難者時，遺忘了仍然健在的一群。

主席先生，閣下的《施政報告》開放坦誠，我謹此致謝。希望閣下在聽取本局及廣大市民的意見後，就各項建議作出調整，然後付諸實行。

主席先生，我支持動議。

潘志輝議員致辭：

### 越南難民

主席先生，在《施政報告》第 130 段，閣下提及「雖然要面對越南船民抵港人數激增所造成的困境，但我們仍會盡力而為」。請恕我直言，我對閣下這種言論，絕不贊成。事實上，在施政報告第 123 段，閣下已明確瞭解和指出，本港市民對越南船民不斷湧入已達到難以接受的地步。

在越南難民抵港初期，香港市民本着寬容大量，人道立場，全心全力的協助以及照顧越南難民。不過隨着時間的過去，近年抵港的，大部份已非受政治迫害，走頭無路而被迫投奔怒海的難民，他們只是一些希望尋求更佳生活環境的船民。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七九年在日內瓦把所有離開越南的船民列為難民的協議，也因難民身份有變而實不能再成立。在其他各國已沒有履行大量收容難民的義務時，整個第一收容港的協議，也實在行不通的。

在現今的世界，比越南船民生活更困苦的大有人在。舉例來說，那些瘦骨如柴，生存於死亡邊緣的非洲饑民，他們所需要的援助比越南船民更為急切。若是生活困苦，便大量輸出船民，以迫令國際經濟援助或作為收回船民的條件，這種勒索性的行為，是不應鼓勵和接受。至於希望移居海外，求取美好生活環境的船民也應依照正當手續申請和輪候。主席先生，繼續收容越南船民和協助他們移居外國，只會燃點起更多越南人駛船出海找尋樂土的慾望，只會鼓勵他們一搏機會，望能甄別成為難民，達到早日移民外國的目標。假若越南經濟不能改善，經濟船民不斷湧現，請問香港政府是否永無止境的接收越南船民呢？

近年抵港的越南船民，他們跟大陸偷渡來港者實無多大分別，都是為求取更好的生活而非法進入本港的。如果政府繼續收容已非難民的船民，更花費大量公帑予以照顧，而對由大陸非法入境而勤勤懇懇、偷偷地工作、自食其力的人，卻又拉又鎖，刑滿更要解回內地，那又怎可算公平呢？對那些在本港有丈夫有子女的海上新娘，亦要迫令她們夫妻子女分離之苦，回鄉依法申請來港和對那已在本港生活多年，因生育入院被發現而被解回內地的無證媽媽，又怎算合理呢？對那些在國內有妻兒父母的香港人，他們正望穿秋水等候他們的家屬或親生的骨肉批准來港家庭團聚，港府又如何向他們交代與解釋呢？主席先生，我相信閣下和我都希望香港處事要有公平的原則。但為什麼偏偏容許香港的越南船民政策對我們中國的同胞、香港的親人這麼不公平呢？



主席先生，我們記憶猶新，在月前香港連續發生兩宗人間慘劇：病母吊死弱智兒子然後自盡及三歲幼女在母死後伴於屍旁三天才被發現。這些慘劇的發生不多不少與香港社會服務及資源不足有密切的關係。這些可能是少數被發現的個案，相信仍有很多類似的家庭慘劇未被發現與報導。事實上，香港每天仍有不少因醫院街症病人過多而至抱病得不到醫治的窮人；也有年老孤苦無依、生活陷於困境的老年人；有因特殊學校學位不足而至終日坐在家中的可憐弱智傷殘兒童，亦有一家七口擠住一狹窄的房間內或仍身居危險斜坡上的木屋居民，他們正期望政府撥出更多資源以解決他們的困難，改善其居住環境及使他們遠離危險之地。在香港本身急須解決問題仍多的今日，港府若仍將我們不足的資源，撥用於越南非法入境者身上，則有違我們一直強調為香港市民謀福利、為改善他們生活質素和以香港人利益為依歸的目標。

主席先生，自甄別政策實施以來，越南船民仍不斷抵港，而留港的越南人也比甄別前更多。至於被甄別為非難民的船民，其身份已由國際難民一變而為香港的非法入境者，至使香港無法要求外國收容。這些非法入境者及以往因條件差或犯罪而不被外國收容的難民，假若不願返回越南或越南不願無條件收回，那香港市民對他們豈不是要負上生養死葬的包袱？那香港實施甄別難民政策，豈不是變了作繭自縛呢？部份香港市民，對港府是否經深思熟慮，才決定實施甄別政策，甚表懷疑。或是否別有用心，使作為香港的宗主國和迫令香港成為第一收容港的英國能置身事外，從容的拋開了應為香港解決越南船民的責任。主席先生，在我們泥足更加深陷前，我懇切的希望港府重新考慮拒絕繼續收容越南船民。事實上，最近對越南船民的甄別亦已顯示絕大多數的船民都是非法入境者和無難民的資格。在法理上，香港政府絕對有權自行決定處置非法難民的方法。

主席先生，香港在英國的壓力下，不能把第一收容站完全取消，這不能不說是香港市民的不幸。作為香港的宗主國和強令香港永無止境收容越南船民的英國，只是空口講白話的說「對香港越南船民問題非常關注」，而在實際行動上卻推三推四，減少收容越南船民，這實使香港市民失望和感覺英國未有作出應盡的責任，只是慷香港人之慨和出賣了香港人。英國這樣做法，在香港的歷史上，將永遠留下污點。主席先生，以經濟援助那曾收取難民黃金，又向外實行侵略的越南，以求取他們收回船民，是難以令香港市民接受。這會鼓勵這些不謀進取，又好侵略的國家，在經濟不景時，再大量輸出船民，作為勒索的本錢，同時也可將那些援助資金，用於侵略。主席先生，在越南問題上，很多香港市民都想知道將來無法遣回的越南船民，是否由英國全數接收，還是遺留給將來的特區政府及香港市民自行負擔和解決。

### 醫療服務

隨着臨時醫院管理局的成立和政府決定在一九九〇年四月正式設立醫院管理局，負責管理全港政府及補助醫院，香港醫療體制將面臨一個重大的轉變。主席先生，在這時刻，閣下在《施政報告》第 135 段清楚言明政府繼續全力承擔醫療服務的責任，這確可消除部份人士對成立醫管局的疑心。

不過醫護人員對未來的轉變仍有疑慮，擔心他們現時的福利會否隨醫療的改制而消失，工作環境能否改善，政府及補助醫護人員福利不同的問題能否得到合理解決。近月來，政府醫生透過集會及政府醫生協會提出有關改善晉升深造機會、醫院設備不足、超時工作及薪酬問題的建議。一直以來，醫生病人比例過低，醫院設備不足、病房及工作間過於擠迫，都使醫生工作不能得心應手，精神壓力甚重，加上與私家醫生收入相差甚遠，因而引致醫院醫生大量流失。面對如此的局

面，政府當局應從速考慮政府醫生提出的建議，作出合理的改善安排，以減少政府醫生流失而引致醫療服務質素下降的出現。同時，對於其他醫護人員工作環境及薪酬福利等問題也不能因醫護員工的沉默，便不聞不問。事實上護理人員的問題和流失的情況，也不比醫生為少，在考慮醫生問題的同時，護理人員的問題也應共同考慮和加以解決。在事件未惡化前解決，總比事發後謀取補救辦法為佳。

主席先生，在今年四月財政報告辯論時，我已指出現時政府醫院及補助醫院護理人員資歷工作性質是大同小異，不過補助醫院醫護人員所享有的福利津貼與政府醫護人員比較相差甚大。因此補助醫院不但在招聘時更加困難，人材流失也較大。現時由於政府醫院與補助醫院制度不同，補助醫院人員仍可容忍這不合理的現象。但在將來所有醫院皆由一個獨立醫院管理局管轄，若再出現同工而不同福利津貼，必會引致不滿和混亂。主席先生，在閣下的《施政報告》第 136 段，只提及醫務衛生署職員將來的僱用條件，絕不比目前條件為差。但在提及補助醫院時，只說補助醫院本身的傳統和特色是不會受到破壞的，但卻全沒提及補助醫護人員的薪酬和福利。這是不是表示當局將會繼續容許補助醫院醫護人員福利津貼遠遠低於政府醫院的醫護員工呢？希望政府能早日澄清，消除補助醫院醫護人員的憂慮和不滿。主席先生，閣下在《施政報告》第 139 段提及的一連串擴展醫院計劃，但是如果醫護人員繼續大量流失，造成人才人手不足，那多建醫院也無法改善醫療不足的現象。

主席先生，在提供醫療服務時，政府應確保每區居民應獲同樣醫療服務及收費。不過現時補助醫院在設備及政府撥款上，都遠比政府醫院為差。同時，政府醫院的藥物及一切醫療檢查無須另行收費，但部份補助醫院因經費不足，對部份藥物及醫療檢查被迫收費。因此，居於政府醫院區域的居民比居於補助醫院的居民得到較好和更便宜的醫療服務。就以觀塘聯合醫院為例，它所服務的觀塘及鄰近地區的居民大多是居於公屋的勞苦大眾，但它在使用一些較為昂貴藥物或使用超音波掃描檢查，卻因資源不足而被迫向病人另收費用。這與政府醫院一切藥物檢查全免的比較，對觀塘區居民不單只不公平，而且對這些貧苦大眾更百上加斤。這種不合理的安排與資源的分配，政府實應從速改善。

### 城市規劃及環境改善

由於地少人多，城市規劃在香港城市發展中，佔一個極其重要的地位。不過，香港一直以來，都缺乏一個強大而有力的城市規劃部門，以推行全盤城市規劃的工作。現時負責該項工作的城市規劃師，分別被派往城市規劃處、拓展署及發展策略組工作，這種分散的安排，不但使部份規劃工作重覆，缺少緊密的聯繫，更做成工作效率低落。而現時的香港城市規劃條例，不但過於簡單而實際上是過時，更無賦予城市規劃師實權，以確保城市規劃能落實執行。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城市規劃實很難創造出一個美好的成績。而事實上，住宅與工廠為鄰所造成的噪音空氣污染問題；住宅大廈內存在非法工廠、波樓、浴室、庵堂、會所對住客居民造成的滋擾及河流海灘污染等，或多或少也是由於沒有一個強大有力而又有實權落實執行城市規劃的部門所引致。主席先生，閣下在《施政報告》強調城市規劃及環境改善的重要性，我絕對贊成。我在過去施政及財政報告辯論及在不同的場合，經已強調環境污染的問題，並以全港空氣污染最差的觀塘為例，舉出環境問題的嚴重程度，並要求政府加速改善。不過現時政府環境保護的工作，大部份都是在環境問題出現後才急謀改善，這種被動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法，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更難將香港創造為一個環境優美的城市。最重要和較有效的，是設立一個強大有力和全面的城市規劃署，以

便在進行城市建設的初期，便制訂一個全面（包括交通、環境等因素在內）的城市規劃。同時更加速修訂不合時宜的城市規劃條例，賦予城市規劃師權力推行和落實執行城市規劃，那才能將香港環境作徹底改善和使香港成爲一個規劃優良的城市。

### 交通運輸

主席先生，閣下的《施政報告》似乎顯示政府對道路建設甚爲重視。報告書更提及了多項大型的道路工程。不過，由於香港地少人多，不可能無限量的進行道路建設，以解決交通的頭痛問題。因此政府也應多考慮其它配合的措施或方法，例如以城市規劃減低人車爭路及對道路的需求，協調道路工程及維修，推行適當的道路交通管理，安排有系統的上下課或上下班彈性時間，擴展校車廠車接送計劃，加強公共交通服務等。這些方法可能比興建道路更爲符合經濟原則和容易施行。如果單靠道路興建是不能作徹底改善的，相反若道路的興建與上述措施配合進行，相信對改善道路交通更爲有效。

主席先生，公共交通一向是香港市民最主要的交通代步工具，所以爲市民提供足夠和廉價的公共交通服務，一直是政府重要的目標。屯門輕便鐵路是香港一種新的公共交通系統，最近已在屯門開始啓用。不過可惜一直受到屯門居民批評，事實上確有不少問題有待改善。故此，政府應在適當的時候從速對輕鐵服務進行全面檢討。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譚耀宗議員致辭：主席先生，爲了研究勞資關係，我專程去了日本幾天，故無出席會議，但我認爲是值得的，因日本的勞資關係可以對現時輸入勞工的政策得到啓發。

閣下在本年度《施政報告》的結論中指出「我們的目光是遠大的，不是一九九七年爲限，而是遠遠伸展至下一世紀」，而且承諾：「政府決心作出長遠規劃，同時亦會努力不懈，領導市民改善本港的生活質素。」不僅如此，在各個具體範圍內都提出了不少計劃和解決問題的方案，例如：政府將提供基本建設和人力資源、促進經濟發展；勞工階層應分享經濟繁榮所帶來的成果；政府會致力解決本港日趨嚴重的環境污染……等等。可說是一份「四平八穩、面面俱圓」的《施政報告》，使本港各階層的市民都易於感到滿意。我認爲港府在過渡期內要維持管治的有效性應從兩方面着手：首先在制訂公共政策時要能高瞻遠矚，從整體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訂出長遠的社會規劃；同時亦要鼓勵市民的參與，以制訂符合大眾利益的合理政策。其次，政府部門應提高自身的效用和效率，爲市民提供高質素的社會服務。這樣政府才能取得廣大市民的信任和支持，才能解決急速變遷的過渡期社會所出現的問題，並從而達至提高市民生活質素及促進經濟發展的目標。

作爲勞工界的代表，我最關心的是在《施政報告》中提到政府「目前無意改變政府現行（輸入外地勞工）政策，和不打算容許從香港以外地方輸入大量勞工」。這個明智的決定，符合了勞工界要求。報告正確地指出輸入外地勞工的計劃「會干擾經濟本身的正常調節作用，同時，亦與我們需要工人在經濟不景時共渡困難，而在經濟好景時則讓他們分享繁榮成果的宗旨，有所抵觸」。我支持政府這次不用人爲的行政措施破壞勞工市場調節機能的決定。但我須要指出的是，政府

檢討現行輸入外地勞工政策時，應汲取在大老山工程中輸入南韓礦工的教訓，不要奪去本地工人的工作機會。

其實要提高本地勞動參與率及勞動生產力，培養適合本港經濟結構轉型時的勞動力供應，我認爲政府應制訂有計劃、互相協調的勞工政策，包括：(1)僱傭條件及保障政策，(2)工業安全及健康政策，(3)職工會及勞資關係政策，(4)社會及職業保障政策及(5)勞工教育及訓練政策。政府應在現時以法制管制有關勞工事宜的基礎上，盡快發展出一套本地的勞工政策，以適應廣大勞工階層和本港經濟發展的需要。

要制定有關勞工的合理政策，政府就應聽取勞工階層的意見。正如閣下表示，「隨着社會的發展，市民教育程度日高，生活日益富裕，自然冀求在公共事務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及在制訂影響他們自己生活的政策過程中，有更大的發言權」。我認爲這是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本港人口佔大多數的勞工階層應在政治架構內，在制定社會政策時，有確認的地位和相應的影響力。尤其是在勞工事務和社會政策等與勞工階層有密切關係的問題上，勞工階層的意見更有助了解和解決問題。可是反觀現時的情況，無論在立法局及各有關勞工及社會政策的諮詢委員會中，勞工階層的代表性都受到了不應有的忽視。政府當局，正如閣下所說，應「順應民情，作出回應」，改善不合理的現況。

要維持香港經濟持續增長的活力，政府必須提供運作良好的基本設施，其中尤以加強本港對外聯繫的機場設施更是值得重視。政府亦了解到現時啓德機場的限制和問題，並答允於明年年底之前作出決定。我認爲政府的決定是急不容緩的。由於本港對飛機客貨運量的迅速增長，原有啓德機場的跑道，處理貨物的設備及乘客服務的供應等都無法應付需求，而且現有機場因航機升降及維修飛機時所發出的噪音已經大大影響到機場周圍居住的市民的日常生活。只有將機場搬離現址才能一方面滿足到飛機客貨運輸的需求，另一方面減低現有機場加諸市民身上的社會成本。

本年度的《施政報告》就有關改善環境作了詳細論述，足證政府對此問題的重視。閣下羅列出各方面所進行的環境改善工程和計劃是政府積極施政的表示，亦標誌着政府踏出了環境改善工作的第一步。如果我們能夠未雨綢繆，從預防措施和政策着手，「正本清源」，解決日趨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就無須當環境污染的嚴重程度到達爆發危機的臨界點時才採取緊急的補救措施。可惜政府現時所提出的環境改善措施都只是屬於「消防隊滅火」的補救性方法，仍有很多值得改進的地方。首先，政府應制訂整體性及預防性的環境保護政策。政府雖然亦認爲「須訂立全面和更長遠的計劃」，而且亦會成立新的決策科，負責協調各有關環境改善工作的重要決策範圍，但對整體環境保護政策的內容及新決策科職權的描述都付諸闕如。我認爲新決策科的職能是負責政府整體環境保護政策的目標訂立，研究分析，標準設計及計劃部署等工作，着手進行預防性的工作。而且它應負起統籌各政府部門執行環境保護政策的工作。其次，政府應大力推動環境保護的宣傳和教育工作，達到既治標又治本的目的。因爲要預防污染，除了阻嚇性的懲罰外，更重要的是使年青一代及企業家從主觀意識上了解到污染對自然環境及身心健康的不良影響，確立一套正確的環境保護觀念和守則。這樣政府在推行有關政策時才能取得市民的了解和合作。第三，政府在制訂環境保護政策時應鼓勵市民參與討論、提出意見，因爲環境保護政策是關乎每一個市民生活環境質素及下一代成長的問題。

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種種的建議，包括上述的政策及設施，能否順利地執行和興建實有賴全體公務員的努力及政府對社會服務提供制度的完善化。但是我認為政府對這些問題並未作出適當的重視。《施政報告》肯定了社會服務私營化的趨勢，認為「如果由政府以外的機構提供服務，明顯地更能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則，以及在管理上更加靈活變通，那麼政府便會繼續把握機會，透過這些機構提供服務。」我以為社會服務的提供不應過速進行私營化政策，所謂成本效益及管理的靈活性都不應成為衡量社會服務是否能夠滿足市民基本需要的尺度。因為私營化所引入的利潤導向及用者自費的特點都可能會帶來很多社會問題。首先，最需要社會服務的市民都無力獨立承擔私營服務的費用，亦無力自行解決問題。如果政府減少提供社會服務的承擔，這些市民的基本需要又怎能滿足呢？其次公共部門都基於大規模的資本及人力投資，為市民提供廉價的社會服務。如果公共部門整體交由私營部門管理，很容易在缺乏競爭對手的情形下造成對服務市場的壟斷，影響服務質素。如果分散由多個組織管理則又會因重覆而成資源浪費，或惡性競爭。而且如果由私營組織管理可能不及政府那樣積極地採取預防性措施，因為更多的社會問題產生對社會服務更大的需求，亦即意味着更多的顧客！所以我非常擔心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內推行私營化政策會導致社會服質素下降及影響市民的生活水平和質素。

《施政報告》又提出由政府以外的機構提供服務的行政管理安排，我認為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這架構性的變動會影響到在原政府部門任職的公務員的地位，削弱員工的士氣。其次我們亦要注意這些政府外的行政架構如何向市民負責，對市民的要求作出適當的反應的問題。這類屬於管理局性質的行政組織，包括財政獨立後的房屋委員會及臨時醫院管理局等，都應加強向市民的交代及問責：首先，管理局的成員應有充分代表性，以反映市民及各有關團體的意見，其次管理局應與立法局保持連繫，使本局議員作為市民的代表，有機會監察各管理局的運作。綜合來說，我認為政府不應倉卒推行私營化政策，而應從對整體社會着眼，研究政策的影響，並需公平諮詢市民意見，才審慎作出最後決定。

整體公務員隊伍工作效率的維持和提高是政府有效施政的基礎，這是眾所周知的。可惜閣下在改善公務員制度時只是從管理者如何開源節流，有效使用資源的角度對財政管理制度進行改革，或者是寄望「充分利用辦公室自動化和電腦科技的先進技術」取得更佳效果。這種使人感到「見物不見人」的作風實忽視了全體 18 萬 4 千名公務員隊伍中的大多數僱員的切身工作處境。事實上作為勞工界在立法局的代表，我曾收到了不少公務員的投訴，主要都是有關薪酬、升遷、福利工時、訓練等人事編制及員工與管方關係的問題。種種有關的問題都反映了政府的管理當局未能了解、研究及解決政府僱員工作管理問題，從而影響了整體公務員隊伍的士氣。政府在過往聘請顧問公司對政府架構進行的檢討，包括一九七四年的《麥健時報告書》和最近的《希氏報告書》，都只是針對政府高層的決策分工模式作出研究和建議，未有針對員工工作環境的問題作出建議。要維持公務員整體的士氣，政府應立即着手對公務員的人事及管理制度進行檢討，提出可行的解決現存問題的建議。

閣下所建議成立的中央政策研究組引起了社會上不少的猜想和討論，為今年的《施政報告》平添新意。我同意閣下的分析：「在一個像香港這樣迅速發展的社會，往往會出現複雜的政策問題，當局須集思廣益，深入研究，方可找出最佳的解決辦法。」而新成立的智囊團，直接向閣下、布政司和財政司負責，突出了小組的權威性和重要性。《施政報告》並期望該小組「可以想出一些富有新意的的方法，解決棘手問題」。可是如果小組只是針對個別具體問題作不同組合，對問題作出短期回應，並作出建議，我是會感到失望的。因為既然該小組處於行政架構的頂端，就應高

瞻遠矚，對整體社會發展方向作長遠策略性的研究，提出針對不同處境的對策，並統籌各部門的具體政策及規劃。這樣政府的施政才能一改以往回應性的方式而能預計急劇變動社會環境的可能問題，並作出相應的預防和準備措施。

面對香港過渡期中複雜而多變的社會情勢，政府要維持有效的管治，達到提高市民生活質素及促進經濟發展的目標。我重申政府要推行兩大主要工作以維持有效的管治：

- 一、確立一套讓市民參與的社會規劃標準程序，以制訂符合大眾利益的長遠社會政策；
- 二、研究及檢討政府社會服務推行制度及政府內部的人事管理制度，從而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律政司動議押後辯論。

押後辯論動議經向本局提出，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 休會與下次會議

主席（譯文）：我現依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佈休會，下次會議定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會議遂於下午九時三十五分結束。

（附註：會議過程正式紀錄所列動議簡稱的中文譯名，僅作參考指南，並無權威效力。）